

#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GUANGXI INSTITUTE OF SOCIALISM

双月刊·2024年第2期(第35卷)

学报编辑委员会

主任：黄龙杰

副主任：何文钜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小鸿 方素梅 刘菊香 许立坤 李小宁 杨保筠 杨绪强  
沈桂萍 张淑瑛 张献生 郑好 祝远娟 覃彩銮 谢茂松  
廖国一 潘宏纹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主办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

学报

双月刊

(1996年创刊)

第35卷 第2期

2024年4月18日出版

主管、主办单位:广西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广西社会主义学院

学报编辑部

主 编:何文钜

编辑部主任:杨绪强

地 址:南宁市西乡塘区新村大道6号

邮政编码:530007

电子信箱:GXSYXB@163.com

访问网址: <http://www.gxsy.org>

电 话:0771-2381657, 3891622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9-0339

国内统一刊号:CN 45-1250/D

发行范围:公开发行

发 行:广西社会主义学院

学报编辑部

印刷单位:广西明园凤凰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10.00元

# 目

## 特别策划·习近平文化思想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三重论域

..... 赵改萍,李娟(5)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进路研究

..... 吴布林,李佳艺(12)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民性论析

..... 黄盈盈(20)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毛泽东奠基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探索及其意义

..... 廖小明(25)

习近平历史观的哲学意蕴

..... 谢莉娅,谢江平(33)

## 统战理论与实践

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价值意蕴与实践

进路 ..... 朱小宝(42)

我国党外人才培养:特点、机理和规律(上)——中国共产党党外

人才工作研究系列之二

..... 祝远娟(49)

## 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论略

..... 李俊斌,傅琪(58)

# 录

## 政党制度研究

中国国家治理中的参政党:主体、功能与能力分析

..... 任世红(66)

## 民族研究

壮锦: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绽放的艺术之花——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系列之四

..... 覃彩銮(74)

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体化教育体系的四维向度

..... 邢亮,李准(82)

## 中华文化与文明互鉴

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呈现载体、逻辑关系与价值意蕴

..... 师英杰,王金斗(89)

##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研究

习近平关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实践伟力和践行路径

..... 高一飞,高榕(97)

## 观察与思考

数字乡村建设相关问题及对策建议

..... 刘晓丽(105)

本期执行编辑:杨绪强

封面设计:梁新建

Journal of Guangxi Institute  
Of Socialism

Bimonthly

(started in 1996)

Vol.35 No.2

Published on Apr. 18th 2024

Administrator and Sponsor: Guangxi  
Institute of Socialism  
Editor and Publisher: The Editorial Dept.  
of Journal of GIS

Editor-in-Chief: HE Wen-ju  
Editorial Director: YANG Xu-qiang  
Add: 6 Xincun Rd. Xixiangtang District.  
Nanning.

P.C.: 530007

E-mail: GXSXYXB@163.com

URL: <http://www.gxsy.org>

Tel: (0771)2381657,3891622

ISSN: 1009-0339

CN: 45-1250/D

Distribution Area: P.R.China

Distributor: The Editorial Dept. of Journal  
of GIS

Printing: Guangxi Mingyuan Fenghuang  
Printing Co.Ltd

Price: ¥10.00



英文翻译:陆姝彤

# JOURNAL OF GUANGXI INSTITUTE OF SOCIALISM

---

---

## Main Contents

- The Triple Domai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Lea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 ZHAO Gai-ping, LI Juan(5)
-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Leading New Media Public Opinion Propaganda Work  
..... WU Bu-lin, LI Jia-yi(12)
- The Analysis of the People's Character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 HUANG Ying-ying(20)
- The Main Explor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Mao Zedong in Laying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 LIAO Xiao-ming(25)
- Th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 of Xi Jinping's View of History  
..... XIE Li-ya, XIE Jiang-ping(33)
-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United Front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Value Implication and Practice Approach  
..... ZHU Xiao-bao(42)
- The Cultivation of Non-Party Talents in China: Characteristics, Mechanism and Law (Part 1):the Second Series of Research on the Work of Non-party Talents of the CPC  
..... ZHU Yuan-juan(49)
- On the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 LI Jun-bin, FU Qi(58)
- Analysis of the Principal Participants, Functions and Capabilities of Participating Parties in Chinese National Governance  
..... REN Shi-hong(66)
- Zhuang Brocade;the Artistic Flower of the Communication and Blending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the Fourth of a Series of Studies on Ethnic Communication Fusion and Integration in Guangxi  
..... QIN Cai-luan(74)
- The Four-Dimension Establishing an Integrated Education System to Consolidating Our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One Community  
..... XING Liang, LI Zhun(82)
- The Manifestation Carrier, Logical Relation, and Value Implications of the Inclusivenes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 SHI Ying-jie, WANG Jin-dou(89)
- The Original Contribution, Practical Strength and Practice Path of Xi Jinping Important Discussion on Building a Closer China-ASEAN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 GAO Yi-fei, GAO Rong(97)
- Related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n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 LIU Xiao-li(105)

#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三重论域

赵改萍,李 娟

(山西师范大学,山西太原 030031)

**摘 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结合。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具有可能性、必要性和可行性。从认识论看,习近平文化思想阐述了中华文明的鲜明特征,明确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的文化使命。从价值论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国内建设和国际发展具有多重价值,汇聚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文化力量,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从方法论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要坚定文化自信立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秉持开放包容的文化发展理念,提升中华文明凝聚力和感召力;坚持守正创新的文化发展导向,不断创新文明发展的思路、形式和话语。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式现代化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2.001

[中图分类号]D61;G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2-0005-07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不仅是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史、踔厉奋发的经济发展史,也是以前所未有的历史自觉性和主动性实现由“中华文明”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转变的文化发展史。2023年6月,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sup>[1]</sup>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着重强调了这一新的文化使命,正式提出并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重大概念,实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义思想在文化领域的创新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对坚持“两个结合”,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引领作用。

## 一、认识论:厘清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内在关系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场域下,实现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实践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体现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文化底蕴,开辟了

收稿日期:2023-12-28

基金项目:2023年度山西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2023KY441)。

作者简介:赵改萍,女,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李娟,女,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202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人类文明新境界。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阐明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明确提出了新的文化使命,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理论指导。

####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阐明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包含中华文明突出特征的现代文明,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程的第一步就是要打牢“中华文明”本体之基,了解“中华文明”本质之源。2022年习近平在考察河南安阳时首次提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他说:“这次来是想更深地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sup>[2]</sup>2023年6月,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五个方面的特性,并作了深入阐释,为新时代新征程增强文化自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思想引领。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观点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连续整体中的一部分,是延续发展着的中华文明在现代化历史阶段的产物。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初步成果表明,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少有的独立起源并发展至今的原生态文明。“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sup>[3]</sup>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我们坚定走自己文化发展道路的信心源泉,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丰厚滋养。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的时代传承与现代表达。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崇尚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等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sup>[4]</sup>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是现代文明的中国式新形态,也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化新发展。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有利于坚持守正创新,更好地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明根植于中国土壤,中国数千年文明发展史上的主流理念始终是统一。秦朝建立大一统国家体系以来,统一始终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历史事实证明,统一是经济繁荣、文化兴盛、人民安居乐业的保障。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是形成国家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保障,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明形态。习近平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总结中华文明具有的突出的统一性特征,为我们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注入了固本培元的思想力量。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民族是一个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中华文化崇尚“求同存异”“亲仁善邻”的“大同”格局。从先秦时期异域元素多样的青铜篆刻,到汉唐时期乐楼里上演的胡乐胡舞;从东汉时期“佛教东传”到近代的“西学东渐”,这些外来文化不断融入中华文明,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壮大并赓续至今的重要源泉。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的“第二个结合”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突出体现,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要求。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创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新局面,正是因为传承和发展了和平理念。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拥护者,是世界文明协调发展的缔造者。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体现了“和而不同”的政治愿景,展现了“和平共处”的处世之道。

以上五大特性是习近平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整体把握和系统概括,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深厚的历史底蕴、精神价值和实践智慧。全面把握中华文明五大特性有助于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价值指引。

####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新的文化使命的建设要求

文化使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航向标、路线图。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正式提出

“新的文化使命”重大命题,并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将这一新命题具象化,明确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新的文化使命的具体内容。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贯穿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线,是统领全篇的标识性概念,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从“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三个方面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确定为新的文化使命。首先,习近平在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后,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了解中华文明史、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的历史任务,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sup>[1]</sup>。其次,习近平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为召开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的主要内容,高屋建瓴地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置于新时代文化建设高地,深刻阐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和“两个结合”的重要意义。第三,习近平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文化繁荣”“文化强国”作为新时代文化使命蓝图,深化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在文化建设中的突出地位。

在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示要“围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sup>[2]</sup>,进而提出了“七个着力”的重要要求,为实现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 二、价值论: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多重价值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文化发展目标。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对凝聚共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发展和世界文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 (一)筑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思想基础

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是意识形态之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sup>[3]</sup>,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将其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核的“七个着力”之一,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思想引领。

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各种文化思潮暗流涌动。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加速了西方多元文化的输出,加剧了媒介传播渗透。目前,“西强我弱”的舆论走向正在发生根本扭转,我国文化领域正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非主流思潮使社会文化生态更加复杂,各种思想交织存在,本土的和外来的文化相互碰撞。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发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感召力。以文化贯通宣传思想工作,是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的创新举措。习近平文化思想确立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地位,确立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正面宣传为主”的工作方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把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sup>[4]</sup>,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筑牢思想基础。

### (二)汇聚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文化力量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表现,展现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文明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现代化,也是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现代化。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紧密联系,即“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sup>[5]</sup>。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中华文明发展的新样态,与中国式现代化紧密相联。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能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发展奠定基石、汇聚力量。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两个结合”重大论断,明确了文化建设应该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强调:“‘结合’的结果是互

相成就,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sup>[4]</sup>实现“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首先要找准契合点,“结合”的本质不是牵强的挂钩,而是相互融通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价值理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的文化基因相契合,是实现“第二个结合”的纽带。其次,“第二个结合”不是一方服务或造就另一方,而是共赢,二者的结合既深化了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的科学方法,也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新领域。最后,“第二个结合”是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基,巩固文化主体性,不断开拓文化创新的过程。“结合”是为了发展,发展就要明确方向和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正确选择。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我们探索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 (三) 积聚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底蕴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sup>[6]</sup>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sup>[4]</sup>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典型示范,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积聚了文化底蕴。

从形成基础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同根同源。“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形态,这种“中国特色”集中体现在扎根中华文明沃土、汲取中华文化养料等方面,是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世界人民共同追求的文明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文化资源同样来自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本体,首先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其次才是现代化的世界

文明。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过程是中华文化固本培元、守正创新的发展过程,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文化基础。

从全球视角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典型范式。中华民族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充斥着文化排斥和文化侵蚀的西方文明存在根本上的不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包含中国传统“和美”思想,崇尚和平、协和万邦的包容性文明形态。习近平文化思想阐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强调了文化建设“秉持开放包容”的发展格局,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多民族文化和谐并存局面,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具有理论指向和实践价值,在国际视野中也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 三、方法论: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实践要求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立足新时代我国文化发展实践的经验总结,确立了新时代文化使命,也明确了新的实践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文化建设的使命任务提供了实践指向。

#### (一) 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坚定文化自信,要正确把握文化主体性。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和精神谱系最真实最深厚的自信。习近平指出:“文化自信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sup>[4]</sup>独立自主的文化能够赋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动力,激活文化自豪感。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发展史来看,我们始终坚守独立自主的文化主体性,打造富有中华标识的文明成果,塑造极具民族内涵的精神谱系,为克服重重困难、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积聚了精神力量。只有坚定文化自信、坚守民族文化主阵地,才能为“第二个结合”注入持久动力,才能建设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文明形态。



坚定文化自信,要坚持道路选择,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证明,只有把握文化发展的主动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才能在文化发展大流中不迷失自我,摆脱文化渗透和侵蚀。走自己的文化发展道路,既要站稳优秀传统文化脚跟,讲好中华文化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还要敢破敢立,不盲从教条,也不照搬国外文化发展理论。

(二)秉持开放包容,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内不能故步自封。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强调文化自信,并不意味着文化发展要走极端民族主义的狭隘路线。要实现中华文明永续发展,提升中华文明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就要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历史的经验教训时刻提醒我们,闭门造车就会被文化发展大流冲垮。隋唐时期文化贸易的繁荣兴盛铸就了“昭昭有唐,天俾万国”的大唐盛世,封建社会末期僵化守旧的文化体系致使中华文明陷入空前危机。从马克思主义辩证观点来看,学习外来文化不是全盘吸收,也不是僵化地照搬照用,而是辩证看待人类一切文明成果,趋其利避其害,适时、适度学习借鉴优秀文明,使其实现中国化、时代化。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外要求同存异,推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绵发展至今,原因之一是始终坚持平等、互鉴、共存的文明观。习近平强调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sup>[7]</sup>。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以和为贵、崇尚和平的民族,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在国际格局的构建、国际环境的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始终秉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提出了“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倡议,提升了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立足“两个大局”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命题,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既提炼了中华文明标识,也以

大国风范回应了世界文明发展之需,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三)坚持守正创新,实现传统与现代有机结合

一是要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之“正”。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sup>[8]</sup>习近平文化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辩证关系,阐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和压迫,勾勒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蓝图。其内在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使之成为站在历史进步一边的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武器。文化建设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sup>[9]</sup>。因此,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充分发挥文化影响力,使理论创新赋予文化创造动力、使实践经验融入文化发展精髓、使历史变迁推动文化变革,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价值导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植于中华大地,积淀于五千年历史的绚丽瑰宝,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之正,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先导,是文化发展之必要。为此,“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sup>[10][164]</sup>。

二是要守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之“正”。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文化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守文化主体性之“正”就是守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之“泉眼”。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sup>[10][160]</sup>,明确了人民在文化创造、传播、继承中的主体地位。无论是文化创作者还是新闻舆论工作者,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深入人民群众,创作出让人民满意的作品,将文化思想、文化艺术融入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使文化服务、

文化设施更贴合人民需要、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不断提高人民精神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三是要守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之“正”。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力量,坚持党的领导是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影响力和感召力的关键。党的领导不是自封的,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是真理和经验的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团结奋斗的历史,是党和人民踔厉奋发迈向现代化的光荣史。只有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我们才能在各种社会思潮中把握正确航向。

四是开辟文化发展“新思路”。习近平十分重视文化创新,强调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sup>[428]</sup>。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地指明了新的文化使命,明确了新的目标任务,是文化创新的典范。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国际环境下中华文明建设的目标导向,要打破传统文化发展固有的时空限制,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打开文化发展的思路,打造文化品牌,创新文化产品。要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潮流相结合,创造出更多既蕴含传统文化精髓又符合大众消费潮流的文化新品。要用好新的科学技术和网络平台,提升文化传播力、影响力和公信力,把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的成果传播出去,实现中华文化与现代科技的有机衔接,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五是拓展文化发展“新形式”。第一,实现科技赋能文化创新。数字化科技的发展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拓展了文化表达形式,丰富了文化传播途径。要利用虚拟技术、人工智能、数字投影等新科技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呈现形式,将人工智能引入舞台表演,利用数字技术实现艺术作品视听上的双向互动;利用3D建模重构和虚拟仿真技术实现历史古迹的保存和虚拟构建,让文物“活起来”,让史料“会说话”,让文脉“传下去”。要以科技赋能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手段,扩大文化发展覆盖面,提高文化育人的实效性;通过自媒体平台 and 短视频等传播途径融入当代人的生活,让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更加可视、可闻、可感。第二,构建文旅融合新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强调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sup>[4]</sup>。以文旅文创为牵引,在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动力的同时带动文化产业发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优势转为产业优势,有助于打造文化旅游品牌,拓展文旅文创产业链条,实现文化与政治、经济的联动发展。文旅融合发展,能最大限度地挖掘利用优秀传统文化,以景区古迹为形的“文创雪糕”、根据当地历史文化事迹改编的“情景演出”、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传统服饰街拍”改善传统旅游走马观花的枯燥无味,增强了文旅融合的创意性,使沉浸式体验、年轻化消费深入人心,强化了优秀传统文化的感染力和记忆点。

六是塑造文化发展“新话语”。话语体系是一个国家文化发展样态的外在体现,是文明交流、国际对话的有效手段。实现文化发展的守正创新,提高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既要创新文化的内在发展形式,也要塑造文化传播的话语体系,立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任务和中国话语体系的文化底色,构建更加生动活泼的中华文化话语体系。在塑造文化发展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我们既要立足本来,又要面向未来,坚持用中国话讲好中国故事,塑造更多诸如“一带一路”“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富有中国特色的话语表达。同时,加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设,提升中国话语的辨识度、认同度,打造融通中外、贯通东西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在叙事体系上,用好新闻媒体等传播手段,用好国际赛事等交流平台,深入挖掘话语体系创新表达,阐明中国深厚的文化基因,客观描述、正向表达中华文化发展取得的成就,让世界了解中华文明、了解中华民族精神,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条件,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力量。

### 结语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宣传、思想、文化领域发展理念的集大成,是文化建设的行动指南,为新时代新征程

的文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具有内在的可行性、必然性。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阐述了中华文明的显著特征,明确了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的文化使命,汇聚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发展的力量,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征程上,应当肩负起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历史重任,深化对中华文明的认识,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秉持开放包容的文化发展理念,超越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坚持守正创新的辩证统一,既要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之“正”,又要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魂脉之“正”,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更要守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之“正”,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沃土,把握人民主体地位,实现中华文明的自我革新与社会主义文明的中国式建构;还要守中国共产党领导权之“正”,不断开辟新思路、拓展新形式、塑造新话语,推动中华文明行稳致远,绘就百花齐放的人类文明新图景。

####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
- [2]习近平在陕西延安和河南安阳考察时强调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不懈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9(1).
- [3]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N].人民日报,2023-10-09(1).
- [4]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11.
- [6]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3-14.

- [7]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N].人民日报,2023-03-16(2).
- [8]习近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J].求是,2023(20).
-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07.
- [1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11]习近平.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9-23(2).

责任编辑:陆姝彤

#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进路研究

吴布林, 李佳艺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桂林 541004)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做好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具有重要引领作用。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新的文化使命”为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的时代内涵铸魂赋能;以“七个着力”系统回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核心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同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构成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具有典型的体用关系特征。针对新时代新媒体舆论宣传的发展态势及存在问题,应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构筑“信念之基”宣传新高地,塑造“可敬可爱”中国形象,坚持“人民至上”创作导向,推动工作“守正创新”,更好地推动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体用关系;进路导向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2.002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2-0012-08

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sup>[1]</sup>。新媒体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平台,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宣传阵地。近年来,学界以舆论宣传工作为主题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目前学界对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主流媒体、官方政界媒体如何开展宣传及传统新闻报刊如何融合发展等方面。本文通过进一步明晰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于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的时代内涵和核心要求,针对新媒体舆论宣传发展存在的问题,阐明习近平文化思想与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的体用关系,进而提

出做好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的进路,以供借鉴。

##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于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的时代内涵和核心要求

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回答了在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要举什么旗帜、走什么路、实现什么目标、坚持什么原则等根本性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武器。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需进一步深入理解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的时代内涵和核心要求。

(一)从“新的文化使命”明确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的时代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的重要论述,系统阐明了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

收稿时间:2024-03-25

基金项目: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XDJ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吴布林,男,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党建理论与实践、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李佳艺,女,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

肩负着讲好中国故事、弘扬正能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群众、服务群众,服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国际影响力等时代使命。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用手段创新来破解工作难题;要适应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的新情况,利用新技术新应用占领信息的传播制高点<sup>[36]</sup>。2014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提出:“要一手抓融合,一手抓管理,确保融合发展沿着正确方向推进。”<sup>[36]</sup>2015年,习近平在视察解放报社时提出:“读者在哪里,受众在哪里,宣传报道的触角就要伸向哪里,宣传思想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就要放在哪里。”<sup>[36]</sup>2016年,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优化战略布局,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sup>[4]</sup>2017年,习近平在致中国记协成立8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sup>[5]</sup>2019年,习近平在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sup>[6]</sup>2022年,党的二十大对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主流舆论新格局塑造、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把握等方面提出了要求。

2023年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了新的文化使命,即“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sup>[7]</sup>,赋予了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守正创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自强、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的时代内涵。

(二)从“七个着力”明晰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的核心要求

2023年,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作出的重要指示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指明了方

向,也为做好新媒体舆论宣传文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七个着力”从多维度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进行了阐述,因而新媒体行业应从“七个着力”角度觅得舆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新形态。一是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sup>[8]</sup>。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治国安邦的重要内容。历史证明,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旁落,就容易出现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将坚持党的领导放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首位,充分说明了党的领导的重要地位。近年来,无论是区块链技术的产生,还是“互联网+”网信事业等领域的重要成就,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二是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sup>[9]</sup>。任何轻视和脱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行为,都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化<sup>[9]</sup>。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风险,决定了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必须围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展开。新媒体要通过大数据、云平台、微宣传等信息技术手段,搭建多类目宣传平台,切实巩固网络“红色阵地”。三是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sup>[10]</sup>。舆论宣传工作在本质上就是价值观的碰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精神的体现,凝聚着全国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新媒体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们生活相联系,落实落细落小工作,将新媒体用“活”。四是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sup>[11]</sup>。马克思指出:“报刊能够使物质的、血肉的斗争变成思想和精神的斗争。”<sup>[12]</sup>这充分体现了媒体舆论传播的重要性。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新闻舆论方向提出的指引,是全过程各方面的。新媒体要主动融合主流媒体,在主流媒体的引导下,提高自身的传播力、导向性、影响力和公信力,掌握新闻传播的正确航向;用数字化创新舆论表达,实现新媒体内容年轻化、智能化,重塑直播、微博等公信力,实现新媒体平台不断破圈。五是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sup>[13]</sup>。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久不衰,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发展。比如,岳麓书院深植湖湘文化,展现湖湘地区实事求是的精神品格;《中国婚礼》用节目形式生动展现和美家风,增强文化自信;人文历史纪录片《中国》,展现

了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等。新媒体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要发挥自身独特优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文化人,提高文化传播效果。六是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sup>[1]</sup>。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期,决定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轮驱动”的方向,决定了新媒体开展文化建设的时代使命。七是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sup>[1]</sup>。新媒体作为当前世界广泛运用的交往工具,起着联系世界各地人民的作用。通过新媒体可以让世界人民倾听中国声音、了解中华文明,实现美美与共。近年来,“新媒体+体育”广泛传播了中华体育文化,“新媒体+洋网红”增加了讲中国故事新力量,“新媒体+汉服”提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机活力等,都有效地展示了新媒体的力量。新媒体要以跨界联动形式助力中华文明的多元传播,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 二、新时代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的鲜明特征

习近平文化思想同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是内容与形式有机统一的关系,体现了鲜明的体用关系特征。

### (一)明体方可达用

明体达用,首先要求我们对主体有着清晰的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为重要面向,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新媒体舆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内涵外延和路径等理论遵循之“体”进行了深刻阐释。第一,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篇的新篇章,赋予了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之“新体”。回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历程,习近平因势而谋,提出一系列原创性论断,是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的最新理论遵循。例如,就文化使命而言,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新了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之体;就舆论工作而言,从提高新闻舆论“四力”到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创新了如何进行舆论宣传之体。这一系列重要论述表明习近平文化思想全新定位了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的路径导向。第二,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文化属性,明确了新媒体文化之“本体”。新媒体文化与传统

文化的区别在于它是一种由传播技术的变化带来的文化多元现象<sup>[10]</sup>。习近平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时代背景,明确了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的文化属性。其一,始终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滋养,守好“根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突出优势和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要推动新媒体文化产品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赓续中华文脉。其二,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本遵循,守好“魂脉”。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sup>[11]</sup>党的文化工作要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创造人民喜闻乐见的社会主义文化产品。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使其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展现新气象新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之“大体”,只有深刻理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之“大体”的基本原则和理论内涵,才能更好地明晰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的重大意义和战略布局。

### (二)以体决用,以用强体

若只谈“体”而忽视“用”则容易陷入“体用”二元割裂的困境。“明”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之“大体”,“达”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之“新用”。习近平文化思想不是囿于书斋中的纯思,而是直击社会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实践理论。习近平对文化建设理论的深刻阐释,是为了更好在文化工作布局上实现体用贯通,因而必须贯彻落实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各领域全过程。比如,“新的文化使命”要求了“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建设网络文明”<sup>[7]</sup>,回答了要建设什么样的网络文化的问题;反之,对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的创造可以在新的起点上推动文化的繁荣兴盛,实现新的文化使命。又如,“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要求“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反之,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的发展可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供新机遇、优化理论体系。对全媒体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的实践效能是各方面全方位的;全媒体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有效开展也将进一步促进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更加健全。

由此观之,以体用关系分析新媒体舆论宣传工

作,以“新体”达“新用”,以“本体”固“本用”,可以赋予其新的价值意蕴和实践导向,进而助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繁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三、新媒体舆论宣传的发展态势及存在问题

新媒体发展从十年前的方“新”未艾到十年后的大“行”其道,从“相加”到“相融”再到“深融”,实现了新媒体宣传技术的革新、宣传阵地的重建、宣传主体的多变。新媒体因其超时空的传播能力和群众互动能力,被各方面力量当作介入宣传的工具,对国内外舆论生态环境具有重要影响,甚至影响国家发展道路抉择和国际格局重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工作,多次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极端重要性。2021年11月,在第四届世界媒体峰会的贺信中,习近平指出如何正确回答时代课题,广泛凝聚世界共识,媒体肩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sup>[12]</sup>。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做好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必须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媒体舆论宣传的发展态势及存在问题。

#### (一)新媒体舆论宣传的发展态势

为更好反映新媒体舆论宣传的发展态势,笔者对新媒体舆论宣传的网民规模及结构现状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主流媒体在新媒体平台运营现状。据抖音、快手官方数据,截至2023年12月,抖音、快手新榜指数排名前十的均为主流媒体官方账号,其中抖音平台排名前三的粉丝量为人民日报1.68亿人、人民网6522.31万人、央视网5793.02万人<sup>①</sup>;快手平台排名前三的粉丝量为央视新闻7391.77万人、人民日报6730.03万人、人民网4091.83万人<sup>②</sup>;在公众号年发文量排名前三的平台为极光新闻东北网16614条、环球时报15184条、环球网15097条<sup>③</sup>。主流媒体已开设并运用超过740个的活跃视频号,发布超过百万条的视频作品<sup>④</sup>。数据表明,主流媒体

在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拓展宣传工作的表现形式,积极推动媒体一体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第二,用户在新媒体平台活跃情况。如图1所示,2023年我国的移动互联网用户呈上升趋势。结合图2可以看出,中国移动互联网行业中,短视频用户总时长占比28.0%,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已经成为移动互联网最活跃的平台;即时通讯占比21.9%,虽为第二大用户平台,但呈逐年下降趋势;综合资讯占比7.7%,与前两者相差较大。以上三类是当前我国比较活跃的新媒体平台,体现了当前互联网用户的使用趋向,有利于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找到重点实践面向的平台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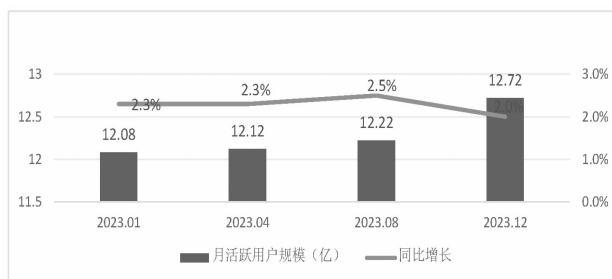


图1 2023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sup>⑤</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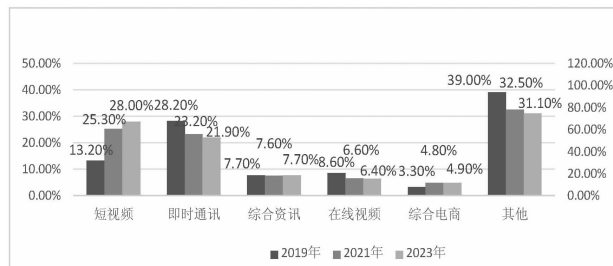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移动互联网行业细分中用户使用总时长占比<sup>⑥</sup>

第三,我国五大典型新媒体用户驱动的情况。据图3可以看出,当前由抖音、微博、快手、哔哩哔哩以及小红书构成的五大典型新媒体,截至2023年12月去重活跃用户的规模达到10.88亿,全网渗透率高达88.9%<sup>[13]</sup>。这说明我国新媒体平台的用户规模在逐年攀升,新媒体影响力日趋扩大,运营方向从流量驱动向内容驱动转变。

①新抖数据分析平台 <https://xd.newrank.cn/tiktok/accountRank/otherRank/likeRank>。

②新快数据分析平台 <https://xk.newrank.cn/account/rank/overall>。

③新榜公众号指数排行榜 <https://www.newrank.cn/ranklist/gongzhonghao/0/30>。

④“2023年主流媒体网络传播力榜单及解读”,<https://www.163.com/dy/article/IU7F0Q8C05526SET.html>。

⑤数据来源:《2023中国移动互联网年度报告》,<https://www.questmobile.com.cn/research/report/1752183696050458625>。

⑥数据来源:《2023内容视频化与商业化洞察报告》,<https://www.questmobile.com.cn/research/report/16786587237976350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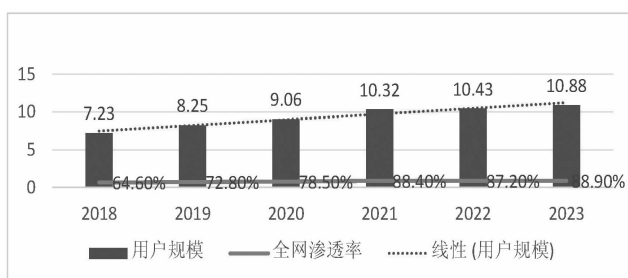


图3 典型新媒体平台去重活跃用户及全网覆盖<sup>①</sup>

## (二)新媒体舆论宣传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对新媒体现状进行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新媒体舆论场所呈现的普遍现象。与此同时,当前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新问题。

第一,网络宣传主客体泛化。新媒体宣传存在主体和客体两个层面。从客体受众角度分析(如图4所示),作为未来国家发展的主力军,19岁及以下的用户最喜欢的节目类型以娱乐类节目为主。让人担忧的是,知识型节目未在其喜爱节目类型之内,说明当前受众群体在新媒体平台不能得到更广泛、更高质量的知识获取<sup>[4]</sup>。从主体宣传角度分析,由于互联网快速发展、互联网覆盖率日益提高、网民结构日益年轻化等因素影响,导致新媒体的舆论传播主体复杂多样,知识水平参差不齐。虽然主播、网红等自媒体在进行直播发言或转发评论时受到法律法规的约束,但是由于宣传主体体量庞大,加之语言表达方式多样、文字隐晦的影响,部分不良内容可能难以被准确理解和及时发现。目前主流媒体积极发挥引导力,但是它们在短视频等自媒体平台发展不够成熟,数量上占比不高,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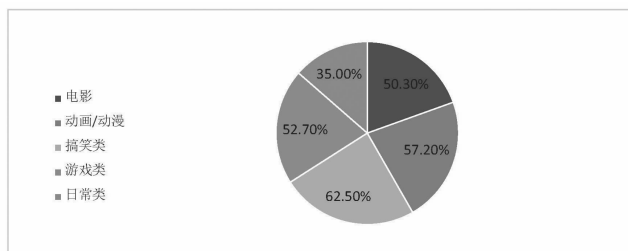


图4 19岁及以下用户喜欢看的节目类型比例<sup>②</sup>

第二,网络视听平台民营化。目前短视频、网络直播以及综合视频已经成为当前网络用户的主要活

动阵地,是网民进行日常交流、知识获取、新闻获取的主要渠道。因此,网络视听行业的兴衰、内容导向、规模结构等会对用户的意识形态产生深刻的影响。结合图5、图6、图7可知,当前综合平台中爱奇艺、腾讯视频、芒果TV、优酷、哔哩哔哩的市场份额高达89.5%;短视频平台中抖音、快手等的市场份额高达59.5%;网络直播平台中斗鱼直播、虎牙直播等的市场份额高达57.2%<sup>[4]</sup>。以上平台均为民营企业运营。由于新媒体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发布的信息主观性强,信息主体主要为个人或者某个独立的机构控制,易受到外来资本、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糟粕文化等影响,传播不良信息,进而对用户意识形态产生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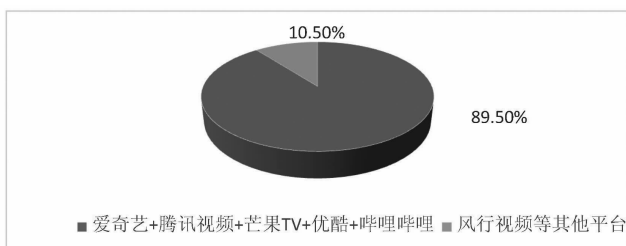


图5 综合视频市场份额分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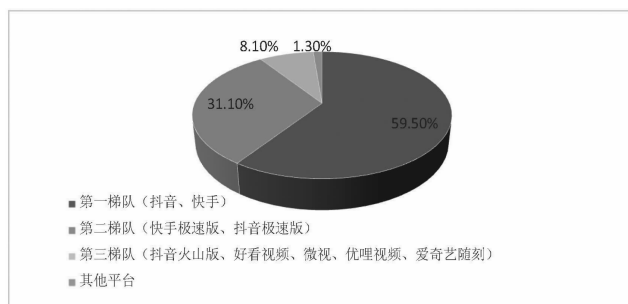


图6 短视频市场份额分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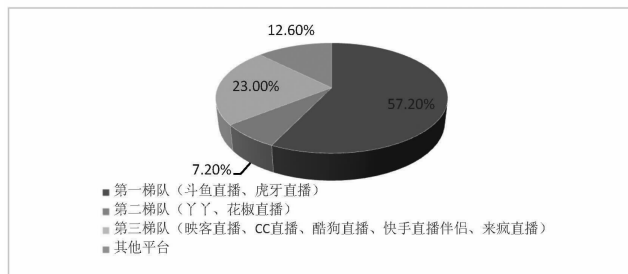


图7 网络直播平台市场份额分配<sup>③</sup>

第三,国际舆论传播复杂化。新媒体具有独特的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信息源,即以用户生成

①数据来源:Quest Mobile《2023 新媒体生态发展摘要》。

②数据来源:《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3)》。

③数据来源:《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



模式,官方信息和用户信息共同构成。这种独特的信息源呈现出传播效率高、速度快,传播覆盖度广,用户容易被其吸引等优势,但也正是这种特殊性使用户进入门槛低且传播渠道多样、信息分散,在传播过程中呈现碎片化的现象。这不仅使某些重大事件在没有被证实、处理的情况下就能够快速传播,也使国家形象宣传以碎片化的符号形态分散传播,国家形象被多元化、碎片化的内容拼接而成,这种间断的、未被处理过的信息容易被用户“抛弃”和“误解”。据图8所示,用户对于新闻资讯等重要信息主要通过新媒体的途径获得。网民对于新闻资讯的获得排名前三的平台依次是短视频平台45%、电视42.9%以及网络视频平台37.5%<sup>[14]</sup>。结合时代背景,网络空间已成为大国博弈的主要战场和重要武器。文化的国际传播影响力既受各国自身利益影响,也受价值观、民族风俗等文化层面差异的影响。新媒体在不同国家的传播存在多样化、碎片化并呈现伴随性的特征,可能会使得彼此的文化交流和互鉴出现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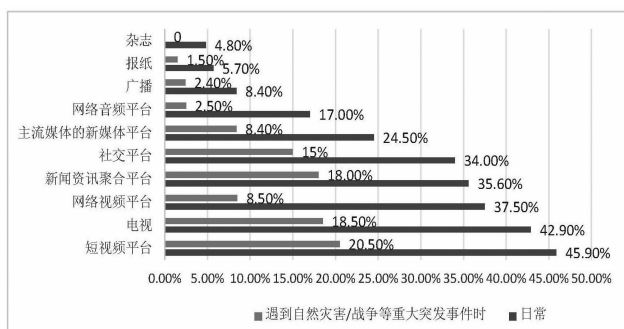


图8 网民获取新闻资讯的渠道<sup>①</sup>

第四,技术驱动差异化。科技从来不是实现人类目的的中立工具。当人类利用技术创新操控所处的环境时,技术创新也在重塑人类自身。例如,推荐引擎可能会限制选择范围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巧合成分,同时这种筛选也会根据人们过去的偏好限制文化多样性的传播。首先,据《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6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3.01亿人,占网民整体的27.9%;城镇网民规模达7.77亿人,占网民整体的72.1%,网络覆盖率存在城乡差异大的现象<sup>[9]</sup>。其次,由图9可知,2023

年国民上网使用设备如下:手机上网占比99.9%,台式电脑上网占比33.9%,笔记本电脑上网占比30.3%,电视上网占比22.5%,平板电脑上网占比26.6%<sup>[16]</sup>。可见,我国网民上网设备选择较多。基于上述分析,新媒体舆论宣传技术驱动面临操作的难度系数和复杂程度较大以及渠道多、创新难等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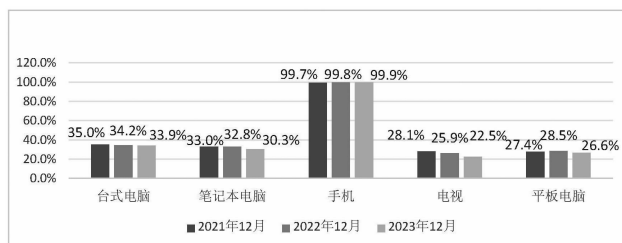


图9 网络直播平台市场份额分配<sup>②</sup>

#### 四、新时代做好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的进路

人类是“孕育文化”的物种。我们可以从文化的角度探寻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的实践路径,从文明的高度提出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的体系构建。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在宏观层面进行整体指导,在具体层面进行细节把控,以文化建设为出发点,对宣传文化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同时为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找到了新出路。因此,要完整准确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新时代新征程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高质量发展。

##### (一)构筑“信念之基”宣传新高地

方向明,则思路清。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在2023年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sup>[7]</sup>。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应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创作、宣传思想文化等工作时自觉与党保持高度一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新媒体平台构筑具有坚定信念的宣传新高地。

要加强主流媒体在新媒体平台的舆论宣传力度。首先,通过构建矩阵化账号来提升自己的曝光度,用好主流媒体的号召力,加强与其他高质量账号

①数据来源:《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3)》。

②数据来源:第51次、第52次、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

合作,提升自身的传播率和吸引力,并在这个过程中引导其他自媒体弘扬红色文化、树立正确的信仰、守好意识形态阵地。其次,重视新媒体平台建设,通过建立健全舆论引导的联动机制,宣传、教育和动员群众,凝聚人民群众思想行动于党的旗帜之下<sup>[17]</sup>。随着用户在新媒体平台的使用率日益增加,主流媒体也应跟随大众视野,扩大舆论阵地,深入群众。第三,将党管媒体不动摇原则贯穿新媒体领域,加强新媒体平台建设分类管理,完善各级党委政府新媒体建设,增强信息内容高质量产出机制,充分发挥政务新媒体部门制度优势,让党的声音永远占据首要地位。

### (二)塑造“可敬可爱”中国形象

习近平指出:“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sup>[18]</sup>通过新媒体平台讲中国好故事,唱中国好声音,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模式的交往,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民在价值意识层面达成的文化欣赏、文化认同。在文化多样性的语境下,中国形象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印象,新媒体要将传播性强、内容表现形式多元、群众互动性高的优势发挥到国际传播当中,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文化底蕴,宣传我国大国形象。

中国有着丰富多彩的故事,有着许多有趣的人物,在面对文化的国际传播时,我们的难点在如何将语言转化为内外受众群体能够理解的视角来传达。根据 NEW MEDDIA 新媒体数据库数据可知,2022年、2023年短剧在抖音、快手等平台“火速出圈”,例如热播短剧《二十九》(8.3亿)、《逃出大英博物馆》(4.2亿)、《拜托了奶奶》(9.5亿)以其播放量吸引了一大批粉丝。这些短剧还利用多元化的表达方式,反转紧凑的内容,让用户沉浸其中。新媒体平台应以加强舆论宣传,提高人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度,增进人民对其喜爱度和了解度,进而真正将其内化于日常生活。

### (三)坚持人民至上的创作导向

要提高新媒体平台与人民的互动性和观众黏

性,提升新媒体平台内容创作高质量发展。首先,坚持人民至上的创作理念,坚持走群众路线,在内容上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根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在内容宣传上进一步加强与群众的互动联通,及时把握群众的反应。其次,在创作主体上把充分尊重不同创作群体的个性化、差异化、创造性与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有机统一起来。由表1可知,新媒体平台的用户年龄、性别存在不同特征,在抖音平台中各年龄段的用户分布较为均衡,而快手平台中51岁以上的中坚力量占比比较突出,小红书、哔哩哔哩、微博的用户主要集中在35岁以下。新媒体平台应根据客体差异进行不同的内容投放。例如,25-35岁主体是具有新表达、新态度的年轻人,平台在投放内容时应当注意内容标题的新颖性、内容的年轻化表达。新媒体可以借鉴企业形象识别系统(CIS)理论(即价值观的理念识别、企业行为规范和企业服务的行为识别、企业视觉元素、视觉识别三个部分),进行舆论宣传工作。同时创新内容主体,把控舆论方向,使创造内容、宣传内容、监控内容等坚持人民至上与国家战略相结合、人民至上与社会价值相结合、人民至上与国际交流相结合。

表1 典型新媒体平台用户年龄画像<sup>①</sup>

|    |        | 抖音    | 微博    | 快手    | 哔哩哔哩  | 小红书   |
|----|--------|-------|-------|-------|-------|-------|
| 年龄 | 24岁及以下 | 22.5% | 33.3% | 29.9% | 39.7% | 33.0% |
|    | 25-30岁 | 13.9% | 21.1% | 10.4% | 23.8% | 18.5% |
|    | 31-35岁 | 11.6% | 17.1% | 12.3% | 20.4% | 17.5% |
|    | 36-40岁 | 10.1% | 14.7% | 12.1% | 9.6%  | 11.2% |
|    | 41-45岁 | 9.0%  | 5.4%  | 6.0%  | 1.5%  | 5.9%  |
|    | 46-50岁 | 11.3% | 3.9%  | 5.4%  | 2.9%  | 7.9%  |
|    | 51岁及以上 | 21.6% | 4.5%  | 23.9% | 2.1%  | 6.0%  |
| 性别 | 男      | 48.5% | 43.4% | 53.1% | 51.1% | 32.2% |
|    | 女      | 51.5% | 56.6% | 46.9% | 48.9% | 67.8% |

### (四)推动工作守正创新

在智能化时代,新媒体应紧扣媒体融合,推动工

<sup>①</sup>数据来源:QuestMobile《2023年新媒体生态洞察》。

作手段创新。首先,守正是创新的方向和依归。守正,则要继续保持主流媒体的传统优势,坚持内容为本,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传播正能量,发出中国最强音。新媒体应深耕主业。以央视财经新媒体为例,其以财经领域为根本,根据不同平台不同特点的情况制定不同财经内容,有效提升自身引领力,其各平台粉丝规模已经破亿,其微博在财经类微博中稳居榜首。其次,创新是守正的活力和基础。据 QuestMobile 数据显示,全网用户规模从 2019 年 11.34 亿人到 2023 年的 12.13 亿人,且人均单日使用时长达 7.1 小时。其中,短视频在用户总时长占比中,由 2019 年 13.2% 增长到 2023 年的 28%<sup>[19]</sup>,已然成为线上用户的主要聚居地。据 QuestMobile《2023 内容视频化与商业化洞察报告》显示,当前移动互联网正在向内容视频化方向发展,信息内容通过“视频+直播”的形式向人们传播新闻资讯、本地生活、旅游服务等内容,整体呈现出视频平台向多领域拓展,短剧在各渠道独占率高等特点。新媒体舆论宣传工作创新要基于当前发展趋势,依托短视频平台等,充分发挥短剧流量优势,升级新媒体矩阵,开拓终端渠道。

####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N].人民日报,2023-10-09(1).
-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84-85.
- [3]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4]人民日报社评论部.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
- [5]习近平致中国记协成立 80 周年的贺信[N].人民日报,2017-11-09(1).
- [6]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思想基础[N].人民日报,2019-01-26(1).

- [7]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
- [8]列宁.列宁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6.
-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9.
- [10]新媒体、新文化、新力量[J].传媒,2023(20).
- [1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1(14).
- [12]习近平向第四届世界媒体峰会致贺信[N].人民日报,2021-11-23(1).
- [13]2023 新媒体生态发展摘要[EB/OL].(2023-11-21)[2023-12-20].<https://www.questmobile.com.cn/research/report/1726888249161519105>.
- [14]《2023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发布[EB/OL].(2023-03-31)[2023-08-08].<https://sc.chinadaily.com.cn/a202303131S642636cca3102ada8b2361f4.html>.
- [15]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3-12-28)[2023-12-30].<https://www.cnnic.net.cn/n4/2023/1228/c88-10829.html>.
- [16]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4-03-22)[2024-03-23].<https://www.cnnic.net.cn/NMediaFile!202410325/MAIN1741355296414FIQ9XKZV63.pdf>.
- [17]吴布林,许钢.党对重大突发事件新媒体舆论场主导权研究回顾与展望——基于 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可视化计量分析[J].临沂大学学报,2023(6).
- [18]习近平.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7(2).
- [19]2023 内容视频化与商业化洞察报告[EB/OL].(2023-12-28)[2023-12-30].<https://www.questmobile.com.cn/research/report.html>.

责任编辑:刘菊香

#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民性论析

黄盈盈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广西南宁 530008)

**摘要:** 人民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属性和最鲜明的理论品格。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蕴含着深厚的人民性品格。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指明了造福人民的价值旨归、彰显了尊重人民的价值原则,深刻回答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建设和发展属于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

**关键词:** 习近平文化思想;人民至上;文化建设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2.003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2-0020-05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习近平文化思想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发展道路,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深刻反映了习近平深厚的人民情怀。

## 一、人民至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立场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时俱进的发展成果。习近平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sup>[1]</sup>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价值立场。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使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人民性在新时代的中国得到充分实践。人民至上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鲜明的价值立场,回答了我国的文化建设和发展属于谁、为了谁、依靠

谁的根本问题。在2023年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就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出了坚持守正创新的要求,强调“新时代的文化工作者必须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sup>[2]</sup>。在文化建设中,守正就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

### (一)坚持人民地位至上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sup>[3]</sup>这一要求凸显了人民在文化事业、文艺创作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从国家性质来看,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该性质决定了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政

收稿时间:2024-02-26

基金项目:南宁职业技术学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中心专项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黄盈盈,女,南宁职业技术学院思政课教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治制度与国家法律层面保障了人民至高无上的主人翁地位。从执政党的性质与宗旨来看,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所做的一切努力和奋斗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正如习近平说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sup>[4]</sup>人民是江山,是国家的主人,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党在领导人民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中,无疑是把人民放在至高位置的。

## (二)坚持人民利益至上

对于人民性的内涵,习近平指出:“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sup>[5]</sup>人民性体现在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各项工作中。习近平多次强调文艺创作、文化建设要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打造高质量的文艺作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至上”内在蕴含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准则,强调了人民在治国理政各项事务中的首要地位。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站稳人民立场,将人民利益至上的理念落实到各项实际工作中。

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坚持人民地位至上、人民利益至上,落实到实践中主要体现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发展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文化;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人民群众,创作出真实反映人民生活、如实反映人民愿望,引导人民向上向善的文艺作品,用优秀的作品告诉人民群众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否定和反对的;切实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文化创作和文艺作品深入人心,打造人民群众真心喜爱的文化产品和文艺作品,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近年来,“科技+文化”“数字+文

化”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了多形式、多样化的感受和体验文化的渠道,如西安大唐不夜城推出的“盛唐幻镜”,运用AR技术,让游客看到大明宫含元殿等绚丽景象,以沉浸式的体验方式感受历史文化,从而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提升文化自信。这些都是体现人民性的生动实践,人民性贯穿了文化作品和文艺创作的内容、形式以及传播方式。属于人民、为了人民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文化思想回应人民之问、关注人民之呼、围绕人民之需,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生动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

## 二、造福人民: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旨归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这一初心和使命引领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强国大业,而文化繁荣发展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一新概念,明确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sup>[2]</sup>。这为新时代新征程的文化和建设指明了方向。

### (一)坚持文化建设为了人民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世界其他政党的根本所在。《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sup>[6]</sup>这两个“绝大多数”深刻指明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坚定的人民立场。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sup>[7]</sup>对于“为什么人的问题”,毛泽东的答案是“为人民服务”。他明确告诉我们,文化领域的一切文艺创造都是为人民大众的。自此,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所进行的文化建设、文艺创造就有了明确的人民立场。2014年10

月,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也指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sup>[8]</sup>这两次座谈会相隔了72年,时空早已改变,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的是文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这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所进行的文化建设,一定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人民精神富足是新文化使命的根本目的。人民的需要是文化事业的根本价值所在,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正是现代文明的发展目的。习近平指出:“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sup>[9]</sup>这一论述凸显了“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在文化繁荣发展乃至国家、民族发展中的重要性。党的二十大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九个本质要求”,其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两个本质要求都蕴含着为了人民的文化建设目标。同时,党的二十大明确了未来五年文化建设的一大目标任务是“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sup>[9]</sup>。由此可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共同富裕,内在蕴含着为人民谋幸福的文化目标。因此,文化建设要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只有始终坚定一切文化建设为了人民,才能真正实现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更好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 (二)坚持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价值目标的体现。习近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文艺,本质上是人民的文艺”,“优秀的文艺作品不拘于一格,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sup>[9]</sup>。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文化艺术作品要多层次、全方位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也说明了文化艺术创作要多样化、全覆盖,让文化艺术作品更多惠及全体人民,由人民共享。为了让文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更好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更高的文化服务水平和更优的文化作

品服务人民。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发展,当今社会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已不再局限于线下,还有线上,数字化阅读平台已成为重要的网络公共文化设施。在数字化阅读领域,农村属于比较薄弱的区域。为了补齐这一短板,使文化资源更均衡,近年来国家注重建设数字农家书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明确指出,要推进农家书屋数字化建设,建立智能化管理体系。同时,线下的公共文化设施也得到大力发展。目前我国已有公共图书馆3000多个,博物馆和文化馆数量超过了1万家,并且全国所有的公共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均免费向人民群众开放。此外,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逐步展开。2024年1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提出“改进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向村庄、集市等末梢延伸,促进城市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增加有效服务供给”,“坚持农民唱主角,促进‘村BA’、村超、村晚等群众性文体活动健康发展”等要求。这些举措真实有力地体现了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引领下,我国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全国人民得以共享越来越丰富的文化发展成果。

### (三)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文化发展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针对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经济政策。”<sup>[9]</sup>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本质上都是为人民服务,都必须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但二者各有侧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艺创作、文化建设得到良好发展,产生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如《上甘岭》《问苍茫》《侦察英雄》《何以中国》等。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文艺创作领域,还存在一些善恶不辨、是非不分,脱离现实、脱离人民大众的作品;有的文艺工作者甚至宣扬拜金主义,把作品当做追名逐利的“摇钱树”等现象。如此创作出来的作品不仅伤害了文艺行业,更损害了人民的精神生活,

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文化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保障了人民的利益,彰显了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原则。比如,近年来电视“套娃”式收费和操作复杂等现象备受热议,很多群众深受困扰。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2023年11月发布了《互联网电视业务技术要求》《有线电视业务技术要求》等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标准,对互联网电视、IPTV、有线电视这三种电视终端的付费提示、操作流程、开机时间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2023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加快推进视听电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针对电视“套娃”收费等现象开展优化电视收视体验行动。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数据,截至2023年底,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等问题的治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实现了“开机看直播、收费包压减50%、提升消费透明度”的目标<sup>[10]</sup>。治理后,有线电视和IPTV全面取消了开机广告,实现开机时长由原来的最多118秒缩减到不超过35秒,单个终端收费包由原来最多86个压减到不超过6个,极大地减少了“套娃”收费,切实提高了用户的获得感。这些措施和成绩,彰显了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原则,切实维护了人民的利益。

文化建设和发展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要求。同时,只有在文化建设中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才能使我们的文艺创作和文化发展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始终朝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才能确保我们的文化事业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并不是不要经济效益,而是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文化产业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力量,是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好的文艺作品和文化产品一定要兼具社会价值和市场价格,才可以既增加人民精神文化财富,又增加国家物质财富。

铸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人民性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

的鲜明特点。这一价值目标导向贯穿于党领导的一切文化建设和文化工作中,体现在文化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实践中,体现在文化发展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上,体现在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引领着我们国家的文艺创作、文化建设、文化体制改革始终朝着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不断提升人民在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中的获得感。

### 三、尊重人民: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原则

情系人民、尊重人民,是习近平的民生之情,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原则。习近平有着深厚的人民情怀,他所关注的人民不是抽象的概念、虚构的形象,而是现实的、真实的、朴实的人民大众。习近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他多次强调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文化建设的主体,要做人民的小学生,向人民学习,尊重人民。

#### (一)坚持文化发展依靠人民

人民是推动文化建设、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的主体。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成果,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文化建设领域的坚持与运用,是对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同时也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坚持和发扬。习近平始终强调人民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始终强调人民作为文艺表现、文艺创作、文化建设的主体地位。在文化强国建设中,人民既是文化建设的享有者,也是文化建设的参与者,发挥着主体作用,文化强国目标的实现需要依靠人民的力量。2023年全国“村晚”示范展示活动举办2万余场、参与人次约1.3亿<sup>[11]</sup>;2024年春节期间,广大人民的旅游休闲、文化消费等需求集中释放。据文化和旅游部2024年2月18日数据显示,全国国内旅游出游4.74亿人次,同比增长34.3%<sup>[12]</sup>。这些数据生动体现了人民群众在文艺创造、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文化艺术创作、文化事业发展既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意愿,又要深入理解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真理,紧紧依靠群众,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发挥人民伟大力量,勠力同心建设文化强国。

## (二)坚持人民是阅卷人

习近平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sup>[13]</sup>这为我国文化建设、文艺创作的评判标准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强调要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文艺作品的好坏必须由人民来评判,好的文艺作品一定是能经受住人民检验的作品。也只有经得起人民检验的文艺作品,才能真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随着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升,人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和文化艺术作品各方面的要求也不断提高,这就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出更高质量的作品,才能更好地发挥以文化人、以德育人的作用,真正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2024年初火爆出圈的“哈尔滨”充分展现了文化旅游的力量,爆火的背后除了有哈尔滨美丽的冰雪景色,更重要的是哈尔滨尽可能满足游客的需求,提供周全的设施、符合南方特性的服务。该过程中不仅有当地政府高度重视,还有很多当地市民自发免费接送游客等,千方百计提升游客的满意度和体验感,这是对人民是阅卷人的生动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人民是阅卷人,要求在文化建设中,把人民当做我们党文化工作的裁决者和评判者,把人民的文化需求是否真正得到满足、人民的精神生活是否真正得到改善作为评判党的文化工作的标准。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民性品格主要体现在人民至上的文化价值立场、造福人民的文化价值旨归、尊重人民的文化价值原则等三个方面,三者是紧密联系、相互联通而又各有侧重的。从立场维度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社会主义文化本质上是人民的文化,强调在文化建设中始终要坚持人民至上,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从目标向度看,社会主义文化的人民属性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必须以造福人民为价值旨归。从过程维度看,人民的文化建设为人民,人民的文化建设依靠人民,人民至上的文化价值立场与造福人民的文化目标内在要求尊重人民、凝聚人民的力量推动文化建设。

##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2).
- [2]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
- [3]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12-15(2).
- [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63.
- [5]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48.
-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2.
-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57.
- [8]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2).
- [9]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 [10]马爱平.有线电视和IPTV开机广告全面取消[N].科技日报,2024-01-24(2).
- [11]李延霞,刘慧,刘开雄.以人民为中心推动文化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系列述评之八[N].人民日报,2024-01-30(2).
- [12]权威数读——这个春节有多火热?这组数据告诉你![EB/OL].(2024-02-18)[2024-02-25].<http://www.news.cn/20240218/c26597b046a14d6f9c8de3b086ad6442/c.html>.
- [1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43.

责任编辑:祝远娟



# 毛泽东奠基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探索及其意义

廖小明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成都 610071)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初步探索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奠基作用。毛泽东奠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合理性上在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涵盖了现代化;历史必然性上在于中国必然开启现代化中国方案;实践务实性上在于中国只能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毛泽东奠基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实践在于通过“一化三改”形成基本条件,通过辩证认识主要矛盾提供问题基础,通过布局“三位一体”建设成为基本图谱,通过强化独立自主精神提供动力源泉。毛泽东奠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意义在于提供了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立场、观点、方法启示和理论创新参考;实践意义在于提供了中国搞现代化实操层面的规律依循、方向指示、问题场域和方法参考。

**关键词:**毛泽东;中国式现代化;奠基;主要探索;意义价值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2.004

[中图分类号]A84;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2-0025-08

党的二十大正式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具有丰富理论内涵、历史逻辑和实践价值的概念,有其历史渊源。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开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初步探索,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奠基作用。从必然性、探索实践及其意义上梳理和总结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奠基作用,不仅能够更好厘清中国式现代化的来龙去脉,更能增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自觉,更好把握历史主动。

## 一、毛泽东奠基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性分析

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都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探索出了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理论指导、历史依循和实践逻辑。毛泽东奠基中国式现代化就是深刻认识和把握这种理论特定性、历史特殊性和实践必然性的结果。习近平指出:“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

收稿日期:2023-12-26

基金项目:2022年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SC22ZD001)。

作者简介:廖小明,男,中共四川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后,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建设。

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sup>[1]</sup>毛泽东是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先行者,其深邃的理论思考,对历史必然性的独特把握和探索实践的胆魄与毅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一)从理论合理性看: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涵盖现代化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sup>[2]</sup>毛泽东奠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依循蕴含于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思考之中。现代化理论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综合性的理论体系,内含一定的价值主张和逻辑必然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现代化的认识,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必然趋势的展望。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并不是现成的完备的体系,更不是可以“依葫芦画瓢”简单照抄照搬的教条,必须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中赋予其时代特征、中国特色和实践特色。

1.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从宏观上提供了社会主义国家推进现代化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行动指南,就必须认识到这种指导不是机械的、教条式的,而是要在其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基础之上推进认识具体化和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进行了关于现代化的诸多思考,但没有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出系统性理论,原因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的设计是社会主义扬弃了资本主义的一切成果和不足,突出社会主义的超越性。马克思、恩格斯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见证者,对西方式现代化进行了反思,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矛盾、前途命运,为各民族走出一条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预言和方向性设计,其实质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马克思认为,现代化不仅是过去与当下的时间问题,也是关乎先进与落后的价值问题,是各民族共同的趋向和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代化的认识具有三个特点:一是认为现代化基于生产力发展要求,是

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综合发展和变革的必然趋势;二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展示了资本主义的繁荣却不是全盘皆好,资本主义现代化本身具有难以克服的资本支配逻辑的缺陷;三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需经过现代化到超越现代化的历史性转变。

2.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的“落地”,体现在毛泽东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容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代化的理论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指导,从一开始就不可能让人简单照搬照抄,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化的认识相对集中在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弊端及其恶果的批判上,对未来社会现代化的思考是趋势性、整体性的。因此,任何简单化、机械化和教条化的照搬照抄都不可能成功。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同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思考是一致的,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一方面,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思考中包含着对马克思恩格斯所有理论革命化、实践化的一般方法和启示。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sup>[3]</sup><sup>516</sup>中国革命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如此。苏联的现代化以及在其影响下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方案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都不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可以直接复制的样本。中国的现代化只能靠中国人自己在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理论的精髓中找到方法和启示。因此,在全国革命即将胜利之际,毛泽东发出“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号召<sup>[3]</sup><sup>437</sup>。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全新命题。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从开始注意学习苏联经验到后来反思苏联模式弊端,及时看到了苏东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不可复制性,认识到中国搞现代化必须在理论上认识清楚中国的实际情况,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代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于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实际,在“结合”中形成有关中国搞现代化的理论。为此,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理论著说,而且要求大家认真研究问题,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用以指导解决现代化建设实际问题,这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上实现“结合”和创新发展,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要蕴含。

(二)从历史必然性看: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必然开启现代化中国方案的基础版

习近平指出:“国情不同,现代化途径也会不同。”<sup>[4]</sup>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是一个需要把握历史必然性要求的重大命题。从中国历史和现实构成的宏大视野中把握历史必然性,构成毛泽东奠基中国式现代化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

1.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全面深刻变化的一个过程,体现历史必然性。现代化概念最早从西方传入,主要表现为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法治化、技术进步化等,对此可以从经济发展、工业化进程、动态实践、人的心理等方面认识<sup>[5]</sup>。因此,从根本上说,现代化是后发国家走向发达的一个客观的历史必然的过程。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指出的那样:“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sup>[6]</sup>毛泽东认为,中国具有自身的历史发展特点和诸多客观条件,这就决定了中国搞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能简单照搬任何一种现代化方案。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语重心长地说:“如果完成了全国革命的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sup>[7]</sup>毛泽东很早就指出:“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sup>[8]</sup><sup>[6]</sup>那么,发展到社会主义后就必然是建设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2.毛泽东对近代中国求索现代化方案的失败有深刻认识,体现出对历史自觉的把握。1840年开始,西方国家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对中国进行侵略与掠夺。虽然当时中国的仁人志士和各种社会

力量竭力探索过西方现代化的不同理论主张和实践模式,但最终都失败了。这具有历史必然性,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论和方案“水土不服”。毛泽东对这个基本历史事实的认识非常深刻,他指出:“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sup>[8]</sup><sup>[5]</sup>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在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历史境遇下思考和谋划,并且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变革和现代化建设,这本质上是历史自信和政治自觉。

3.毛泽东在领导各族人民向苏东国家学习现代化的进程中洞见了苏联式现代化模式的弊端。列宁不仅领导俄国革命取得了成功,而且大胆探索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了以新经济政策为基础的一整套现代化建设的方案,可以说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但是,这样的理论、道路后来模式化了,在实践中又越来越僵化。东欧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苏联,尽管有南斯拉夫等个别国家试图开创具有自身特点的现代化,但是在苏联的干预下没有真正走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各族人民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针对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全新的命题,毛泽东一开始号召全党注意学习苏联的经验,但很快认识到苏联模式的弊端,转而提出“以苏为鉴”。毛泽东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sup>[9]</sup><sup>[2]</sup>这体现了毛泽东对苏联现代化模式的深刻洞见,他在对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开启了探索中国自身特点的现代化的历程。

4.毛泽东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中把握中国搞现代化的特殊复杂性。毛泽东认识到,从中国自身发展的历史规律看,缓慢按照资本主义发展一般规律和进程推进现代化的可能性因西方的侵略而被打断,故而只能从现实出发探索具有中国特点的现代化。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

和带领各族人民经过 28 年浴血奋战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并且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搞社会主义就应该而且必然搞现代化,对这种应该和必然的认识和把握,毛泽东最有发言权。社会主义社会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持续推进社会全面变革的社会,这种变革实质就是现代化的过程。从历史必然性看,植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社会制度模式和文化发展样态,内在地蕴含着现代化的必然方向,但这种进程被西方的侵略打断了,使得中国从自身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出发选择中国特色现代化具有可能性和必然性。现代化起源于西方,但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什么是符合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系统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之问,为延续百年的现代化“道路之争”画上了圆满句号。经过系统深入的思考,毛泽东逐步形成了关于中国搞现代化的基本认识。1953 年 6 月,毛泽东从中国建设现代化的实际出发,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三)从实践务实性看:中国只能也必然走中国式现代化之路

从 20 世纪 50 年代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实践看,中国只能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毛泽东深谙这个道理,引领人民选择并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是顺应历史之举,也是适应现实实践的根本要求。

1.毛泽东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世界现代化的深刻变革中认识到中国只能搞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从 20 世纪 50 年代看,西方国家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后,其现代化在挫折中得到发展。美、英、法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战胜国重新调整和优化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方案,突出科技革命的带动作用,引领着世界现代化的主流和方向。德、日、意等战败国则在《雅尔塔协定》等文件所确立的以联合国为基础的新的国际秩序下恢复重建并走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许多国家独立后也纷纷开始探索自身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这说明现代化是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但各国的事实证明每个国家和地

区的现代化方案不是也不可能是同一个模式。非自主的国家和地区可能会被被动地复制一种主导和支配国家和力量的现代化,而独立国家往往会探索自身的现代化之路。毛泽东对世界现代化的这种深刻变化是有全面系统的认知和把握的,其中包含着对西方现代化的批判性思考。

2.毛泽东科学认识到了中国现代化自身的客观要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在马克思主义引领下,参照苏联模式探索一种基于计划经济的以工业现代化为主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虽然这种模式总体上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历两个阶段的理论判断和发展预测,但有不少自身探索的特色,如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模式。这在事实上告诉我们,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都不是一个完全同一的模式,一定是统一性之中充满多样性,同一性之中蕴含着差异性。毛泽东敏锐地把握了这种历史实践的要求和人民的期待,提出了一系列富于时代特色、中国特色和实践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并且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初期得以展开、丰富和发展,体现中国特色和优势。这种认识集中在对中国人民对现代化的渴盼的认识和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以及重大关系的思考之中,具有鲜明的唯物辩证特色。

## 二、毛泽东奠基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探索

毛泽东虽然没有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也没有形成成熟的有关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制度体系和实践体系,但是他在实践中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奠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

(一)“一化三改”:毛泽东奠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条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后建设新社会将要经历一个过渡时期。这样的时期本质上具有搞现代化的特点,必将扬弃以往社会积累的物质、制度和文化的。新中国成立以后,首先要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进而真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毛泽东领导人民推进“一化三改”,就是在事实上提供

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和其他条件。

1.毛泽东领导制定的“一化三改”方案直接明确了中国搞现代化的根本方向。“一化三改”明晰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既是现代化的一般特征和方向,也指明了中国现代化的必然方向。1952年9月,毛泽东提出“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指导思想和大政方针。1953年8月,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指出:“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sup>[10]</sup>1953年6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此进行讨论,毛泽东在会上首次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基本内容,明确了现代化的根本方向。

2.毛泽东领导下的“三改”本身奠定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和制度基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既是一般的非社会主义国家步入社会主义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更是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尤其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解决的问题,本身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和制度特色。社会主义改造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发展中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进而发展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三大改造”是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内容,是新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艰巨复杂的历史任务,是现代化的夯基垒土。“三大改造”融汇了毛泽东许多独特的思考,包括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等。这句话是针对我国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后出现的新矛盾而讲的,意在调整政策,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sup>[11]</sup>。

(二)辩证认识社会主要矛盾:毛泽东奠基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基础

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始终是推进社会建设、改革的前提和基础。现代化建设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对社会主要矛盾和重大关系有正确的认识把握。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建设实际更需要正确认识把握各种矛盾关系,为建设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重要前提和基础。

1.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奠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是确立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前提。毛泽东非常重视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把握。在革命战争年代,这种对矛盾的认识把握推进了中国革命的成功。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把握社会主义主要矛盾,不仅是认识改造中国社会的重要认识论基础,也是谋划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认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追求和平民主与反动派进行破坏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说是敌我的阶级矛盾。对此,党中央果断作出进行彻底革命的决断,推动未解放的地方加快解放,镇压反革命叛乱,始终把握中国社会矛盾演化发展的方向和整体进程,不断创造人民当家作主的条件。经过三年艰苦斗争,巩固了政权,形成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在这样的基础上,毛泽东创造性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判断,认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sup>[12]</sup>,并据此强调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sup>[13]</sup>。这在理论和实践上搞清楚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正确方向和重大目标任务。

2.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关系是奠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在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特别是现代化发展的根本方向。针对苏联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必须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指出“我国的经济建设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sup>[14]</sup>,保障人民生活基本需要。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毛泽东强调,要积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通过“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sup>[15]</sup>。事实上,中国现代化必须认识处理的重大关系非常多,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对“十大关系”的认识和把握上。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全面阐述

了十大关系:一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二是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三是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四是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五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六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七是党和非党的关系;八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九是是非关系;十是中国和外国的关系<sup>[924-41]</sup>。上述关系是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面临的诸多关系中影响大局和全面的重大关系。在毛泽东看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用哲学思维和方法论指导,统筹兼顾,处理好上述重大关系,把握现代化建设要领。

(三)“三位一体”建设:毛泽东奠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图谱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没有对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现成的方案。但是,我们从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基本设想中能够看到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涵盖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这三个方面。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领导的苏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涵盖了这三个基本方向。事实上,毛泽东在革命胜利前就对中国社会发展有思考和谋划。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和系统阐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并趋于成熟。其中,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纲领提供了“三位一体”建设的基本模式。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一化三改”,奠定了社会基本结构和制度基础。1956年8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指出:“这次大会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总的说来,就是总结党的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sup>[926]</sup>这一时期,毛泽东领导人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主要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展开,既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对社会基本结构的认识相一致,也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最基本的方面。“三位一体”既涵盖现代化建设的展开,又体现为全体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实质上已经确立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基本思路和基本方案。

(四)独立自主:毛泽东奠基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源泉

其一,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趋势性预测为毛泽东思考独立自主、奠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考主要表现于他们后期对东方国家走上社会主义之后如何发展的宏观展望和方法启示,这种思考和启示在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之中得到了发展。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思想要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代化的方法思考和苏联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做法的辩证认识。针对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要辩证地看待和学习苏联的现代化建设经验,不能照抄照搬,而是要独立自主地建设现代化。其二,毛泽东深刻理解和把握住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独立自主精神和主体力量。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凝结着中国人民进行伟大创造过程中的哲学思想、主体意志以及自立自强的精神品质。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实事求是”,本身就有独立思考的要求,也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结果。运用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就是要从中国特定的国情和历史出发,独立自主思考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和主体力量。

### 三、毛泽东奠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把握没有形成完整意义上的系统现代化理论,但是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考和探索实践对后继者认识思考中国为何搞现代化、搞什么样的现代化以及如何搞现代化有重要启示。毛泽东奠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其对后继者顺应中国历史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规律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律,自觉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

#### (一)理论意义

1.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强调必须重视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等基础性、支撑

性建设,为后继者认识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规律提供了重要观点和方法参考。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命题内含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探索现代化提供了观照。但这种观照不是简单的拿来即用,需要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创造性发挥和运用。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化建设的理论结合中国的特殊历史境遇,聚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和根本性问题,提出了探索中国自身特色现代化的思路 and 方向,形成了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比如,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sup>[19]207</sup>,后来又加上国防现代化。这在事实上明晰了中国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四梁八柱”。中国当时最为急需的就是建立起强大的工农业经济基础,发展科学文化事业,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这完全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建设第一阶段的设想,也符合列宁探索苏俄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做法。因此,毛泽东奠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自觉,在事实上为后继者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立场、观点和方法参考。

2.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强调注重处理重大关系。现代化建设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也涉及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国内与国际之间等许多重大关系,还涉及国家、集体、个人权利和利益等方面的关系,是一个综合性的理论认知体系 and 实践创新体系。如前所述,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全面阐述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等十大关系。这个重要论述不仅包含着重大的观点,也包含重要的方法论。比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处理好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指出:“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

理好。”<sup>[12]726</sup>此外,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伦理价值导向。毛泽东关于现代化的理论认知既包括丰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包含丰富的伦理价值观念主张。比如,他不仅重视和关心社会成员的个体利益,还明确指出“公私兼顾”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重要动力,“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sup>[12]728</sup>。这一主张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对后继者在继续探索现代化进程中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提供了重要观点和方法参考。

## (二)实践意义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从根本上说,毛泽东奠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推动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要求。为何搞现代化、搞什么样的现代化和怎样搞成现代化,这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绕不开的问题。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自主探索现代化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历史必然。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sup>[4]</sup>

其一,毛泽东从历史实践中总结出中国的事情必须按照中国的实际办这一根本要求,以此逻辑推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58年3月,毛泽东在审阅王鹤寿的《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更快一些》的报告时批注道:“这个教条主义是我们自己的。由于我们硬搬苏联经验中一部分不适合我国情况的经验,由此产生了教条主义,不应把责任归于苏联专家。”同时他强调,要“反对教条主义,绝不是否定苏联先进而又适合我国情况的经验的作用,绝不是不要尊重苏联专家,绝不是不要继续学习苏联的一切好的经验”<sup>[4]</sup>。其二,毛泽东从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出发探索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引领、路线方针、制度基础、实践路径等。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从一开始就具有自身的特殊要求,既有历史形成的客观基础的要求,也有现实条件的客观要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建设

必然要坚持重大和根本原则,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规定性、人民群众的根本要求,在历史和现实构成的广阔视野下展开,形成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础版”。其三,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时空上的贯穿能力,其思考和实践提供了一种跨时空的现代化使命任务型路向。毛泽东领导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具有典型的使命任务特征,形成了党在国家和民族使命任务下思考现代化问题的思路和方法。这为后继者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把握历史主动、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提供了重要思路和方法借鉴。

####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12-27(2).
- [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2).
-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J].求是,2023(16).
- [5]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9-15.
-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2.
-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945.
-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9]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 7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0]毛泽东.毛泽东年谱:第 2 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72.
- [11]汪裕尧.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几个问题:读毛泽东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三篇著作[J].党的文献,1998(6).
- [12]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

版社,1986.

[1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 8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35.

[14]毛泽东.毛泽东年谱:第 3 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27.

责任编辑:刘菊香



# 习近平历史观的哲学意蕴

谢莉娅, 谢江平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200234)

**摘要:** 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 围绕历史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 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历史观。习近平历史观主张历史的人民性与实践性, 强调人民创造历史, 劳动开创未来, 要求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历史、辩证地评价历史是非与功过。面对隔断历史、虚无历史的错误认知, 习近平坚持全面把握历史的整体性, 充分尊重历史的客观性, 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历史。深入把握习近平历史观的哲学意蕴, 对于提升个人修养、推进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习近平; 历史观; 哲学意蕴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2.005

[中图分类号] D61; B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339(2024)02-0033-09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高度重视历史学习与研究, 围绕历史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对历史问题的论述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 吸收借鉴历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思想, 深刻回答了“历史的本体是什么”“如何认识历史”“历史有什么价值”“如何评价历史”四个重大历史问题。习近平历史观内涵丰富、意蕴深远, 梳理习近平有关历史问题的重要论述, 探究习近平历史观的哲学意蕴, 有助于深化历史认知, 探究历史发展动力, 端正历史评价标准。

## 一、历史本体论

本体论是探究“本原”与规律的哲学理论, 历史本体论主要回答历史存在的本原问题, 包括历史的本质、创造历史的主体和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等问

题。2013年习近平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指出“人民创造历史, 劳动开创未来”<sup>[1]</sup>, 深刻地回答了历史本体论问题。习近平关于历史本体论的回答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历史的人民性, 历史的主体是人民,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 二是历史的实践性, 实践创造历史, 劳动开创未来。人类文明的繁荣进步、中华民族的辉煌成就、人民的幸福生活都源于劳动。劳动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

### (一)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唯物史观认为,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还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毛泽东认为: “人民, 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历史的动

收稿日期: 2024-01-08

作者简介: 谢莉娅, 女,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1 级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 谢江平, 男,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分中心、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力。”<sup>[12]1031</sup>邓小平十分重视人民对历史的推动作用,指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sup>[13]</sup>，“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sup>[14]</sup>。习近平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sup>[16]</sup>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sup>[15]</sup>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人民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参与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体力量。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任何事业的成功，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习近平深刻认识人民的主体地位，高度重视人民在国家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习近平在治国理政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相信人民、发动人民、依靠人民推进社会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改革的实践主体和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将改革开放动力寄希望于人民，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激发人民主体作用，利用人民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与智慧，为改革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面对改革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挑战，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砥砺前行，开拓创新，破解了一个又一个难题，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扎实推动改革由浅入深。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充分证明，人民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成功的关键。人民“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sup>[16]314</sup>，历史由人民书写、创造和推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带领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关键在于党始终和人民站在一起，尊重人民意见，汲取人民智慧，凝聚人民共识，汇聚人民力量，依靠人民创造中华民族历史伟业。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sup>[17]63</sup>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生问题关系民心向背。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习近平关于人民主体重要论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生问题，不断夯实民生之本，增进民生福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判断为民生建设指明了方向。习近平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

精准定位民生短板，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建设全方面、多层次的民生保障体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补齐经济社会发展短板，强化经济社会发展弱项的生动实践。补齐贫困短板，让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同进入小康社会是增进人民福祉、推动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举措。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党中央以“两不愁三保障”为标准，有针对性地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落实基本民生保障，着力解决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经过多年努力，脱贫攻坚战赢得全面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彪炳史册的伟大历史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全方位提升。习近平在治国理政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抓住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致力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 (二)劳动开创未来

劳动是人的本质活动，劳动决定了国家的繁荣、民族的兴盛和人民的幸福，人类的前途命运依靠人民劳动创造。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都是实践的。实践是人和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前提，是人与自然、社会相统一的基础，实践在社会历史中具有本体论意义。“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乎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sup>[18]</sup>习近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思想<sup>[9]</sup>，提出“人类是劳动创造的，社会是劳动创造的”这一重要论断<sup>[10]</sup>。

“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sup>[11]16</sup>在习近平看来，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人本身的丰富和发展，还在于其对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作用。“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是对人类文明进步规律的重要诠释。”<sup>[11]3</sup>文明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正是劳动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整个人类文明史就是劳动发展史。通过劳动，人类不

断改造自然,以满足自身需要,使用、发明和改造劳动工具,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使劳动形态由手工劳动转变为机器劳动,再转变为数字劳动。随着劳动生产方式的变革,人类文明先后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等四种文明形态,劳动生产方式的每一次转型都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劳动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革,促进了整个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和更替。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都是劳动者劳动智慧的结晶。习近平充分肯定了劳动对人类文明进步的推动作用,主张发展创新性劳动,鼓励劳动者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科学劳动,携手创建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贡献。

劳动创造人民的幸福生活,造就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在习近平看来,“幸福不会从天降,美好生活靠劳动创造”<sup>[12]</sup>,“劳动创造了中华民族,造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sup>[11]</sup>,“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sup>[14]</sup>。习近平将劳动与个人、国家的发展联系起来,认为个人的幸福、国家的兴盛都依靠劳动创造。从个人层面看,劳动是财富和幸福的源泉,美好的生活、辉煌的人生都要通过劳动创造才能实现。劳动是人的本质活动,人在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劳动过程中,创造自己的主客观世界,实现对自己本质的真正占有。劳动不仅是人民满足自己和家人基本生存需要的手段,更是提升自己精神境界、促进自身全面发展、实现美好追求的途径。习近平鼓励人民通过劳动实现人生理想,号召人民投身国家建设,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为创造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贡献力量。从国家层面看,劳动与我们过去取得的成就以及未来能获得多大的发展密切相关。社会主义不是等来的,也不是喊来的,中华民族的辉煌成就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斗出来的。通过中华儿女的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我国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对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方面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解决新的时代课题,实现新的历史使命,劳动者唯有脚踏实地、奋勇前进,才能让梦想照进现实。

## 二、历史认识论

历史认识论,指如何学习历史、研究历史,正确认识历史的理论。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写道:“我们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sup>[13]</sup>在习近平看来,学习和研究历史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面对隔断历史联系、虚无历史事实的行为,习近平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强调“要牢固树立正确历史观,既不能隔断历史,也不能虚无历史”<sup>[14]</sup>。

### (一)全面把握历史的整体性,反对隔断历史联系

科学地认识历史,就是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整体地而不是局部地看待历史,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和过程。毛泽东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sup>[15]</sup><sup>[34]</sup>,“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sup>[15]</sup><sup>[33]</sup>。江泽民从文化的角度反对“割断历史”<sup>[16]</sup>。胡锦涛认为,历史是接续发展的,“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不断在以往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历史”<sup>[17]</sup>。在习近平看来,“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sup>[18]</sup><sup>[67]</sup>,历史是现实的根源,历史指引着未来。

全面把握历史的连续性与阶段性。历史的连续性指人们要在继承前人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历史的阶段性侧重历史的特殊性,强调每个历史阶段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面临各自的历史使命和历史任务。习近平认为,历史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要把历史阶段放在整个历史长河中进行考察。正确认识五四运动,除了要把五四运动放在整个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分析,还要“坚持大历史观,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华民族5 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来认识和把握”<sup>[19]</sup>。五四运动是国际、国内诸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五四运动不仅对近代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具有推动作用,对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乃至对现代中国的现

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在习近平看来,历史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对历史的认识不能拘泥于局部,以偏概全,要把历史事件放在整个世界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置于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全面了解历史事件产生的原因、过程及结果,准确把握其所处的历史地位,产生的历史影响。

全面把握历史的前进性与曲折性。唯物辩证法认为,历史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历史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习近平指出,任何国家、民族在发展道路上难免会经历曲折,但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历史向前发展,世界向前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sup>[18][273]</sup>。20世纪末,美国学者费朗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宣称历史将终结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人类社会形态将终止于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是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历史终结论”片面看待历史问题,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误归结为所有社会主义的失败,把社会主义暂时遭遇的挫折视为社会主义的终结,以历史的曲折性否定历史的前进性,彻底割裂了前进性与曲折性的联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辉煌成就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印证了历史向前发展的规律。全面把握历史的前进性与曲折性,必须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习近平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指明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区别与联系,强调“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sup>[1178-79]</sup>。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因为改革开放前走过弯路就否定这一时期的历史贡献,“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sup>[204]</sup>。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一脉相承、接续发展的。

## (二)充分尊重历史的客观性,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客观的,而非因主观随意创造的,历史发展的客观性不因个人的意志而改变。

毛泽东在党史研究中充分尊重历史客观性,以整个党的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对党的历史进行客观的研究<sup>[21]</sup>。习近平指出:“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sup>[21][2]</sup>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是由过去的人民的实践活动书写的,历史既不能任意选择,也不能随意改变,“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能改变历史和事实”<sup>[23]</sup>。

抵制历史虚无主义要尊重历史的客观性。习近平多次阐明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指出历史虚无主义“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sup>[24]</sup>。历史虚无主义忽视历史客观性,以“重构历史”“解构历史”“还原历史”等为由,主观随意裁剪历史,扭曲历史,虚无历史,是对历史的错误认知。日本右翼为否认侵略、美化殖民统治,对本国历史教科书进行了一系列篡改,把吞并朝鲜问题美化成增进朝民幸福,把侵华战争粉饰成帮助中国建设现代化国家,质疑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删除“慰安妇”的相关内容,等等。日本妄图通过混淆战争性质掩盖历史罪行,逃避历史责任,这种行为遭到日本广大民众和世界正义人士的激烈抨击。日本对历史教科书的篡改是对历史事实的严重扭曲。历史是实实在在地存在过的,“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sup>[25]</sup>。历史虚无主义解构历史事实,否定历史客观性,传播错误的历史认知,瓦解人们的历史自信和对国家的认同,对人们的历史观产生消极影响,对党和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要尊重历史客观性,看清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与危害,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抵制历史虚无主义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有效史料为支撑,加强史料整理与研究。唯物史观与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唯物史观从历史事实出发,充分占有历史材料,全面客观地分析历史,深入了解历史的本来面目,捍卫历史真相;历史虚无主义从主观出发,根据主观愿望选择历史材料,以主观假设为基础研究历史,使历史符合一定的政治目的。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意识形态的瓦解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20世纪中后期,以美国为首的西

方国家为抑制苏维埃政权的崛起,对苏联实行“和平演变”,利用大众传媒制造舆论,否定苏共历史贡献,抹黑苏联领导人形象,使历史虚无主义在苏联蔓延。苏联历史虚无主义从否定领导人斯大林,到否定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意义,最终演变成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以及整个苏联的历史。苏联的历史虚无主义否定、扭曲历史,盲目推崇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导致曾经叱咤风云的政党走向衰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并没有随着苏联解体而消失,尤其是随着中国日益发展,西方加强了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蓄意抹黑中国历史,否定中国制度。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习近平明确表示,要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以档案史料为支撑,对被抹黑、扭曲的历史有针对性地进行挖掘考证,把握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回应历史虚无主义的攻击。

### 三、历史价值论

价值,指客体能否满足主体的需要以及如何满足主体需要,即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历史价值主要考察历史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旺的真实记录,是前人的‘百科全书’,即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sup>[26]</sup>，“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sup>[22]12</sup>。习近平重视历史的价值与作用,强调历史要关照社会现实,服务于个人发展和社会需要。从社会的角度看,历史具有鉴镜功能;从个人的角度看,历史具有铸魂育人的作用。

#### (一)以史鉴今

“中国人自古重视历史研究,历来强调以史为鉴,我们的前人留下了浩繁的历史典籍。”<sup>[27]</sup>历史名言“欲知大道,必先学史”“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都蕴含着以史鉴今的治理智慧。毛泽东认为,我们不仅要学习历史经验,还要汲取历史教训。邓小平明确表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sup>[28]</sup>。习近平十分重视历史经验的学习,认为学习历史的“目的就是以史为鉴,更好的前进”<sup>[22]13</sup>。“历史是最好的老师”<sup>[6]508</sup>，“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sup>[7]287</sup>，“历

史是一面镜子”<sup>[6]522</sup>,历史事实、历史经验对当代社会发展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今天的人们不能脱离昨天的历史来把握今天、开创明天。”<sup>[29]</sup>一方面,学习历史有利于把握今天。历史记载了国家的发展轨迹,前人的各种治国之道。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能从历史中找到借鉴。要学习历史知识,了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从历史中探寻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途径。梳理历史发展脉络,了解来时的路,有利于准确地判断当前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和面临的历史任务,从而作出正确的决策。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以深邃的历史眼光总结了我国国家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准确判断了国家当前所处的社会形势,指明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另一方面,理解历史有利于开创明天。学习历史知识,掌握历史规律,有利于抓住历史机遇,顺应历史潮流。能否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把握历史规律,关系整个国家、民族能否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在经济全球化的带动下,国际分工深入拓展,全球资源优化配置,世界经济持续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开启与世界共赢发展的新时期。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孤立主义等逆全球化、反全球化倾向泛起,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习近平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全面审视逆全球化困境,牢牢把握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坚定不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努力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学习历史有助于增强忧患意识,警醒世人自立自强。中华民族是一个饱经风霜的民族,中国共产党是生于忧患的政党。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内含着忧党、忧国、忧民的责任与担当,强调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忧患意识以全球化视野审视政党、国家、人民所处的社会形势,对可能发生的危险保持警觉,提前做好防范。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团结带领人民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风险考

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中国共产党从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中得知,要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必须防范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高度警惕西方“和平演变”企图和意识形态的入侵。面对旧史王朝兴衰的周期率问题,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居安思危,不断寻找破解方法,最终探索出一条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正确道路,即坚持民主监督、勇于自我革命。牢记历史屈辱,反思历史过错,不是为了沉溺于痛苦,而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警醒世人奋发图强。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期,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面临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风险考验,国际与国内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多。习近平审时度势,要求全党同志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敏锐感知,妥善应对前进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努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

## (二)铸魂育人

“铸魂育人”强调历史对人的思想品格、理想信念的培育和引领作用。毛泽东指出,加强党史研究是为了更好地教育人民。邓小平注重历史的教育功能,号召人民从历史学习中获得精神力量。江泽民大力倡导党史学习与研究,主张利用党史教育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习近平认为,“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sup>[30]</sup>,历史对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具有培育作用。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是人民的精神支柱,要“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sup>[154]</sup>。

学习历史可以立德固本,提升历史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修养。学史使人明理,学史使人明智。学习历史,有利于提升历史文化素养。历史是前人实践经验的汇总,记载了前人的生存和发展之道,具有知识支撑和智慧启迪的作用。学习研究历史,不仅有助于丰富历史知识,涵养历史思维,锤炼历史眼光,提升历史智慧,而且有助于明辨是非,通晓人生道理,解决人生难题。学习历史,有利于提升思想道德修养。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和伟大的民族精神。这些文化

和精神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思想品格和道德规范。学习历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培育民族精神,对于提升个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精神品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高度重视历史的育人功能,尤其注重从党史中传承红色基因,涵养精神品格。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奋斗过程中蕴育形成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成为激励我们勇往直前、不断克服人生路上各种困难的精神动力。

学习历史可以提升历史自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历史自觉是历史主体基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而对历史发展动向的知觉和意识。深入学习社会主义五百多年的发展史,有助于自觉认知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自觉认识党和国家的历史使命,自觉把握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历史自觉是历史自信的基础,历史自信源于对历史的认知。学习党史国史,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取得的历史成就,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握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深刻哲理,有助于凝聚民族意志,汇聚民族力量,铸牢民族自信,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与决心。对历史规律的自觉认知,对民族历史的自信认同,有助于增强历史主动。历史主动指历史主体主动顺应历史发展规律,承担历史使命,推动历史前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回望历史,中华民族每一次进步,都凝聚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和付出。一代又一代人的积极承担激励着人民迎难而上、挺身而出,接好时代的接力棒,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 四、历史评价论

历史评价指运用一定的原则、方法或尺度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是非与功过进行评判。对历史的评价不仅是重要的历史问题,更是政治问题,“能否正确认知历史、对待历史和评价历史,关系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生死存亡”<sup>[31]</sup>。习近平基于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历史评价提出“六个不能”,强调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历史、辩证地分析和评价历史。

#### (一)历史、辩证地分析和评价历史

历史、辩证地分析和评价历史,就是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放在历史背景、历史条件下去分析,分清历史主流与支流,对历史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毛泽东认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讲历史辩证法的”<sup>[32]</sup>,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历史辩证地看待历史。

习近平坚持用历史分析法评价历史。习近平强调:“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sup>[20]56-57</sup> 历史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进程,探究历史本质,评判历史功绩的重要方法。在马克思看来,人是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人的历史活动必然要受到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历史分析法要求结合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综合考虑主客观因素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产生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客观公正地分析和评价历史。习近平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出发,正确把握历史的局限性,在历史评价问题上坚持历史性原则。他认为,不能把历史功绩纯粹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过错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现在取得的发展成果否定前人取得的历史成就,更不能以当今的时代眼光和发展水平去过分苛责历史,要求前人干出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历史领袖是人不是神,历史领袖的历史活动也要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不能过分夸大历史领袖的成就,也不能过分夸大历史领袖的错误,不能因为历史领袖伟大就顶礼膜拜,也不能因为历史领袖的失误就全盘否定。考察历史渊源,分析历史条件,把握历史真相,是正确评价历史的前提。任何脱离历史背景、历史条件或历史过程的评价都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

习近平坚持用辩证分析法评价历史。在唯物史观看来,世界是充满矛盾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事物发展的性质和方向,辩证分析法是分析

事物矛盾,把握事物本质的重要思维方法。正确评价历史,必须全面分析事物发展的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分清历史的主流与支流,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本质。“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要实事求是看待党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既不能因为成就而回避失误和曲折,也不能因为探索中的失误和曲折而否定成就。”<sup>[33]</sup>把握历史发展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不是回避或夸大历史问题,而是要分清历史主次。习近平运用辩证分析法把握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评价为开天辟地大事件。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主题主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党在历史上曾走过“教条主义”“文化大革命”等弯路,但这些都属于历史支流,不能用历史支流否定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历史本质。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要坚持运用辩证分析法,把握历史的主题主线,反对忽视历史矛盾,混淆历史主流与支流,掩盖历史本质。

#### (二)以人民立场看待和评价历史

人民指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绝大多数人,以“人民立场”评价历史就是要站在绝大多数人,甚至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角度评价历史是非与功过。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sup>[21]096</sup> 邓小平指出:“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答应不答应”是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习近平强调:“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

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sup>[11]212</sup>人民是评价历史功过的主体,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

从微观层面看,人民群众是评判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标准。对历史的评价涉及价值立场问题,最终要落实到历史客体对主体的价值评价。正确评价历史,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即工人阶级的立场、人民的立场、共产党的立场。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评价历史,就是要拥护党的领导,维护党的形象,肯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党的历史作出正确评价。正确评价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必须坚定党的理想信念,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肯定党的伟大功绩,坚决抵制抹黑党的历史、丑化党的形象、弱化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坚持从人民的立场评价历史,不仅要以人民为中心,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作用,还要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听取人民的意见,接受人民的检验,使历史评价符合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人民的立场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本质上是人民的立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sup>[6]40</sup>。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人民是历史的阅卷人,是“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sup>[11]213</sup>。对历史的评价要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只有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认识和评价历史,才能形成科学的历史观。

从宏观层面看,要站在整个人类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角度评价历史。历史活动是人的活动,人是社会历史活动的承担者,一切社会历史问题最终都要回归到人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sup>[13]4</sup>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为建立没有阶级剥削和压迫、人人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而不懈奋斗。习近平主张站在人类解放的立场上,考虑历史事件本身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意义,反对以输赢作为评判历史的根本标准。2003年3月,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绕开联合国安理会,以反恐为由,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导致伊拉克长期动荡不安,数以万计的人在暴力冲突中失去

生命。不仅伊拉克战争,历史上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等,都是美国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国际霸权地位而作出的战略部署,美国为一己之私不断发动战争,践踏人类生命,破坏人类文明。中国铭记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侵略和霸权,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共同繁荣。习近平破除西方文明冲突、零和博弈思维,站在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寻求人类的共同价值,提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力求构建求同存异、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人类文明新秩序。对历史的评价必须坚持站在和平与发展的立场上、站在人类正义的立场上、站在人类解放的立场上,坚决反对背离人类文明进步的言论和行为。

#### 结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出发,对历史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历史价值论和历史评价论等问题,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的历史思想。习近平历史观强调,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正确认识历史,要全面把握历史的整体性,充分尊重历史的客观性,反对割裂历史、虚无历史;正确评价历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人民立场、人类立场,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放在历史背景、历史条件下辩证分析。梳理习近平历史观的相关论述,把握习近平历史观的哲学意蕴,有利于新时代的人民重视历史学习,端正历史认知,借鉴历史智慧,提升历史文化修养和思想道德修养,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自觉,赢得历史主动。

####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



- 社,1994:217.
-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68.
- [5]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7.
- [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6.
-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3.
- [10]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159.
- [11]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 [12]习近平.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4-30(1).
- [13]毛泽东.毛泽东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06.
- [14]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33.
- [1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6]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59.
- [17]杨共乐.用世界的眼光把握时代发展大势[J].学海,2004(1).
- [1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19]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 激励广大青年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N].人民日报,2019-04-21(1).
- [20]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2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99.
- [22]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23]习近平.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7-08(2).
- [2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N].人民日报,2013-07-22(8).
- [25]习近平.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
- [26]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J].党建研究,2011(10).
- [27]习近平致信祝贺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开幕[N].人民日报,2015-08-24(1).
- [2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4.
- [29]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活动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1.
- [30]习近平在调研指导河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强调 充分调动干部和群众积极性 保证教育实践活动善做善成[N].人民日报,2013-07-13(1).
- [31]王永友,李卓.论习近平历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J].贵州社会科学,2019(7).
- [3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21.
- [33]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1(7).
- [34]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8.

责任编辑:祝远娟

# 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

朱小宝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湖南长沙 410016)

**摘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是相互联系、相互契合、密不可分的富有生命力的有机整体,三者有机结合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进程,有机结合于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生动实践。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是发展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内在要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现实需要,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抉择。深化三者有机结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践行和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解决好人心和力量问题;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人民政协制度。

**关键词:**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价值意蕴;实践进路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2.006

[中图分类号]D627;D613;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2-0042-07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sup>[1]</sup>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探索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持续推动人民民主取得一系列重大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全面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显著成就和宝贵经验,创造性地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理念,推动中国民主发展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中,习近平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高度,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sup>[2]38</sup>(以下简称“坚持三者有机结合”)的重要论断,进一步深化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有利于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行稳致远,有助于巩固和扩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 一、价值意蕴: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三者有机结合”

“坚持三者有机结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这是深刻理解和把握新时代新征程为什么要“坚持三者有机结合”的认识基点。新时代新征程,

收稿日期:2024-01-11

基金项目:2018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YBA286)。

作者简介:朱小宝,男,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学报执行副主编,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党外代表人士统战工作理论湖南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湖南师范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研究员,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制度史。

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必须“坚持三者有机结合”。

(一)“坚持三者有机结合”是发展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指出:“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sup>[9]</sup>“坚持三者有机结合”具有理论、历史、实践的多重意蕴。在理论层面,是对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好经验好做法的深刻总结;在历史层面,是对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的经验提炼。在实践层面,为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巩固和壮大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统一战线“强大法宝”论和“坚持三者有机结合”论,从理论维度对“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和协商民主”的关系进行了提炼升华。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协商民主的领导,加强政协党的建设,巩固和壮大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是上述重要思想的核心内容。“坚持三者有机结合”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和做好统战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提质增效提供了根本遵循。

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风险增多,挑战加大,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sup>[460]</sup>。这要求我们以更加清醒的头脑把握发展统一战线的时代意义,以更加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去做好统战工作,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去团结人引导人影响人。“坚持三者有机结合”正是对这一时代要求的积极回应,有利于整合社会关系,特别是政

党、民族、宗教、阶层和海内外同胞关系,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厚植党的群众基础,激发起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二)“坚持三者有机结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现实需要

民主是保护人类自由的一系列原则和行为方式,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在总结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发展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进行了顶层设计和科学部署。习近平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sup>[237]</sup>2021年发布的《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爱国统一战线和民主协商等作为“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具体现实的民主实践”纳入其中<sup>[113-26]</sup>,彰显了统一战线与协商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属性。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核心要义、根本原则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sup>[237]</sup>。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安排<sup>[9]</sup>。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坚持三者有机结合”置于“全面发展协商民主”中进行论述,是对“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进一步发展。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中,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其中重要的民主形式,二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避免了西方民主无休止掣肘、内耗、攻讦的现象。西式民主以选举政治和多党竞争政治为核心,党派纷争、相互倾轧、攻讦不断,存在“金钱政治”“抹黑政治”“否决政治”等制度缺陷、弊病,在民主运行过程中,往往有意激化矛盾、扩大分歧,使具体问题抽象化、原则化进而立场化。因此,不少西方国家在反思自由民主模式的基础上开始尝试协商民主。但与西方不同的是,我国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形态,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强调在人民投票前需进行广泛的协商,

广纳群言、汇聚民智、倾听民意,协商于民、协商为民,尽可能在形成共识的基础上作决策,具有层级高、参与面广、内容广泛、形式丰富、对国家的政治生活具有重大影响等显著特征。新时代新征程“坚持三者有机结合”,全面发展协商民主,扩大并保障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社会团体组织以及其他社会各界人士的有序政治参与,能够更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三)“坚持三者有机结合”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抉择

党的二十大报告郑重宣示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赶考课题,即“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sup>[221]</sup>,并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安排<sup>[224]</sup>。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根本的要求和保证是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是在统筹兼顾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基础上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是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国各族人民有了发展目标共识,有了共同理想信念。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曾强调推进现代化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认为没有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就会出问题,且一出问题就会是不小的问题。他还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之于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意义,指出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当家作主<sup>[9]</sup>。习近平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sup>[7]</sup>从一定意义上而言,“坚持三者有机结合”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密不可分、息息相关。同时,我们应冷静地看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尽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行进在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上,但“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面临许多新的挑战、新的斗争,前进

道路上必然是风雨兼程、风雨交加,甚至会遭遇惊涛骇浪。如此复杂严峻的形势,迫切要求我们持续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求我们紧紧依靠人民,通过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通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特别是进一步完善协商民主体系,让人民同享改革发展所带来的红利,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而“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sup>[270]</sup>。

“坚持三者有机结合”有利于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家软实力。习近平强调,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sup>[245-46]</sup>。“坚持三者有机结合”作为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实践创新,是对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底蕴的提炼升华,是中国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世界政治文明的重要贡献,有助于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切实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理解、认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

## 二、实践进路:不断夯实“坚持三者有机结合”的思想、价值和制度基础

理论的生命在实践中孕育,理论的价值在实践中彰显。“坚持三者有机结合”,需要在秉持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关联性原则的同时,不断夯实思想、价值、制度基础,切实推动“坚持三者有机结合”深化发展。

(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本在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立足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现实新要求,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了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构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成为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前进的根本指南。

“坚持三者有机结合”，必须加强对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这既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内容，也是巩固党的统一战线、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内在要求。具体言之，要“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实践要求，把握好这一重要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sup>[8]</sup>。要“牢牢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要求，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sup>[9]</sup>。同时，要以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坚持“两个结合”，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动新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

“坚持三者有机结合”，必须深刻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意义、理论内涵、优势特征、价值追求、实践要求，以发展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根本要求，不断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党的二十大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具有全局性与根本性。“坚持三者有机结合”是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拓展。当前，全过程人民民主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目标方向，“坚持三者有机结合”是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可以说，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是“坚持三者有机结合”的逻辑起点，也是“坚持三者有机结合”的理论指导；“坚持三者有机结合”是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的贯彻与落实。同时，党的领导贯穿统一战线和协商民主发展全过程。

##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解决好人心和力量问题

习近平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sup>[4908]</sup>这一重要论断揭示了解决好人心和力量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坚持三者有机结合”的根本指向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民心政治”<sup>[10]</sup>。“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是民主的价值内核，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彰显人心政治价值的民主形态。

“坚持三者有机结合”，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任何一项伟大事业要成功，都必须从人民中

找到根基，从人民中集聚力量，由人民共同来完成。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人民”二字已经深深地融入党的血脉。基于此，落实“坚持三者有机结合”，一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sup>[270]</sup>。在党的领导下，人民内部各方面围绕改革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开展协商，广泛听取民意，做到科学决策、造福人民。二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三者有机结合”是人民主体地位的生动彰显。统一战线成员多、作用重要、涉及面广，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主体。在发展协商民主的实践中，人民群众创造出很多新平台和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协商民主体系，提高了协商民主的效果。三是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sup>[237]</sup>。体现人民意志是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遵循。马克思指出：“国家制度一旦不再是人民意志的现实表现，它就变成了事实上的幻想。”<sup>[11]</sup>“坚持三者有机结合”，必须体现人民意志。通过发挥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政治优势，能够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通过协商民主，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通过沟通协商广泛征求社情民意，能够增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使决策符合人民意愿。要以老百姓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决策施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坚持三者有机结合”，必须保障人民权益。人民关心什么、期盼什么，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相信群众、深入群众，确保决策的制定和执行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前，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参与公共事务的责任感和积极性也不断增强，应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各种途径行使国家权力，切实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人民积极主动参与协商民主，也正是人民权益的客观反映。“坚持三者有机结合”，要充分尊重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切实保障人民依法开展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并通过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协商渠道同人民进行沟通、商量。“坚持三者有

机结合”,必须激发人民创造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发展的任务越是繁重,斗争形势越是错综复杂,越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及时发现、总结、概括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新鲜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和政策,指导新的实践。“坚持三者有机结合”既是全新总结,也是全新实践,需要不断激发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助推全过程人民民主行稳致远。

“坚持三者有机结合”,必须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从人心向背、力量对比进行考量,是中国共产党重视统一战线的逻辑起点。统一战线的法宝地位作用,就体现在“四个凝聚”(即凝聚人心、凝聚力量、凝聚智慧、凝聚共识),体现于“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sup>[46]</sup>。习近平指出:“说到底,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搞统一战线是为了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民主党派、无党派、民族、宗教、新的社会阶层、港澳台海外等各方面统一战线成员达数亿之多。可以肯定地说,只要把这么多人团结起来,我们就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添强大力量。”<sup>[47]</sup>统一战线作为“坚持三者有机结合”的重要要素,在“有机结合”中起着桥梁枢纽作用,联结着党的领导与协商民主。在一定意义上说,统一战线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持三者有机结合”目标也在于此。因此,如何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如何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坚持三者有机结合”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解决该课题的钥匙就在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必须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就要在思想上改变“不重视统一战线”的错误观念,从战略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必须解决好人心和力量问题,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凝聚统一战线最广泛政治联盟的人心、力量。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既要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又要尊重包容差异。一致性是同,多样性是异,统一战线、协商民主的重要契合点就在于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必须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就是要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并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重要制度保障。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党的民族工作主线,就是引导全国各族人民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坚定“五个认同”,增强国家层面的社会归属感,面向世界的文化归属感。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引导我国宗教在新的时代方位和本国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本土化,实现政治认同、社会适应、文化融合。必须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就是要加强思想政治引导,凝聚其思想共识,促使其爱国奋斗,特别是要鼓励支持他们立足本职建功立业,积极投身改革创新一线,施展才华和抱负。必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就是要打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引导民营企业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弘扬企业家精神,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努力将民营经济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必须发挥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争取人心的作用,就是要培育和增强港澳同胞的国家情怀、民族情怀、爱国精神,争取人心回归;要增进两岸的心灵契合,增强台湾同胞支持统一的力量;就是要涵养壮大知华友华力量,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凝聚海外侨胞致力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人心力量,同圆共享中国梦。必须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就是要为统一战线蓬勃发展涵养水源、积蓄力量,提供组织保障,确保薪火相传。必须把握做好统战工作的规律,就要在固守圆心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共识,要科学认知潜绩与显绩关系,既要坚持原则性,又要根据实际情况保持灵活性;既要有团结,也要有斗争,以求得真团结,扭转部分干部不会做统战工作的情况。必须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就是要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彻底解决“统一战线不统一”的问题。要因应时代发展,特别是面对互联网这一“最大变量”和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必须认真做好网络统战工作<sup>[48]</sup>。大力加强数字化建设,打造网络统战平台、网络宣传矩阵。走好网络群众路线,实现“键对键”“面对面”“心连心”的统一。

### (三) 夯实“三者有机结合”的制度基础

制度是管根本、管全局、管长远的。“坚持三者有机结合”需要制度体系的支撑。“坚持三者有机结合”关联特别紧密的制度主要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人民政协制度等四项制度。坚持和完善上述制度,是“坚持三者有机结合”的关键所在。

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是一系列国家根本制度、基本制度等组成的制度方阵,其中“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这是一项关乎长远、关乎全局的重要制度,是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关键和根本。党的领导制度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探索形成的根本制度成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探索建立了党的领导制度。在对党、政、军实现领导的过程中,确保了党中央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从而赢得了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宪法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形成了许多制度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领导制度被确立为根本领导制度,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发挥引领作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论述,切实提升坚持党的领导的使命责任意识。要建立健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夯实思想基础。要完善“两个维护”的各项制度,确保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自觉向党中央看齐,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要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完善党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人民政协的有关制度。要健全为民执政的各项制度,通过统一战线、协商民主尊重民意、汇集民智、凝聚民力。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通过“坚持三者有机结合”健全决策机制,改进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注重领导艺术,提高领导本领。要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特别是要坚持自我革命,以良好形象赢得人民支持和拥护。

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sup>[14]10-11</sup> 这项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重要制度,是“坚持三者有机结合”的集中体现。我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sup>[1]13</sup> 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要“坚持党的领导,强化政治引领,完善制度机制,推动新时代多党合作更加规范有序、生动活泼”<sup>[14]610</sup>。根据时势变化和时代要求完善相关规章制度,不断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科学性和规范性。要强化政治引领,做好政治交接,弘扬多党合作优良传统。要“加强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sup>[2]39</sup>,通过民主协商、民主监督、联谊交友等方式,增进团结的广度、深度,提升多党合作质效。要“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履行职能”<sup>[2]39</sup>,支持民主党派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履职能力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sup>[14]12</sup>,不断提升民主党派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决自身问题能力<sup>[5]</sup>,建设高素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要加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和叙事体系研究,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讲好多党合作的故事,讲好民主党派自身的故事,实现最广泛的国内认同与最普遍的国际理解<sup>[6]</sup>,增进人们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认识和理解。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和人民政协制度。“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sup>[2]38</sup> 要继续完善协商民主体系,统筹推进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加强各协商渠道之间的衔接、同向发力,确保协商领域、议题、主体、程序全覆盖,提升协商实效。要进一步健全制度化协商平台,开展协商试点,推广典型经验,注重在实践中培育和发现新的协商形式。要切实通过学习培训、调查研究等多种方式提升协商主体的协商能力,确保协商不走过场、不走形式,提出真知灼见,做到“参政参到点子上、议政议到关键处”。要加强监督督促,及时跟进

协商成果的转化,确保协商成果落地见效。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sup>[17]</sup>,是实现“三者有机结合”的制度设计和有效载体。坚持和完善人民政协制度,要切实加强党对人民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统战功能。要“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sup>[238]</sup>,广泛凝聚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要抓住中心环节增强政协委员向心力,将凝聚共识融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等履职过程。要创新平台载体,加强传播能力建设,做到“线上与线下”相融合,既面对面,也键对键,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传递党的声音,听取民众诉求,帮助解决问题,增进团结效果。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强化协商形式与协商内容的匹配、协商程序与协商效率的统一,探索新的协商方式和实践载体,使协商民主既广泛多层,又兼具制度化与灵活性,突破时间、地域的限制。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转变委员的思想观念、意识觉悟,以高度的责任心使命感履职尽责。要切实提高委员的履职能力,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努力推动建言资政更有用、凝聚共识更有效、增进团结更有力、服务中心更有力。

#### [参考文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3]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93.
- [4]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

版社,2023.

-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54.
-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1975—198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82.
- [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259.
- [8]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意见[J].党建研究,2023(5).
- [9]习近平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强调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N].人民日报,2022-10-18(1).
- [10]张爱军.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民心政治[J].党政研究,2022(1).
-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73.
- [12]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358.
- [13]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N].人民日报,2022-07-31(1).
- [14]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15]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座谈并共迎新春时强调 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履职尽责 在凝心聚力服务大局上发挥更大作用[N].人民日报,2023-01-17(1).
- [16]朱小宝.新媒体语境下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建构探析[J].攀登,2021(1).
- [1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N].人民日报,2023-03-19(3).

责任编辑:祝远娟



# 我国党外人才培养:特点、机理和规律(上)

——中国共产党党外人才工作研究系列之二

祝远娟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广西南宁 530007)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显著的党外人才培养优势。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注重从认识理念、制度设计、政策安排以及工作实践等维度对党外人才进行系统培养,成功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素质优良、作用突出的党外人才队伍。新时代加强党外人才的培养具有深刻的内涵机理、现实机理和运行机理,需要进一步加以全面认识和把握。

**关键词:**党外人才培养;特点;机理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2.007

[中图分类号]D613;C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2-0049-09

人才一般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而党外人才则指其中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才。人才按照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类。习近平在各个重要场合中用得较多的是“党内党外人才”“国内国外人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显著优势,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培养造就更多优秀党外人才是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具有鲜明的特点和深刻的逻辑机理。

## 一、我国党外人才培养工作的特点

人才培养是关系国家发展的大事。中国共产党没有把人才培养作为政党的私事,而是立足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推崇广纳贤才、人尽其才、知人善任的大人才观。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

国家注重从多维度对党外人才进行系统培养,取得了显著成就。

### (一)认识理念上重视培养选拔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政权中干部人事安排搞“五湖四海”以及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所占比例的精神要求,中央统战部提出:“目前迫切需要有计划地培养更多数量的、政治上比较成熟的、社会上有相当地位,在言论行动上都坚决拥护共同纲领的非党革命知识分子。”<sup>[1]</sup>1955年党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也明确指出:“我们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机关,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清一色党员,都应当按组织和工作性质,配备适当数量的民主人士或劳动人民中的非党分子。”<sup>[2]</sup>党和

收稿日期:2024-01-15

基金项目: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课题(20XZZ010)。

作者简介:祝远娟,女,广西社会主义学院非公有制经济教研部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非公有制经济。

国家明确了党外人才在国家政权中的重要性,并重申“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培养了超过400万的党内党外人才。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推进党和国家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高度,提出“人才不断涌出,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明确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为了造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批专门人才,必须加强干部的教育和训练工作”,“必须特别重视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并针对他们的特点改善对他们的思想教育”<sup>[3]</sup>。邓小平还明确提出知识分子的教育培养问题,并要求不限于从党的系统而是放宽视野选人和培养人才,“要帮助各方面的人士和群众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共同基础上不断增强团结,取得新的进步”<sup>[4]</sup>。为了更有针对性地做好党外人才的工作,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党外知识分子的概念,明确各级党委统战部是开展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主要职能部门。

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能不能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民族的盛衰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sup>[5]</sup>江泽民强调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并明确指出:“对于党外干部的考察、培养和推荐工作,要认真抓紧,制定规划。”<sup>[6]</sup>进入21世纪,江泽民进一步指出,要确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1999年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发展的关键是人才问题,知识分子工作的核心也是人才问题。”<sup>[7]</sup>党的知识分子工作的重点是建设适应党和人民事业发展需要、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江泽民认为,必须重视和开展发现、考察培养各方面的党外代表人物,这些是大事,这些大事抓好了,就掌握了统战工作的全局<sup>[8]</sup>。

党的十六大以来,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中共中央从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高度,明确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能力的战略任务,并强调要平等对待党内党外的干部、各类的人才。200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明确要求重视培养选拔非中共党员干部,吸引和聘用海外高级人才。2006年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明确党外知识分子是

我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sup>[9]</sup>。201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2010—2020年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改革和发展纲要》把党外代表人士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指出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是统一战线的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对党外人才的教育培训工作作出了明确的定位。2012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对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培养作出了明确的部署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才成为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习近平指出:“要更大规模、更有成效地培养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急需的各级各类人才。”<sup>[10]</sup>中共中央作出全方位培养、引进、使用人才的重大部署,推动新时代人才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从党的十八大提出“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到党的十九大提出坚定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再到党的二十大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要把党内外和国内外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起来,参加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作为人才工作的目标和要求,明确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强调加强培养、提高素质是党外代表人士工作的关键,并通过召开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出台系统重要文件等措施,推动了党外人才工作的高质量发展。

## (二)制度设计上彰显中国特色优势

邓小平曾说过:“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sup>[11]</sup>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也是发现、培养、使用人才的主要制度设计和安排<sup>[12]</sup>,彰显了中国特色和优势。

1.充分体现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1953年,为了在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后继续发挥民主人士的

作用,第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明确了要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落实对党外民主人士的安排,中共中央批准了会议制定的《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后统一战线组织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时安排民主人士的意见》并要求全国执行。文件明确指出,争取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以及与他们有关系的党外人士,引导他们接受思想改造,“这是使我们国家稳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条件之一”<sup>[13]376</sup>。因此,中共中央明确要求县市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政府部门、统战组织、人民团体以及其他组织,凡有民主人士的地方,都需要注意民主人士的安排,并明确了党外人士在其中所占的比例,省一级要在15%至25%,市一级可以在15%至30%<sup>[13]382-384</sup>。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在1226名全国人大代表中,党外人士558人,占45.52%;在79位常务委员中,党外人士39人<sup>①</sup>。此后,党外代表人士在各级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人大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以及委员中都保持和适当的比例,这有利于党外人才的培养和成长。

2.充分体现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对人类政治的重要贡献。“只有在这一中国特有的政党制度框架中,才会提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重要话题”,“只有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框架中,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才是必须的和必然的”<sup>[14]</sup>。中国共产党把党外人才的培养作为我国政党制度的重要基础工程,在确立这一制度之时就把党外人才的培养工作考虑在内,并在坚持和完善的过程中不断强化对党外人才培养的设计安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后,中共中央明确人民政协的主要任务包括组织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和民主党派“进行政治学习”<sup>[13]376</sup>。政协系统成为教育培训党外人才的重要场所。改革开放初期,中共中央明确“要把帮助民主党派培养、选拔新的代表人物逐步进入领导班子,作为坚持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一项战略措施”<sup>[15]</sup>。

《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1989)明确选配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国家和政府的领导职务,要求各相关部门做好考察和培养工作。此后,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2005)等多个文件均对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以及政协委员能力素养的培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3.充分体现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对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sup>[16]</sup>。李维汉多次指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问题是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关键,是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sup>[17]</sup>。1952年《中共中央关于制订少数民族地区五年建设计划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加强少数民族干部中的政治干部、知识分子、专业和技术干部的培养<sup>[18]</sup>。全国各地相继成立民族学院,设立各级民族学校,开设民族干部训练班,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人才。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把必须大量培养少数民族的各级干部、各种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上升为国家法律要求。1992年,江泽民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造就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是做好民族工作,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各级党委要以更大的力量,进一步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和各种科技、管理人才的培养。”<sup>[19]</sup>1993年,胡锦涛在《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要解决好的几个问题》中指出,培养选拔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内容,特别要求“加强对少数民族中党外代表人物的物色和培养”<sup>[20]</sup>。2002年中共中央印发《西部地区人才开发十年规划》,要求建立起适应西部开发需要的、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2005年,胡锦涛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人才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要求加强民族地区人才资源开发和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和

<sup>①</sup>数据来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4403168](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4403168)。

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明确了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的具体要求,强调要重视并大力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对政治过硬、敢于担当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要充分信任、委以重任。

### (三)政策安排上注重统筹合理协调

1.政策一以贯之,体系各有侧重、相互衔接。培养使用党外代表人士,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对党外人士的培养和使用。毛泽东曾说过,“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sup>[21][25]</sup>,由于“现在我们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sup>[21][01]</sup>;不但要培养造就党内知识分子,“每一个大城市和每一个中等城市,每一个战略性区域和每一个省,都应当培养一批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有威信的党外民主人士”<sup>[22]</sup>。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外人才培养工作就已经启动;改革开放以后,党外人才培养工作进入全面发展阶段。一方面,出台管总的法规文件。1990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初步建立了我国的知识分子人才政策体系。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把党外各类知识分子的培养使用纳入其中。《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是第一个关于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专门文件。新时代以来相继颁布的《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23—2027)》等文件,均对党外人才的培养作出明确要求和部署。另一方面,中共中央结合统一战线人才点多面广线长的特点,针对各领域的党外人才的培养出台专门的政策要求,形成了各有侧重、相互衔接的政策体系。

2.注重突出重点,分级分类相结合。党外人才群体数量庞大、分布范围广、差异性大,党对党外人才培养工作的特点是突出重点,分级分类。一方面,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中共中央确定培养工作对象的重点和不同对象的培养重点。如2006年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明确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统战工作的新的着力点,随后中共中央印发的文件明确党外代表

人士队伍建设的重点是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各级组织负责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有关社会团体领导班子中的党外人士,无党派和宗教界代表人士。《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党外代表人士的六类群体,并明确工作重点是党外的各级人大代表和各级政协委员,以及体制内任职的县处级及以上党外干部,各民主党派中央及地方组织的领导班子成员,工商联各级组织领导班子成员中的党外人士以及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中担任一定职务并能够发挥较大作用的党外人士。2013年,习近平在纪念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要把留学人员工作为统战工作的着力点。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明确要做好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留学人员的工作等。同时,对于不同培养对象,培养的重点也各有侧重。另一方面,对于各领域各行业各层级的党外人才采取分级分类培养的方式。除利用国民教育体系和各行各业的业务培训体系外,针对统一战线成员点多面广线长的特点,从中央到地方采用分级分类的方式进行培养。以党外干部的培养为例,根据党和国家的需要,从统一战线事业发展需要出发,强调把党外代表人士培养成学者议政型、行政参政型和机关干部型干部。这三类干部的素质、能力、经历要求不同,培养和选拔的标准也有差异<sup>[23]</sup>。

### (四)工作实践上日趋科学规范全面

从培养的组织体系来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工作在党内由中央宣传部主管,同时统战部作为开展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部门,侧重于做好教育科学、医药卫生、文化艺术、工程技术、新闻出版等方面的知识分子中有代表性人物的工作。改革开放以来,逐步确定由各级组织部门、人事部门和统战部门分别根据工作中掌握的资源,合理配置、分层次、分类别、分重点科学管理党外干部培养选拔工作。针对党外人才的教育培训,成立各级社会主义学院作为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训的主阵地。1956年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成立至今,全国社会主义学院已发展到700余所,形成了从中央到省、市、县的党外代表人士政治培训院校体系<sup>[24]</sup>。当前全国已逐步形成以各级社

会主义学院为主,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高校为辅,线下与线上教育培养相结合,理论培训与实践锻炼相互配合的党外人才教育培养体系。

从培养的导向和理念看,人才教育培养的导向和理念逐步明晰。20世纪五十年代社会主义学院教学培训的目标是对学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在教育培养党外人才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学院确立了以政治共识教育为核心和目标的办学理念,明确对党外人才的教育培养要以增进他们坚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核心目标,在教育培养中注重以文化认同增进政治认同,加强对党外人才的履职能力培养。

从培养的内容体系看,教育培养的内容不断丰富和有针对性,初步形成科学的内容体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成立时,开设的课程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史,以及学习一些重要时事政策、参观等<sup>[25]</sup>。经过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和地方社会主义学院的多年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社会主义学院系统逐步形成确立了“一个主题五个方面”的教学布局和教学培训内容。2018年颁布的《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明确社会主义学院教学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等,对党外人才教育培养的教学内容体系作了进一步的规范。

从培养覆盖面看,党外人才教育培养覆盖面不断拓展。各级社会主义学院成立初期学员的范围主要是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改革开放以来,各级社会主义学院培训的对象从主要面向各级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成员、工商联副主席(副会长)和工商联执常委、无党派人士,逐步拓展到统一战线其他方面的代表人士。1997年以来,各级社会主义学院相继加挂“中华文化学院”牌子,积极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传播中华文化。从调查结果看,当前全国社会主义学院系统人才教育培训范围趋向党外人士领域全覆盖<sup>[26]</sup>。

## 二、党外人才培养的逻辑机理分析

党外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项工作、制度机制等相互衔接、相互配合、相互作用。党外人才工作蕴涵深刻的内涵机理、现实机理和运行机理,需要加以全面认识和把握,不断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做好党外人才工作,凝聚更广泛的人心和力量提供经验支持。

(一)内涵机理:契合新时代对党外人才的培养需求

1.契合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对人才的迫切需求。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我们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sup>[27]</sup>这决定了新时代党外人才培养具有紧迫性,即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通过全方位培养、引进和使用人才,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目前,我国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口超2.2亿,其中党外人士占比超过75%<sup>[28]</sup>。这样一个数量庞大、影响广泛、作用突出的群体,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让更多的党外人才自觉团结在党的周围,与党一起团结奋斗,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加强培养,凝聚人心、共识、智慧和力量。

2.契合发挥政党制度效能对主体的需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其中之一就是“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造就更多更优秀人才的显著优势”<sup>[29]</sup>。改革开放以来,党坚持发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党内党外人才。改革开放之初,党中央就指出,帮助民主党派培养、选拔新的代表人物是多党合作的一项战略举措。2004年胡锦涛在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指出,大力加强党外人才队伍建设是多党合作事业的有力组织保证<sup>[30]</sup>。新时代以来,中共中央提出了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要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对多党合作事业中的党外人士能力水平提出新的要求。2023年底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新时代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件也明确要求加强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的培养锻炼。通过人才培养工作,提高党外人才特别是党外代表人士的政治能力和履职能力,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我国政治制度的效能作用。

3.契合发挥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的需求。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党外人才是统一战线各领域成员的源头。“我们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发展历史,就是一部吸引、培养、发挥党外人才作用的历史。”<sup>[13]</sup>新时代中共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提升对统一战线地位作用的认识,统一战线从“重要法宝”上升为“强大法宝”。新时代统一战线要发挥强大法宝作用,必须落实到广大的统一战线成员的能力水平上面,必须以培养造就更多与党同心同德、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为重点任务,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广泛地凝聚人心和力量。

(二)现实机理:破解新时代党外人才培养工作的困境

1.提升对党外人才培养工作重视程度的需要。长期以来,在党内和社会中对党外人才及其培养工作存在一些模糊和错误的认识。如认为党内人才很多,党外人才可有可无;认为党外人士是“消极分子”“异己力量”;认为党组织培养的是党内人才,党外人才应该自然成长;认为党外人才培养工作是各级组织部门和统战部门的事情,与自己单位、自己工作无关等。我们要认识到,党内汇聚的各方面人才很集中、很庞大,但依然有大量的人才在党外,要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人才。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必须全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各级党委(党组)承担着发现培养使用管理党外代表人士的重要职责。《中共中央关于印发〈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的通知》也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充分认识到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履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主体责任。“育

人是人才资源开发的基础工作,是造就和选用高素质人才的前提。”<sup>[12]672-673</sup>邓小平强调:“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sup>[13]</sup>因此,要提升对党外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视程度,齐心协力,相互配合,形成党外人才培养工作的合力。

2.突出政治培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党和国家对党外人才的教育培养除业务知识能力的培养外,要突出政治培训,以巩固党内党外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统一战线人才的培训实质是政治培训,是政治思想和政治素质的培训。”<sup>[14]</sup>党外人才大多是各行各业的专业性人才,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专业造诣高,但政治能力总体不足。2021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指出,要不断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培养人才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使命担当,强调人才培养的政治性。新时代以来,党外人才的政治诉求、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更加多元化、差异化,需要突出政治培训。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引导党外人才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把党外人才的人心和力量凝聚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中来。

3.加大党外人才培养力度,更好发挥党外人才作用的需要。胡锦涛曾指出,培养和选拔党外干部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如不抓紧,后继乏人的问题将会日益突出<sup>[14]</sup>。新时代以来,党外人才培养的范围和力度不断加大,但在契合组织需求、岗位需求和个人需求等方面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一方面,党外人才特别是优秀后备人才集中学习提升的机会不够多,如2023年全国4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副省级城市社会主义学院共培训党外人才约25万人次,仅占全国党外人才总量的千分之一<sup>①</sup>。另据福建省一项统计,2015—2019年参加省级以上社会主义学院培训的福建省高校党外代表人士仅214人,平均每所高校每年不足3人,大量的党外人才未能纳入组织

<sup>①</sup>数据来源:根据2023年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副省级城市社会主义学院培训情况统计。

教育培训范围<sup>[35]</sup>。此外,一些地方党外干部选拔任用存在“拿着帽子找人”“从副到副”等现象。另一方面,在部分地区仍存在“储而不用,备而不问”的问题。培养是使用的前提,同时“使用也是培养,而且是更重要的培养”<sup>[36]</sup>。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强调,党外代表人士工作的重点是科学使用,发挥作用,关键是加强培养,提升素质。因此,必须加大党外人才培养力度,不断提升党外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

### (三)运行机理:培养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高质量党外人才

1.以“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为党外人才的培养理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对党和国家的人才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和要求。党中央指出,要打破体制壁垒,扫除身份障碍,开辟人人成长成才、施展才华的通道和天地<sup>[37]</sup>。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努力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sup>[38]</sup>。中共中央要求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不唯地域引进人才,不求所有开发人才,不拘一格用好人才,在大力培养国内创新人才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引进国外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热忱欢迎外国专家和优秀人才以各种方式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大公无私、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大人才观和人才培养理念。

2.以“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作用突出”为党外人才的培养目标。2006年,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目标是建设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数量充足的党外代表人士及其后备队伍。在此基础上,2012年《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了“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作用突出”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目标。数量充足指各行业各领域各层级各梯队都要有相当数量的党外人才队伍;结构合理指各领域有影响的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比例稳步提高,数量适当,后备人才队伍年龄结构、界别结构和专业结构更加优化,形成党外代表

人士层次合理、分布均衡、衔接有序的人才梯队;素质优良指党外代表人士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决自身问题能力进一步提高,更加适应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作用突出指充分发挥党外代表人士所在行业领域的专业优势,积极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积极建言献策,推动党和国家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在所联系成员中充分发挥示范引领带动作用,团结带领所联系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3.以“增进共识和提升能力”为党外人才培养的核心内容。如前所述,党外人才教育培训的内容涵盖非常广泛,而其中政治共识教育和能力培养是党外人士教育培训的核心内容。习近平在给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成立60周年的贺信中明确要求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要以政治共识教育为核心。政治共识教育是以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鲜明主题,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为首要内容,最大限度地增进政治认同、凝聚广泛共识<sup>[39]</sup>。党外人才教育培训的过程,就是增进共识的过程,这是其鲜明的特点。较高的能力水平是发挥积极作用的基础。胡锦涛在2004年和2005年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明确了党外人士要提升“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中共中央随后对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了能力建设的总体要求。2006年中央统战部指出:“能力培养是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教育培训工作的迫切要求,贯穿于培训的全过程。”<sup>[40]</sup>新时代以来,习近平立足多党合作事业的健康发展,提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要提升“五种能力”的要求。《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着眼新时代党外人才教育培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把学员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增进政治共识,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增强爱国主义精神,自觉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了解和熟悉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增强五种能力为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训的目标。概而言之,增进共识,提升能力,

是党外人才培养的核心内容。

4.坚持物色发现、教育培养、选拔使用、管理监督全过程、全链条、全覆盖的党外人才培养体系和模式。一是抓好物色发现这个党外人才培养的源头,拓宽物色发现的视野,不拘一格发现党外代表人士,为培养工作涵养充足的水源。改革开放后,中共中央不断调整统一战线工作的范围和对象。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明确了“十二个方面”的工作范围,纳入统战工作的党外人才范围极大拓展。二是抓住教育培养这个关键和使用这个重点,坚持用养并举。针对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方存在的“重使用轻培养”问题,江泽民提出要坚持用养并举<sup>[32][678]</sup>,要求坚持在培养中选拔使用,坚持在选拔使用中加强培养。1995年,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统战部联合下文,明确指出要重培养、打基础、促选拔,积极培养选拔能够担当跨世纪重任的各级党外领导人才;对于已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外干部和党外后备干部,要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有针对性地进行培养,进一步提升他们的政治、业务素质和组织领导能力<sup>[41]</sup>。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中央到各地的社会主义学院相继复办,不断扩大培训规模。另一方面,不断完善选拔使用的程序和方式,扩大党外人才使用的范围。1979年中共中央在批转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文件时重申,对党外人士一定要量才使用,合理安排,克服“清一色”的思想。之后,除在人大和政协系统外,中共中央批准同意在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中安排党外人士担任领导职务。1991年,党外干部的任职范围又扩大到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审计机关,党外人才成长的平台不断丰富拓展。新时代以来,通过政治安排、实职安排、社会安排、荣誉安排等方式,促进了更多的党外人才茁壮成长。三是把强化管理监督作为培养党外人才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些党外人大代表、党外政协委员、党外干部涉嫌违纪违法行为。加强对党外人才的管理监督是保障党外人才健康成长的重要举措。《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要强化对党外代表人士的管理,统战部门和党委有关部门、党外代表人士所在单位党组各负其责,做好日常管理和考核。

5.以“政治坚定、业绩突出、群众认同”为党外人才的培养质量效果衡量标准。习近平强调人才培养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立德树人。党外人才的培养,既要遵循党对人才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总要求,也要遵循党对党外人士的具体要求,即“政治坚定、业绩突出、群众认同”。政治坚定,要求党外人才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做到“两个维护”,积极投身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业绩突出,要求党外人才立足本职岗位,认真工作,不断提升专业能力水平,在本行业领域作出突出的成绩和贡献;群众认同,就是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在所在党派、界别、行业领域以及所在区域的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力和认同度。政治坚定、业绩突出、群众认同,从政治性、专业性和社会性三个方面明确党外人才的培养质量标准,体现了党外人才培养工作的特点。

#### [参考文献]

- [1]《李维汉选集》编写组.李维汉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15.
- [2]龙威.我国党外干部培养和选拔的现状分析[J].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3).
-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5.
- [4]刘延东.在全国社会主义学院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2).
-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3.
- [6]中共中央统战部,等.基层统战工作概论[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3:188.
- [7]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学习问答[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68.
-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36.
- [9]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议精神解答[M].北京:华文



- 出版社,2006:134.
- [10]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10-22(2).
- [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1975—198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82.
- [12]祝远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重要论述的逻辑探析——以统一战线为视角[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2).
-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4]从中国文化精神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EB/OL].(2011-07-18)[2023-12-21].<http://www.mmzy.org.cn/llxc/1172/32490.aspx>.
-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9.
- [16]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0.
- [17]中央统战部《李维汉纪念集》编写组.李维汉纪念集[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8:28-29.
- [18]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8—1949):第10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358.
- [19]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88.
- [20]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9.
- [2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7.
- [23]王克群.加大党外代表人士的选拔任用力度——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J].吉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1).
- [24]新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是怎样产生的?[EB/OL].(2019-09-13)[2023-12-21].<http://tyzx.people.cn/n1/2019/0903/c396781-31334009.html>.
- [25]铸就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主阵地——写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建院60周年之际[EB/OL].(2016-10-14)[2023-12-21].[http://bgimg.ce.cn/xwzx/gnsz/gdxw/201610/14/t20161014\\_16788655.shtml](http://bgimg.ce.cn/xwzx/gnsz/gdxw/201610/14/t20161014_16788655.shtml).
- [26]王焕平.新时代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现状及路径研究[J].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3).
- [27]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3:131.
- [28]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422.
- [29]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9:3.
- [30]李仁质.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思想[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6).
- [31]朱晓明.在全国社会主义学院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2).
- [32]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 [3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1.
- [34]梁志忠,郭玉明.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下[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488.
- [35]刘杰.高校党外代表人士成长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2).
- [36]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2.
- [37]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J].前线,2013(12).
- [38]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53.
- [39]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一战线理论研究成果蓝皮书(2009—2010)[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1:69.
- [40]蒲跃.新世纪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探索[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72.
- [41]张全景同志在全国培养选拔党外干部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J].中国统一战线,1995(8).

责任编辑:张淑瑛

#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论略

李俊斌,傅 琪

(重庆邮电大学,重庆 400065)

**摘 要:**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当代政治文明的伟大创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生成于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植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生动实践,实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超越。全过程人民民主包含的人民当家作主、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有序政治参与等重要政治理念,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发展理念和实践要求,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着手,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政治保证、物质基础、制度母体、精神支撑和自然条件,推动形成良善、协调、高效的公共秩序和公共生活。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政治文明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2.008

[中图分类号]D61;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2-0058-08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当代中国谋发展、求进步的必由之路,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sup>[1][2]</sup>。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深入探究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丰富理论内涵、重要价值意蕴和有效实践途径,有助于新时代新征程更好地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序发展,有助于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优势,凝

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 一、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伟大创造

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生活展现出的进步状态及其良善政治取得的实践成果。反映“人本”或“民本”的政治价值取向、政治制度模式的民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主要标志。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探索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新型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汲取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精髓,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经验,彰显了中国式民主政治的特

收稿日期:2023-10-2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项目(21VSZ015)。

作者简介:李俊斌,男,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傅琪,女,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

色优势,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的重要成果。

(一)全过程人民民主生成于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从历史逻辑来看,“民主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和标志”<sup>[2]</sup>。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基础上,对民主尤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行了深入论述。对于“民主是什么”,马克思指出,民主之所以能够存在,必要的首要条件是它蕴含着一定的意义,故而全部的问题指向“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sup>[3]</sup>。在马克思看来,民主是“概念的制度”<sup>[4]</sup>,民主制作为“国家制度的本质”<sup>[4]</sup>,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不具有相异于本身意义的意义,在实质上都只不过是“整体人民的环节”而已<sup>[4]</sup>。由此可见,马克思认为真正的民主具有两个核心要素,即“人民性”与“过程性”。对于“无产阶级如何实现民主”,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这样的论断,即工人革命首先重要的是要实现从无产阶级到统治阶级的转变,从而“争得民主”<sup>[5]</sup>。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要实现民主,首先要获取政权,致力于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再由人民赋予国家权力。在这里,虽然没有直接采用“人民民主”的说法,但马克思基于“国家即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判断对民主制进行了详细阐释,强调制度、法律及国家本身在民主制当中皆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和特定内容”<sup>[6]</sup>。全过程人民民主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为重要理论基础,以中国现阶段国情及社会发展需要为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有效结合的、独具新时代特征的民主理论和民主模式,它延续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深厚的人民性与过程性。在民主认识论上,全过程人民民主主张民主是扎根中国土壤发展的产物,强调民主的内容、形式及其制度的完善是依托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相应调适的长期过程。在民主方法论上,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将尊重民主发展的客观规律与发挥人民的主观能动性相结合,充分激发人民群众共同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内生动力和创造活力,不断拓宽和完善民主的内

容和形式。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植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治建设的生动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理论和实践上的所有进步归根到底得益于“走自己的路”<sup>[7]</sup>,即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中国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追求并推进更广泛、更充分、更健全的人民民主,创造性地探索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形式。就此意义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史也是探索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为指导,凭借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强大的政治能力挣脱西方民主模式的桎梏,经过各个历史阶段的探索发展,开拓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在创立初期提出了动员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的政治主张,并通过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确立苏维埃民主制度,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在解放战争时期建立基层人民民主政权等进行广泛的民主政治实践,随后在领导成立新中国过程中旗帜鲜明地坚持中国人民是“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的政治理念<sup>[8]</sup>,通过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完成了从传统政治制度向人民民主的历史性、突破性跨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发展民主政治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积极探索人民民主实践,通过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等一系列举措,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迈向了新的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持续健全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稳步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擘画了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发展蓝图。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实践可知,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政治文明的进程中形成的,致力实现人民当家

作主目标、深度契合国家善治要求的民主新形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三)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超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个新事物,也是个好事物。”<sup>[9]289</sup> 全过程人民民主滋养于中国社会土壤,是具有广泛性、真实性、有效性的高质量民主,在价值观念和实践效能上实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整体性超越,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鲜明特征和显著优势。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价值导向上真正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对利益化、集团化、娱乐化的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摒弃。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受“金钱至上”等价值观念影响,资本可以通过不同层次的选举合法进入政治领域以寻求权力保护及利益回报,致使民主被绑架并服务于资本,在资本的操控之下逐渐演变为有钱人、有权人的政治游戏,从而使得民主流于形式和遭遇合法性危机。相较于深陷“形式民主与民主治理”悖论内在痼疾的西方代议制民主<sup>[10]</sup>,全过程人民民主坚守“人民至上”价值观,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基础上规避了民主和资本“联姻”的种种弊端,充分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另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实际运行中切实维护 and 保障了人民的主体地位,是有史以来“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sup>[11]87</sup>。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代替人民占据主导地位,人民在资本逻辑下产生异化在所难免。尤其是在大数据时代,资本容易通过信息技术对人民进行监视、控制甚至剥削,人民沦为资本增殖的手段和资本运转的附庸愈加明显。与之相对,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目标导向,通过强调主人翁精神、主体意识的程序安排和政治践行,人民得以在政治生活中享有更广泛的权利,拥有参与公共生活、表达利益诉求的多元渠道。人民能够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充分发挥主体作用,依法参与各层级、各领域的国家政治生

活和社会生活,展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巨大优势。

##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人民民主在新时代呈现出的具体民主政治形态,包涵了人民当家作主、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有序政治参与等重要政治理念,不仅开辟了中国政治文明发展新理路、新格局,更确立了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主题和政治范式。

(一)“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

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内在要求。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过程中,通过加强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构筑双向互动的“回应型”治理模式等途径<sup>[11]</sup>,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及其运行体系得到不断完善,切实满足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等方面民主需求<sup>[12]259</sup>,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一环。第一,人民当家作主是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原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方向和前途,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使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体现在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通过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党性与人民性统一于现代化事业的各项路线、方针、制度、政策中,从而展现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推进的政治优势。第二,人民当家作主是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旨归。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所有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本质目标上将其界定为“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sup>[15]411</sup>。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是以广大群众基础作为力量来源、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谋求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运动,而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体现,凸显并确保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民性,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价值所在。

第三,人民当家作主是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设计。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确保人民获得自身解放、成为国家主人而建构起的新民主政治方案,有利于将“民主”因素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各方面、各环节,并通过“制度化、法律化”方式确保国家政治运行、事务管理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sup>[13]</sup>。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诠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理念

唯物史观认为,国家现代化水平最终取决于人民的智慧力量,这就要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将人民纳入中心要素加以考虑。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sup>[14]</sup>,这为中国式现代化秉持人民性提供了根本遵循。首先,中国式现代化的目的是为了人民。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归属点都是指向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群众史观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拥有坚定的人民立场和正确的群众观点。这一立场和观点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奠定了理论基石,从根本上解答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活动“为什么人”的原则问题<sup>[15]</sup>,不仅昭示着中国共产党为谁而立、为谁奋斗,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明确了前进方向。其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过程需要依靠人民。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sup>[16]</sup>,广大群众是物质财富、精神食粮乃至所有历史的创造者,是“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sup>[16]</sup>。正如列宁所说,集结数以百万计人民的聪明才智将创造出远远超过某个或某些“最伟大的天才预见”的成果<sup>[17]</sup>。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为中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从本质上反映了现代化是人民的实践活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解决现代化发展动力问题的制胜法宝,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凝聚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共识,形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合力。最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

的本质要求和必然趋势,它承载着全体人民的殷切期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从全体人民根本利益出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有助于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有效防范两极分化,让全国各族人民都有机会、有条件享受现代化建设成果。

(三)“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要求

民主作为政治文明的重要象征,是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尺之一,其实现程度对于一个政党能否长期执政、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和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高人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建设的参与度、作用力,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来说至关重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sup>[18]</sup>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吸纳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的基础上,坚持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放在中国人民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为中国式现代化探寻出实现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在有效实现和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方面的比较优势和制度效能。全过程人民民主凭借其所具有的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实践环节,主要从政治参与制度和政治参与实践两个层面体现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首先,在政治参与制度层面,全过程人民民主拥有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有助于更好地为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系统性规范和整体性保障。这一制度体系主要包括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党和国家监督体系<sup>[18]</sup>,相应地为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重要制度载体、独特制度安排、坚实制度保障。其次,在政治参与实践层面,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主政治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深化认识而形成的,因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拥有丰富的民主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构成主要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环节<sup>[12][26]</sup>,这些环节共同组成了完整镶嵌、协同合作的政治参与

闭环链条,使人民能够在制度保障基础上广泛、有序地参与中国式现代化。也就是说,通过真实的、具体的民主实践,充分发挥人民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主体作用,使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政治权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各领域、各环节都得到体现和落实<sup>[12]261</sup>。

### 三、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课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全过程人民民主不可能单方面实现,需要中国式现代化各要素之间的协调联动、相辅相成。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sup>[17]</sup>,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保证

全过程人民民主解决了如何将具有内在异质性、显著多元性和高度分散化的自由个体整合凝结为“人民全体”的最大问题,而这个问题得以解决的关键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即“人民通过党的领导凝聚为有机整体”<sup>[19]</sup>。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发展范式和前途命运息息相关,是现代化进程中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序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第一,坚持党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领导。党的政治领导是为实现执政目标而协调调动党内外各种政治力量和政治资源,以确保能够始终把握大局的根本性领导。党的政治领导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守和奉行人民本位的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路线,是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贯彻落实到全过程人民民主实际运行各个环节的关键之举。因此,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将党的政治领导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首位,不断提高政治敏锐性,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第二,坚持党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思想领导。党的思想领导在党的全面领导中具有先导作用,是政治领

导、组织领导的基础前提,毛泽东将其视为“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sup>[20]</sup>。思想领导在内容上主要包括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用先进思想、科学理论教育和武装人民头脑,其中最重要的是实现党的正确主张向群众自觉行动的有效转化。这就决定了坚持党的思想领导,必须坚持不懈地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式现代化,保证全过程人民民主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第三,坚持党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组织领导。党的组织领导主要以干部队伍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为抓手,旨在积极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以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组织整合、培育规范全党全社会力量,使之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以践行党的思想主张和完成党赋予的各项任务。发挥党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组织领导作用,确保广大党员干部、基层组织、人民群众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 (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物质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经济形态和生产力的现代化程度较低,全过程人民民主就缺少充足的物质条件。党的十九大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要求<sup>[21]</sup>,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理念指导和目标遵循。只有肩负起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使命和重大任务,才能推动我国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经济社会发展长足进步、人民生活幸福指数日益增长,才能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坚实的物质资源和发展前提。第一,坚持以共同富裕价值理念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追求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能够在“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之间达成均衡,因为其核心理念并非强调以分配手段为主的“均贫富”而是更加注重“共发展”<sup>[22]</sup>。在新征程上必须将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使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各种生产力要素尤其是劳动者——人民群众的参与性、创造性得以充分激发。第二,坚持以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全方位的保障体系,即以“创新”增强发展驱动力,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科技含量和竞争实力;以“协调”解决发展失衡问题,避免中国式现代化产生“木桶效应”;以“绿色”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以“开放”实现内外联动,使中国式现代化顺应经济全球化历史潮流;以“共享”弘扬社会公平正义,让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人民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第三,坚持以数字经济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在技术创新、产业融合、资源配置、市场扩张等方面的优势与潜力日益凸显,是当今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新引擎、新趋势<sup>[23]</sup>,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动能、新战略。发展数字经济要抓住构建数字经济创新体系、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两个重要着力点,通过建立健全人才供给、数字科技、产业政策、体制机制等方面的支撑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新的经济基础,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新型经济样态支持。

(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母体

民主作为政治或社会组织的理想形式而存在,意味着“在现代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最高目标上取得了基本一致”<sup>[24]</sup>。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指出,如果政治制度化水平落后于民众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步伐,就会导致政治骚乱或政治动荡的后果,“一个社会的成分越复杂,各种集团越是纵横交错,其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和维持就越依赖于政治体制的功效”<sup>[25]</sup>。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前途光明但任务艰巨,更需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运行的力量,汇聚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齐心协力、团结一致的民众力量。第一,大力培育全体人民的民主意识和能力。民主意识作为民主及其制度的精神和思想先导,是人民对民主价值、民主权利以及民主生活的观念认知和心理反应之总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将培育全体人民的民主意识放至首位,加大民主思想、民主理论、民主制度、民主方法的宣传教育力度,不断增进人民群众推进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自觉,切实提升人民群众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能力和实践水平。第二,坚持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发展民主不仅需要凝聚全体人民的社会政治共识,更需要发挥健全制度体系的作用。民主制度作为将全过程人民民主从先进价值理念转化为生动政治实践的重要载体,是确保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序性、持续性和全局性发展的根本保障。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要以制度建设为根本抓手,弥补和改进既有体制机制运行过程中的短板空缺或薄弱环节,在重点完善以强化权力制约、防范权力滥用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体制机制的基础上,构建起科学合理、系统完整、高效衔接的民主制度体系。第三,不断优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实现增进人民福祉这一根本目标,必须拓宽和畅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渠道。这就要求把民主形式的传承与创新结合起来,在传承既有的党内民主、协商民主、基层民主、参与民主等有效民主形式的同时,进一步创造出更多贴近人民生活、协调群众利益、化解社会矛盾的民主形式,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发掘新的活力源泉。

(四)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精神支撑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血脉熔铸于文化,灵魂根植于文化,文化对国家的前途命运和民族的未来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沃壤和智力引擎,要以理论指导、思想引领、理想教育等方式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铸魂,丰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精神世界,从而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提供精神支持。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指导,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明确发展方向。民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民主的探讨与实践,对社会主义民主实践产生了广泛而直接的影响。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具体实际,走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理论内涵、制度内涵、实践内涵

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使全体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实现。第二,弘扬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思想源流。党内政治文化与政党政治息息相关,是决定一个政党是否具有旺盛生命力、强大凝聚力和鲜活创造力的精神旗帜。中国共产党在政党政治的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的党内政治文化。应进一步提升广大党员干部政治素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增强党的政治能力,使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行稳致远。第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凝聚价值共识。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国家层面的价值追求。邓小平指出,一个大国要实现组织和团结起来,“一靠理想,二靠纪律”<sup>[7]</sup>。这里的“理想”主要是政治理想——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了实现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政治理想,必须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全党全社会的教育引导作用,使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深入人心,从而汇集起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 (五)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自然条件

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只有在尊崇自然、清洁低碳、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中才能行得通、走得远。随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人民群众对优质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更加渴望,生态文明需求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民主权利或民生工程。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深刻转变,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运行中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赖以有序发展的自然基础。第一,充分发挥人民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体作用。生态环境属于具有非独占性或非排他性特征的最基础的公共产品,与每位社会成员的生存发展都密不可分,这就决定了生态文明建设是全体人民共同参与的公共事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要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生态文明建设,引导人民群众积极、广泛、有效地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促成民心民意、民智民力转变

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内生效能,使广大人民群众成为生态文明的弘扬者、践行者和贡献者。第二,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丽生态环境需要。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sup>[26]</sup>。为了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于优美生态环境的愿望诉求,必须立足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始终坚持生态利民、生态惠民、生态为民的原则,着力解决影响人民群众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问题,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与民生改善统筹起来,让人民群众享有数量更多、质量更优的生态产品和环境资源,使优美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群众健康幸福生活的持续增长点。第三,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新格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如果善待自然就会获得慷慨的回报,一旦伤害自然终将受到无情的惩罚,这是人与自然之间无法抗拒的内在规律。要将人的行为和经济活动严格控制在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承载能力的限度内,形成以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为主线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发展方式,为实现人的民主权利与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44.
-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15.
-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82.
- [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3.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

[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0]张亮,孙乐强,等.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若干重大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197.

[11]韩旭.国家治理视野中的根本政治制度——改革开放40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逻辑[J].政治学研究,2018(6).

[1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1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6.

[1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43.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7.

[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55.

[17]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85.

[18]田玉麒.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逻辑[N].光明日报,2022-11-28(15).

[19]林尚立.论人民民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29.

[20]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35.

[2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0.

[22]金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共同富裕路径逻辑[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

[23]任保平.数字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有机衔接的机制与路径[J].人文杂志,2023(1).

[24][美]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M].冯克利,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6.

[25][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7-8.

[2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59.

责任编辑:张淑瑛

# 中国国家治理中的参政党:主体、功能与能力分析

任世红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210007)

**摘要:**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参政党是参加国家政权、协助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的政党。参政党与执政党是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参政党的存在以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前提,参政党的价值在于辅助中国共产党更好地完成执政使命。参政党是国家治理的合作者、参与者和同盟者,发挥着咨政、辅政、督政功能。参政党参与国家治理,发挥相应功能,需要具备政治能力、组织能力、代表能力等政党能力。

**关键词:**参政党;国家治理;政党主体;政党功能;政党能力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2.009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2-0066-08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政党政治模式。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参政党是参加国家政权、协助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的政党。参政党与执政党是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参政党的存在以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前提,参政党的价值在于辅助中国共产党更好地完成执政使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职责与使命是全面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的基本职能,全面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履职能力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在助力国家治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彰显新作为、展现新面貌。中国的参政党是人类政党发展史上的一种新型政党类型。深入探讨参政党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角色、功能定位和能力构成,是加快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一个基本问题,对于新时代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 一、参政党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角色

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下,参政党参与国家治理,主要体现为如下三对基本关系。一是参政党与执政党的关系。参政党与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开展直接的党际合作,双方通过党际互动

收稿日期 2024-01-23

基金项目: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3BKS04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任世红,男,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理论江苏研究基地专家组成员,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来实现合作治理国家的共同目标。二是参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参政党以其成员个体的名义参加国家政权,间接参与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治理过程。三是参政党与人民政协的关系。参政党以党派界别的身份参加人民政协,参与政治协商。

(一)从多党合作层面看,参政党是国家治理的合作者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阐明了共产党团结联合其他工人政党以及民主政党的基本思想和原则。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立新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的重要观点<sup>[1]</sup>,主张多党合作建立新中国的重要方针。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sup>[2]</sup>,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为各革命阶级及其政党协商建立新中国创造了重要的政治条件。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成立了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确立。《共同纲领》总纲规定,新中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sup>[3]</sup>。这一方面明确了新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另一方面也清楚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新中国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至此,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各民主党派事实上成为参加国家政权的参政党,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领导与合作关系得到《共同纲领》的确认。

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参与新中国的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者,不是中国共产党的竞争者。对此,各民主党派的代表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发言有着明确的政治共识。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表示:“在今后的新中国建设的艰巨工作中,我们还要更加巩固四阶级

联盟,在中国共产党及毛主席领导之下,按照本届会议制定的蓝图——共同纲领,不避艰辛,再接再厉,向前迈进!”<sup>[4]</sup>民盟代表沈钧儒表示:“现在我们全体代表,包括民盟代表在内,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团结一致,共同商量,办理革命建国的伟大事业。”<sup>[5]</sup>民进首席代表马叙伦表示:“我们已经形成了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我们不但得到了胜利,而且能够巩固这个胜利,开始建设新中国。这是有保证的,因为有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们。”<sup>[6]</sup>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不会因建立新中国使命的完成而终结,而是在建设新中国的新征程中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从头建造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sup>[7]</sup>。1956年,中国共产党提出并确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1957年,毛泽东提出“六条政治标准”,作为多党长期合作的共同政治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sup>[8]</sup>。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一道进入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之后,继续在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中发挥参政党的功能与作用。新形势下,各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与执政党共同致力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二)从国家政权层面看,参政党是国家治理的参与者

新中国的国家政权具有鲜明的统一战线特征。《共同纲领》序言开宗明义:“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sup>[9]</sup>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内领导国家政权,并且组织政务院(最高政务执行机关)、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军事统辖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审判机关)及最高人民检察署(最高检察机关)<sup>[10]</sup>。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由63人组成,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

主人士 30 人,包括 3 位副主席(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和 27 位委员,占比近 50%。政务院有 4 位副总理,其中有 2 位为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黄炎培、郭沫若);有 15 位政务委员,其中有 9 位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政务院下辖 4 个委员会和 30 个部、会、院、署、行等机构,担任正职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有 14 人<sup>[5184]</sup>。此外,还有程潜担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沈钧儒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强大阵容,充分体现了“统一战线的联合政府的性质”<sup>[6]</sup>,成为参政党参与国家治理的良好开端。

新中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政府是基于民主集中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sup>[282]</sup>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具有过渡性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建立后,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政协代行人大职权的历史使命将宣告结束。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在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各级人大以及由人大选举产生的各级政府中,是否仍将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是否还能进入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这关系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后,参政党是否还能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以及以何种方式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等的重大问题。1953 年 1 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二十次会议,讨论关于召开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仍将是代表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统一战线的政府,它是对全国人民都有利的。”<sup>[720]</sup>1953 年 7 月,第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制定的《关于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时安排民主人士的意见》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实行,决不是要削弱统一战线,而是更应使之巩固和加强;并提出凡是有民主人士的地方,在县市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统一战线组织、部分人民团体和其他组织中,对民主人士都需

要注意给予统筹安排<sup>[8]</sup>。经过充分酝酿和筹备,1954 年 9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一届全国人大共有 1226 名代表,党外人士 558 人<sup>①</sup>,占 45.52%。在新组建的国务院 35 个部、委的部长、主任中,党外人士 13 人<sup>[9216-217]</sup>。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国家政权,体现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要求,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中仍得以适当的安排,为参政党通过政权机关服务国家治理提供了制度保证。《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则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对参政党参加国家政权提供了法治保障。

(三)从人民政协层面看,参政党是国家治理的同盟者

政治协商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各种政治力量在“和平统一、民主建国”这一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上展开合作的重要形式。1946 年 1 月,政治协商会议(史称“旧政协”)在重庆召开。中国共产党与民盟以及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会场内外紧密合作,最终达成体现和平民主建立新中国精神的五项协议。但是,之后国民党镇压民主人士,发动内战,破坏政协协议,战后和平建立新中国的努力也随之中断。旧政协是一次失败的意以协商建立新国家的尝试,但政治协商会议这种形式在其后的中国政治发展中得以沿用并被赋予新的政治价值与功能。1949 年 9 月 7 日,周恩来在《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政协是沿用了旧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但以它的组织和性质来说,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今天这样的会,决不是发源于旧的政协。”<sup>[284]</sup>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集中表现,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所形成的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协商建立新中国而召开,但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理应长期存在,并且成为党派性的协商机关。1954 年 12 月 19 日,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政协工作时指出:“政协不仅是人民团体,而且是各党派的协商机关,是党派性的机

①当时主要是指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

关。”<sup>[7634]</sup>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后,人民政协回归长期性的统一战线组织的性质定位,赋予党派性的协商机关的功能定位,成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参与国家治理的专门协商机构。

新中国构架的国家制度框架和国家治理体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民主集中制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根本原则,坚持以统一战线的方式治理国家和社会,把执政党系统、国家政权系统和人民政协系统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了当代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特征和独特优势。周恩来曾指出:“现在有党的系统,有政权的系统,再加上政协的系统,这就更能反映各个方面的意见,并有利于决议的贯彻执行。”<sup>[2118]</sup>同时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新型政党制度建设不断加强并日益完善,使参政党全面有序进入执政党权力运行、国家权力运行、专门协商机构运行的政治过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治理主体,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一起构成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政党主体。

## 二、参政党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定位

参政党在国家治理中的政党功能,既不同于执政党,也与竞争性政党制度下的在野党或反对党有着根本区别。执政党治国理政,主要是通过制定治国方略、使用治国人才、掌控治国过程、评估治国绩效等执政行为,推动和实现国家治理的目标和任务。此外,执政党代表社会治理国家,需要协调不同政党之间的合作关系,以维护执政地位;执政党掌握国家政权,对外需要处理不同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以维护国家利益。西方政党制度中,在野党或反对党可以利用国家立法机关对执政党进行权力制衡,对执政党治理国家的决策及过程实施权力监督,并在此过程中进行行政见表达或政党抗争,以期赢得选民的关注与支持、影响公共治理的决策及过程。参政党在国家治理中的角色特性决定了其治理功能的定位。参政党在国家治理中的角色具有从属性与参与性,因而

其治理功能不是统揽性的,亦非替代性的,而是一种咨政性和辅助性的治理功能。具体而言,中国参政党活跃于党际合作、国家政权和人民政协等三个政治场域,在参与国家治理中发挥着咨政、辅政、督政等功能。

### (一)咨政功能

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参政党与执政党在政治上有着双重关系。一是参政党接受执政党的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这是参政党与执政党合作最为根本的政治基础。二是执政党同参政党进行政治协商,并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这是参政党与执政党合作的重要内容。第一种关系是前提,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参政党参加政治协商的政治前提;第二种关系是条件,即政治协商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途径。第一种关系决定了参政党参与政治协商不是争夺领导权或者分掌执政权,第二种关系决定了执政党要把同参政党的政治协商作为凝聚智慧、增进共识、促进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和推进合作治理国家的重要方面。参政党参加政治协商,为执政党治理国家进行政治决策提供参考建议;执政党通过协商凝聚共识,通过吸收参政党的合理建议实现科学民主决策。在中国国家治理的决策过程中,执政党是国家治理的决策主体,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集中决策;参政党与执政党通力合作,通过向执政党提出政策建议的方式间接影响国家治理的公共决策。从这个意义上看,参政党在国家治理的公共决策中发挥的是咨政功能,其内涵及特点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咨政不同于执政,咨政不具有决策功能,国家治理决策是执政行为;二是咨政不同于政治抗争,咨政不具有否决功能,政治抗争是针对执政决策的反对行为;三是咨政服务于执政党的政治决策,为国家治理的公共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四是咨政绩效既取决于建议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又取决于执政党采纳的力度及其产生的实践效果。

参政党咨政功能的发挥,主要通过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来实现,以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制度体系为保障。1989年颁发的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1989年《意见》”)对中国成立以来所采取的党际协商形式作了总结,主要有民主协商会、小范围谈心会、座谈会等会议形式,以及书面建议和约谈等<sup>[9]481-482</sup>。2005年颁发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2005年《意见》”)进一步完善了党际协商的内容、形式和程序,尤其是提出“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协商,是政治协商的重要原则”<sup>[10]762</sup>。提出政治协商的这一重要原则,其重大意义就在于把党际协商纳入党和国家的决策程序,从制度建构上明确了参政党参与国家治理的咨政功能。2015年颁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列举出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七种协商渠道,强调要加强政党协商保障机制建设,要求健全知情明政机制和完善协商反馈机制;要进一步完善政协协商,加强政协协商与党委和政府工作的有效衔接<sup>[11]293,294,296-297</sup>。2022年发布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进一步明确各民主党派是参加政党协商和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重要主体,为参政党通过政党协商和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更好发挥咨政功能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机制保障。

## (二)辅政功能

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参政党成员参加人大、政府、司法机关,担任政府和司法机关领导职务,积极参与国家治理;二是参加国家政权的参政党成员在中共党委或党组领导下依法履职,参加国家和地方的立法、行政和司法工作,在岗位上履职尽责。在国家政权机关中的参政党成员依法履行职责,不是把各自党派的政治主张通过政权机关变成国家治理的公共政策和法律法规,而是贯彻执行国家的宪法法律和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参政党成员进入国家政权机关,不是与执政党分庭抗礼,而是通过与执政党成员合作共事,共同服务国家和社会。具体来看,担任人

大代表的参政党成员,依法履行人大代表职责,参与国家和地方的立法工作,但人大不设立“议会党团”,参政党成员在人大选举投票时并不接受所属党派的指令,参政党对人大中的党派成员也不施加影响。在政府和司法机关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参政党成员,对其分管的工作享有行政管理的指挥权、处理问题的决定权和人事任免的建议权,但应自觉服从中共党组(党委)的领导,切实履行岗位职责<sup>[10]768</sup>。由此可以看出,参政党通过政权机关参与国家事务的治理过程,发挥的是一种辅政功能,其内涵及特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辅政不是参与执政,而是辅佐执政党运作国家政权,合作治理国家公共事务;二是辅政不具党派名义,有利于形成国家治理的合力,能够有效避免党派之间的权力争斗;三是辅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反映和代表人民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有助于维护为民治国的价值导向,能够有效避免党争极易导致的社会撕裂。

参政党辅政功能的发挥,主要通过参政党与执政党在国家政权中的合作共事来实现,以国家政权中实行多党合作的具体制度安排为保障。1989年《意见》首次明确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定位,对保证参政党成员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占有适当比例作出了制度性的安排,并对选配参政党成员担任政府及各级司法机关的领导职务提出了具体要求<sup>[9]482-485</sup>。2005年《意见》提出,“要保证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在各级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人大专门委员会委员中占有适当比例,在各级人大领导班子成员中有适当数量。在全国和省级人大常委会中应有民主党派成员或无党派人士担任副秘书长”,“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要选配民主党派成员或无党派人士担任领导职务。重点在涉及行政执法监督、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紧密联系知识分子、专业技术性强的政府工作部门领导班子中选配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领导职务。符合条件的可以担任正职”<sup>[10]763-764</sup>。《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对党外代表人士的培养使用作了具体规定。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多党合作的制度建设,延续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家政权机关中对民主党派成

员和无党派人士作出适当安排的政策,并且实现了制度化 and 规范化,充分保证了参政党成员在国家政权中发挥辅政作用。

### (三)督政功能

参政党参与国家治理,扮演着执政党的参谋、帮手、同事的重要角色,既可以发挥建设性的正向作用,也可以发挥批评性的纠偏作用。前者是咨政和辅政的功能,后者则是督政的功能。从国家治理决策看,参政党不是决策主体,但可以就执政党决策提出意见和建议;从政权运行过程来看,参政党不是执政主体,但可以监督决策实施过程,并提出解决问题或纠正失误的意见和建议。参政党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可以使执政党听到“不同的声音”,可以为国家治理决策提供“另一个角度”。“这样,反映的问题更多,处理问题会更全面,对下决心会更有利,制定的方针政策会比较恰当,即使发生了问题也比较容易纠正。”<sup>[12]</sup>参政党协助执政党更好地领导国家治理,防止决策失误,不犯大错误;参政党成员参与政府公共事务治理,帮助发现和纠正治理的失当行为,减少错误影响。这种督政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等柔性多元化方式,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监督。参政党对于执政党决策和政府施政提意见、作批评,发挥的是督政功能,其内涵及特点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督政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是为了防止决策失误或治理失效,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为了实现国家治理的共同目标;二是督政所提意见、所作批评,不具否决性质,而是一种协商式监督;三是督政是民主治理的一种方式,不是实施法律监督,而是一种政治性监督。

参政党督政功能的发挥,主要是通过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民主监督渠道来实现,以民主党派对党和国家的民主监督制度为保障。1989年《意见》明确了参政党发挥监督作用的总原则,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民主监督的前提;二是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及各项工作提出意见、批评、建议,这是民主监督的内容和方式<sup>[13]</sup>。2005年《意见》对参政党发挥民主监督的性质、内容、形式、机制等进行了系统规范,指出民主监督是一种政治监督,强调要

进一步拓宽民主监督的渠道,切实完善民主监督机制的实践要求<sup>[10]766-767</sup>。2015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概括了参政党对执政党进行政治监督的十种主要形式,包括“受党委委托就有关重大问题进行专项监督”<sup>[11]545-546</sup>,为强化参政党的督政功能提供了新的着力点。新时代发挥参政党督政功能,需要拓展会议监督、书面监督、专项监督、检查监督、特约监督等多种形式,着力提升民主监督质效,为执政党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 三、参政党在国家治理中的能力结构

参政党的政党能力应与其在国家治理中的特定角色和功能定位相匹配。参政党作为国家治理的合作者、参与者和同盟者,在与执政党共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发挥着咨政、辅政、督政的重要政治功能。参政党以政党角色参与国家治理,发挥参政党功能,需要解决三个基本问题,具备三方面政党能力。一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下,参政党有其自身的参政纲领和价值诉求,参政党参与执政党治国方略及其政策的优化、执行和监督,是参政党融入国家治理的主动性问题,也是其参与国家治理的政治性问题。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参政党需要树立战略思维和宏观思维,政治能力是其发挥参政党功能的首要能力。二是在党际合作、国家政权、人民政协的政治场域中,参政党有其自身的组织体系和所配置的政治资源,参政党以政党名义与其他政治主体协商治理国家,是参政党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性问题,也是体现其参与政治过程的组织性问题。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参政党需要强化组织观念和整体观念,组织能力是其发挥参政党功能的关键能力。三是在多元一体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中,参政党有其自身的社会基础和所联系的社会群体,参政党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和联系部分特定群体,是其作为政党参与国家治理的代表性问题,也是其与执政党合作治理国家的动力性问题。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参政党需要增强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代表能力是其发挥参政党功能的基本能力。全面锤炼和提升政治能力、组织能力、代表能力

等政党能力,是参政党参加国家治理、实现自身功能价值的重要保障。

### (一)政治能力

政党是政治组织,在国家治理中发挥政治功能。因此,政治能力是政党能力的核心要素,政党的其他能力都是以政治能力强弱为目标指向并作为支撑条件而存在和发展的。参政党的政治能力是其在参与国家治理和政治过程中所应具有的综合素质和能力要素,是参政党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累积形成,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和更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参政党政治能力建设的本质要求。从政治角色看,参政党的政治能力首先表现为政治把握能力。参政党是执政党的合作者,认同并接受执政党的政治领导;参政党是国家政权的参与者,认同并遵守国家宪法法律规定的政治规则。参政党的政治把握能力不仅体现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认同和自觉维护的能力,也是一种对自身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性质定位的政治认同和行动自觉的能力。新时代参政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维护大局,始终与执政党团结共事、同舟共济,是提高自身政治把握能力的集中体现。

从政治功能看,参政党的政治能力还表现为参政党的政治创见能力。参政党立足自身的智力人才优势和界别特色,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言资政,不是简单地重复执政党的纲领路线政策,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对国家治理提出独到的政治见解和对策建议。参政党富有创造性的政治观点和政策主张,不是对现有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的拾遗补缺,而是聚焦国家治理领域的重大问题提出战略性的思考,是对政府治理、市场治理、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及其制度政策创新提出前瞻性的看法。从合作治理看,参政党的政治能力还包括凝聚政治共识的能力。参政党无论是参加政治协商,还是开展民主监督,都是以达成政治共识为目的,以形成国家治理的政治合力。

### (二)组织能力

政党是由党员个体组成的,党员个体是通过政党的组织体系组织起来的,没有组织作为依托,政党就不成其为政党。政党的优势在于组织,政党只有发展和运用组织能力,集智聚力、整合资源,才能有效介入国家和社会生活。参政党组织能力的生成和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历史上,参政党的组织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也不高,突出表现在组织覆盖面窄,基层组织呈零星分布状态。参政党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主要是发挥魅力型领袖人物和骨干成员的社会和政治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参政党的组织规模得到较快增长,组织体系趋于健全,组织化程度逐步提高。在此基础上,参政党治理功能的发挥也越来越依靠其组织能力的培育和提升。

从内部看,参政党的组织能力首先表现为组织内部的动员整合能力,包括成员个体与各级组织的联结关系,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的上下联动关系,还有不同地域组织横向的联合关系。提高这种内部的动员整合能力,是参政党在国家治理中发挥整体功能的时代需要,也是参政党整合各级组织和各类人才形成参政合力的必然选择。从外部看,参政党的组织能力表现为与其他政治主体的沟通协调能力。参政党在国家治理中咨政、辅政、督政等各项功能的发挥,不是依靠组织内部运作完成的,而是在与执政党、国家权力机关以及政协组织的沟通合作中实现的。参政党无论是与执政党的政党协商,还是与政府部门的对口联系,都是一种双向的政治互动。对外的沟通协调,是参政党有效融入国家治理过程的重要环节。此外,联系群众能力也是参政党组织能力的重要方面。参政党加强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开展社会服务等政治活动都需要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 (三)代表能力

政党的代表能力在政党的能力结构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政党在与社会沟通、民众联结中扮演着代言人的角色,发挥着利益代表的功能。政党执掌或参与国家治理,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或凌驾于民众之上,而是代表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民众的普遍诉求,制



定或影响治理政策。参政党的代表能力主要受自身社会基础变动和组织体系运行的影响,也与其在国家治理中辅助性的政党角色和参与性的政党功能密切相关。“为谁参政”是参政党的代表性问题,也是提升参政党声誉的根本所在。秉承天下为公的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为国履职、为民尽责,是参政党履职尽责的优良传统。

参政党的代表能力有两个维度:一是从主体上看,有个体代表能力和整体代表能力之分。个体代表能力是指参政党成员以个体名义通过政治参与渠道代表社会表达利益的能力,整体代表能力则是参政党以组织名义在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中代表社会集体发声的能力。参政党成员在政权机关中担任公职发挥辅政功能,主要体现的是个体代表能力。参政党在与执政党或政府部门的直接互动中(如政党协商、开展专项民主监督等)中发挥咨政或督政功能,主要体现的是整体代表能力。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治实践中,参政党的个体代表能力往往是整体代表能力生成的重要源泉。二是从客体上看,有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能力和代表特定社会群体的能力之别。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下,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参政党,都以实现和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治理国家的最高原则,而无各自政党的私利。参政党参政为民,要从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出发,同时,参政党有各自的主体界别和所联系的社会群体,在维护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反映自身所联系的部分群众的利益诉求,也是参政党发挥参政功能的应有之义。

####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9.
- [2]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
- [3]杨建新,石光树,袁廷华.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纪事暨资料选编.[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
- [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9:234.

- [5]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华文出版社,2017.
- [6]人民民主专政的机构[N].人民日报,1949-10-20(1).
- [7]中央文献出版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 [8]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162-163.
- [9]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
- [10]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
-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 [1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73.

责任编辑:刘菊香

# 壮锦: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绽放的艺术之花

——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系列之四

覃彩銮

(广西民族研究中心,广西南宁 530028)

**摘要:**壮锦是壮族人民使用棉线和丝线编织的一种传统手工艺品。壮锦历史悠久、图案生动、色彩斑斓、工艺精巧、内涵丰富、特色鲜明,是我国四大名锦之一。壮锦编织技艺于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壮锦承载着壮族深厚的历史文化记忆,凝聚着壮族人民的智慧和创造才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壮锦既保持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又吸收了诸多中原文化元素,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绽放的艺术之花。

**关键词:**壮锦;编织工艺;艺术特色;交往交流交融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2.010

[中图分类号]D633;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2-0074-08

壮锦是壮族人民使用棉线和丝线编织的一种精美传统手工艺珍品,是广西民族工艺文化瑰宝。壮锦历史悠久、图案生动、结构严谨、色彩斑斓、工艺精巧、内涵丰富、寓意深刻、特色鲜明,与云锦(南京)、蜀锦(成都)、宋锦(苏州)并列为我国四大名锦,也是其中唯一的少数民族织锦。2006年,壮锦编织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壮锦是壮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根据本民族的生活需要和审美情趣而创造的具有代表性的手工艺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需要的增长和审美意识的提升,壮锦的编织技艺不断改进,品种日趋增多,品质不断提高,民族特色也日益鲜明。一幅幅图案精美、工艺精巧的壮锦,凝聚

着壮族人民的勤劳智慧,反映了壮族人民乐观、包容的品格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承载着壮族历史文化记忆。另一方面,壮锦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中原文化及纺织技术的影响。壮族人民学习、借鉴和吸收了诸多中原文化元素,使得这一古老的织锦艺术之花更加丰韵绚丽、长盛不衰。正是壮族人民以包容、开放、进取的精神接受中原文化的浸润,才使壮锦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绽放的艺术之花。通过对壮锦的民族特色及其蕴含的中原文化艺术元素的辨识和分析,阐明壮锦艺术的发展历程及其与汉族文化的密切关系,有助于深化对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研究,促进广西各族人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收稿日期:2024-03-06

作者简介:覃彩銮,男,广西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壮族历史文化。

### 一、壮锦溯源

壮锦作为一种集编织与浸染工艺、实用与艺术审美为一体的手工艺品,随着纺织业的发展和纺织技术的进步而发展起来,经历了从初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民间到跻身名锦之列的演变历程。

壮族世代居住在岭南西部地区,其纺织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由于适宜的气候条件,当地生长着各种富含纤维的植物,如苧麻、葛根、蕉茎、木棉等,纺织原料丰富。早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当地的原始居民在长期的采集活动过程中,逐渐加深对含有可用来纺织的细密纤维植物的认识,并逐步掌握植物纤维提取和脱脂方法,使用纺轮搓捻纤维成纱线,用于织网或缝缀兽皮为衣。根据考古发现,在距今四五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里,发现有许多圆饼形或算盘珠形的石制或陶制纺轮,这是一种专门用于搓捻纱线的工具,即先民们通过提取植物根或根茎里的纤维,经过加工提纯,然后用纺轮将其纤维捻成细线,用来结网或织布。从对富含纤维植物的认知,到掌握对植物纤维的提取和去脂提纯方法,再到使用纺轮捻线与编织,标示着早期纺织的萌芽。商周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和金属工具的使用,壮族先民的纺织有了新的发展,无论是植物纤维种类、提纯技术还是纺织工艺和染料的使用,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并且出现了具有岭南地方特色的服式。如《战国策·赵策》载:“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瓠越之民也。”<sup>[1]</sup>《淮南子·原道训》亦云:“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像鳞虫;短卷不袴,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sup>[2]</sup>《战国策》中所说的“陆事寡而水事众”,指的是岭南居民主要从事水稻种植和水中捕鱼活动频繁;其服式流行“错臂左衽”,即穿着的衣服套于左肩及臂上,而右臂坦露,衣襟从左肩斜于右边身腰间。这样的衣着款式,便于右手在水中劳作。《淮南子》所称的“短卷不袴,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指平时人们腰间只围短裙,不着长裤,以方便涉水游渡;穿着短袖衫或卷起袖子,是为方便挥楫划

舟。这样的服式是由岭南炎热的气候条件和人们多从事水中劳作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在广西南宁市武鸣区马头镇安等秧战国墓地第7号墓葬中,发现一块包裹着细密织品的铜片,织品质白,结构精致,轻柔且有光泽,属苧麻布。经测量,每平方厘米有经纬线11根,结构紧凑平整<sup>[3]</sup>,体现了当时广西纺织业的发展和纺织技术的提高。先秦时期广西瓠骆人无论是“错臂左衽”,还是“短卷不袴”“短袂攘卷”,都是缝制的服式。既然出现了缝制的服式,自然也就有了可用于缝制衣服的布料;而布料又是由纺织机织成,说明当时已经出现织布机。据研究,早期的纺织机是木制的踞织机,即踞坐于地,将织机带绑于腰间,由提拉紧致式织布机综杆、分经棍和打纬刀组成。编织时,织者席地而坐,足蹬卷经棍,右手持打纬刀打紧纬线,左手投纬引线,如此反复操作,织成布幅。踞织机虽然结构简单,但已具备纺织机的基本功能,能够织出用于缝制衣服的布料。这是先民们经过长期的摸索创造的结果,标志着早期纺织机的出现,在纺织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秦汉时期,是广西纺织业发展的新时期。秦始皇统一岭南、设置郡县,广西大部地区属桂林郡辖地。秦始皇不仅将南征的数十万军队留戍岭南,而且将大批中原人南迁“与越杂处”,包括纺织技术在内的中原生产生活文化也随之传入岭南。西汉王朝建立后,至汉武帝时,平定了南越国,岭南复归统一。汉承秦制,继续推行郡县制,今广西大部地区属苍梧、郁林、合浦郡辖地,大批汉朝军队、官吏和百姓迁居广西,中原文化进一步在广西传播,广西与汉王朝及中原地区的关系日趋密切。随着中原地区纺织技术的传入,织布机也不断改进,即从原来的踞织机发展成单综织机或斜织机。这种改进型的织布机设置机架,应用杠杆原理,经面和水平的机座成五六十度的倾角,采用脚踏提综的开口装置,织者可以手脚并用,不仅提高了织布效率,织布品质也有了提高。在贵港市罗泊湾一号汉墓里,出土许多木制的纺织工具,计有翘刀、纬刀、吊桿、调综棍、纺锤棒、卷经板、圆棒、

绕线板、绕线棒、锥钉等<sup>[46]</sup>;另在该墓葬的七号殉葬坑里,发现了蚕丝黑地桔红回纹织锦残片,出土时十分鲜艳,可惜无法提取,还出土了麻鞋、麻布袜、漆丽纱帽等。另外,在墓葬出土的一块“从器志”上,记录了许多纺织品,如成匹的缙、苧麻布等。经广西绢纺工业研究所鉴定,M1:550 麻布标本支数在 200S/1 以上。丝织品主要是平纹的绢、纱衣料,结构细密,其经纬密度为每平方厘米经线 11 根,纬线 31 根<sup>[46]</sup>。据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载:汉代时,广西已能织出“其细者当暑服之,凉爽无油汗气。涑之柔熟如椿椒茧绸,可以御冬”的葛布。

唐宋时期,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日益壮大和迁居广西的中原人的不断增多,中原文化在广西的传播也日益加深,进一步促进了广西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广西纺织业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时期不仅纺织品种类增多,并且出现了人工种植苧麻和种桑养蚕,纺品品质不断提高,蜡染、扎染、绞缬等工艺亦相继出现。据史料记载,这一时期壮族的纺织品种类繁多,计有蕉布、竹子布、吉贝布、斑布,都洛布、苧麻布、綌布、绒布、丝布、食单等,其中以苧麻及其织品品质最佳。由于苧麻纤维细密,柔韧性佳、耐磨性和轻凉离汗的特点,经漂白后呈纯白色,富有光泽,适合南方炎热气候条件下穿着,因而驰誉中原,各地商贾纷纷前来购买,销往中原。正如《汉书·地理志》记载,岭南“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sup>[5]</sup>。唐代诗人张籍在《白纻歌》称赞白净、轻薄的苧麻布:“皎皎白苧白且鲜,将作春衣称少年”,意为人们穿着品质优良的白苧布缝制的衣服,显得年轻而雅致。宋人周去非亦盛赞广西苧麻织品的优良品质,并在其名著《岭外代答》中言:“邕州左右江峒,地产苧麻,洁白细薄而长,土人择其尤细长者为苧子,暑衣之,轻声凉离汗也。汉高祖有天下,令贾人无得衣練,则其可贵,自汉而然。有花纹者为花練,一端长四丈余,而重止数十钱,卷而入之小竹筒,尚有余地。”<sup>[6]</sup>这反映出广西纺织技术的提高。又如广西纺织的綌布、练布

等苧麻织品,因品质优良,受到时人的称赞。周去非《岭外代答·服用门》云:“邕州左右江峒蛮有织白綌,白质方纹,广幅大缕,似中都之线罗,而佳丽厚重,诚南方之上服也。”<sup>[6]</sup>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器》亦云:“练子,出两江州峒,大略似苧麻,有花纹者,谓之花练。土人亦自贵重。綌,亦出两州峒,如中国线罗,上有遍地小方胜纹。”<sup>[7]</sup>可以说,唐宋时期广西纺织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且形成鲜明的地方特色。正是纺织业的发展和纺织技术的提高,为壮锦的编织工艺奠定了技术基础。

关于壮锦产生的年代,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有汉代说、唐代说和宋代说。其中,持壮锦始于汉代说者的依据是贵港市罗泊湾一号汉墓中发现的黑地桔红回纹织锦残片<sup>[46]</sup>,但目前仅是孤例,而且根据墓葬宏大的规模、复杂的棺槨结构、丰富的随葬品和出现人殉等现象来看,墓主很可能是从中原南来任职的郡一级官员。因此,该墓葬出土的回纹织锦的残片,其来源或产地尚不能确定。认为壮锦产生于唐代者,主要以史料记载的“斑布”为据。有学者认为,史籍中所说的“斑布”,应是印花布,而非织锦。壮锦产生于宋代,这是目前广西学术界多数学者的看法,主要以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等史籍记载为依据。如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服用门》记载:“邕州左、右江蛮,有织白綌,白质方纹,广幅大缕,似中都之线罗,而佳丽厚重,诚南方之上服也。”<sup>[6]</sup>学者认为,所谓“白质方纹”,应是当时邕州一带壮族编织的壮锦;而“广幅大缕,佳丽厚重”,正是壮锦的显著特征。所以说,唐代应是壮锦的萌芽时期,宋代则是壮锦产生和发展时期,并且成为我国四大名锦和贡品。明清是壮锦进一步发展时期,不仅织锦范围扩大,品种增多,色彩丰富,编织工艺也益精。正如清代王锦《柳州府志》云:“壮锦,各州县出,壮人爱采,凡衣裙巾被之属,莫不取五色绒线,杂以织布如花鸟状,远观颇工巧炫丽,近视由觉粗粝,壮人贵之。”清代沈日霖《粤西琐记》亦云:“壮妇手艺颇工,染丝织锦,五彩灿然,与缣丝无异,可为裯褥,凡贵官

富商,莫不争相购之。”<sup>[10]</sup>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壮锦进入了繁荣发展和不断创新的新时期。

## 二、壮锦编织工艺与艺术特色

锦,通常是指经纬线无捻或加弱捻,先染后织,具有多种色彩和花纹的手工织物。壮锦也是如此,并且经历了从单色到多色、图案从简单到复杂、品种从少到多、生产规模从小到大、功用从实用品到艺术品的发展过程,反映了壮族织锦精湛的编织工艺和鲜明的艺术特色。

### (一) 编织工艺

传统壮锦是以棉、麻线作地经、地纬平纹交织,用粗而无拈的真丝作彩纬织入起花,在织物正反面形成对称花纹,并将地组织完全覆盖,增加织物厚度。壮锦可分为织锦和绣锦两类。织锦是以细纱为经,丝线作纬,经线一般为原色,纬线按织者的构思配以不同的色彩。绣锦则是在土布或织锦上,再刺绣出别具特色的花色图案,达到锦上添花的效果。彩色染料取自植物的根、叶、花,色彩艳丽。

壮锦的编织是一项系统的手工艺,需要有编织机、纱线原料、印染、编织工艺等。编织壮锦使用的是木或竹制的织机,主要由支撑系统、传动系统、分综装置和织花装置等构件组成的综蹻织机。根据织机结构,有两种分类法:一种是按有代表性织锦地分类,计有靖西织锦机、环江织锦机、宾阳织锦机三种类型;另一种是按照织锦的结构分类,分为排子机、环式低花本织机和竹笼机三种类型。两种分类法既有特色,也有交叉。

#### 1. 织锦地分类法。

(1)靖西织锦机:机身由机台、机架两部分组成,机台呈倒梯形,前窄后宽。机台前端设有坐板,后端承接机架,高77厘米。经纱从机架后梁出发,垂直下降到分经轴后水平转向,通过综、箝到卷布轴。箝装置在摆杆上,借助摆杆的重力和惯性来打紧纬纱。箝之后设两片地综,地综由综框和综丝组成长方形,提花综由综杆和综丝组成,从前至后依次排列,悬挂在机架上。织花时按所织图案要求依次提起提

花片综,牵动经线形成开口,可进行织花操作。此类织锦机取下提花片综后,仍可织布,可谓织锦和织布兼用。

(2)环江织锦机:此类机型亦由机台和机架两部分组成。机台长约130厘米,宽约90厘米,高约40厘米,机架高90厘米。前梁两端装置铁丝用来悬挂花本。两片管平纹组织的综框悬挂在立架中央的圆形横杠上,下面用绳子与踏板相连。花本用约40根竹尖编成。竹尖连着提花通丝,经线一一穿过通丝的综眼,利用花本来控制经线的开交运动,使经纱形成梭口,通过地纬,再依次拨动竹针,提起一组通丝,使通丝分出开口,即可进行织花操作。

(3)宾阳织锦机:因此类织锦是改进式机型,适合织锦作坊(厂)生产,因而为宾阳、忻城、靖西等地织锦厂所使用。机台长约170厘米,前窄后宽。机架中部和上部有两个杠杆结构,分别用来提拉提综和编结有花本的竹笼,竹笼机因此得名。悬挂竹笼的杠杆长约150厘米,后端吊有重物以保持机体平衡。竹笼两端用细绳垂吊一根竹棍,来分隔两面通丝。竹针编排在竹笼周围,整个竹笼就是花本。织花依据编排好的程序取下竹针,拉起一织组提花通丝就能牵动经线形成开口。竹笼机只用一片地综,配以踏杆,就能完成平纹地的制织。竹笼机没有梭子,在通过地纬时使用一种兼有梭子的打纬刀,即可进行织锦操作<sup>[11]</sup>。

#### 2. 织锦结构分类法。

(1)排子机:用木质排子做成提花(挑花结本)机构的木质织机。排子,又称花板,由平行、紧密排列的多根木条(排片)组成的方形框架,每根木条上都有一粒粒大小相等、位置不同的小木块。织工用排片小木块拼凑纹样意匠图案。纺机为多蹻双综结构,多用于织针数少的四方连续花纹图案。

(2)环式低花本织机:使用多根木棍作为提花机构的单综单蹻环式低花本织机,即利用一个踏板控制一个综片实现提综,借助压纱棒实现经纱开口。其特点是卷经机头(经轴)较高。这种织机主要流行于

龙州地区。

(3)竹笼机:用竹篾、木条编成,因形似猪笼而得名,用作提花(又挑花结本)的腰织机,为双蹠单综结构,由机身、装纱装置、提纱装置、提花装置、打续装置组成,设有两个脚踏板,一个脚踏板链接提花竹笼,另一个脚踏板链接综口装置。其最大的特点是产生了机架,即织机装置在机架上、以一定程序控制通丝升降的花本。这种竹笼机在宾阳、忻城、靖西等地的壮锦织造厂普遍使用<sup>⑨</sup>。

从以上的织锦机类型及结构看,排子织机和环式低花本机尚属结构较为简单的踞织机类型。而靖西织锦机、环江织锦机和竹笼机结构则较复杂,构件设置也较合理。特别是环江织锦机,既可织锦,又可织布。竹笼机可通过装置在机架上的竹笼控制通丝升降的花本,手脚并用进行编织,织造效率较高。此类织锦机应是在斜织机结构的基础上,为了适应编织壮锦的需要而改进的,不仅编织效率高,而且编织的锦幅增宽,图案也更为丰富,体现了壮族织锦技术的进步。这些是各地壮族在长期的织锦实践中不断摸索、改进的结果。

壮锦的编织,要经过多道工序,而且每一道工序都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和工艺要求。无论是个体家庭还是生产作坊,其工艺流程大体相同,说明壮族织锦工艺已相当娴熟。编织一幅壮锦,首先要针对织锦种类或功用,对织锦及花纹图案的样式构思或设计,而后依次进行编织纱线的准备、染色、浆线、卷(绞纱、布或牵经纱)、穿棕、穿筊、挑花结本、图案织造、布边织造等。织者多为有编织经验的中青年妇女。依照壮族习俗,壮锦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用品和装饰品,也是婚嫁中不可或缺之嫁妆。因此,编织壮锦是女孩必须掌握的一种技能。女孩从小就跟随大人学习织锦技艺,当掌握编织技艺后,便编织个人或家人所用及嫁妆所需的织锦。正如清代《广西通志》云:“嫁奁,土锦被面决不可少,以本乡人人能织故也。土锦以柳绒为之,配成五色,厚而耐久,价值五两,未笄之女即学织。”壮族妇女在长期的织锦实践中,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推动织锦技艺形成了一套完备体系。

壮锦的品种经历了日益丰富的发展过程。早期的壮锦主要是实用的被面、背带芯、衣裤襟花边、腰带、头巾、门帘装饰等。随着织锦技术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审美观念的增强,织锦品种日益增多。除了前期织造的品种继续生产外,增加了台布、椅垫、床毯、背带、围裙、挂包、坐垫、壁挂、锦屏等。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蟒龙纹壮锦,就是清代编织的壁挂。

壮锦的特点是图案多样,色彩丰富,呈现出绚丽多姿的风貌,色彩对比强烈。这是因为壮锦多以原色(白色)或染成黑色的平纹棉布作地,而后将用于编织花纹图案的纱或丝线分别浸染成红、黄、蓝、绿色,再依照构思或设定的花本,用浸染色彩的丝或纱线进行编织。其传统染料均取自植物的根、叶、花的色素制成。壮锦多用各种红色(如紫红、水红、金鱼红等)为背景,也有用绿色或黑、黄色混织加以烘托。壮锦图案构成的式样大致有三种:一是平纹上织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的几何纹,组成连绵的几何图案,显得朴素而明快;二是以各种几何纹为底,上饰动植物图案,形成多层次的复合图形,图案清晰而有浮雕感;三是用多种几何纹大小结合,方圆穿插,编织成繁密而富于韵律感的复合几何图案,有严谨和谐之美。传统图案有数十种之多,大都选取自然界或生活中常见的物象、崇拜的动物和象征吉祥的花纹,尤以几何纹为多。常见的有方格纹、水波纹、云纹、雷纹、回形纹、编织纹、羽形纹、勾连云纹、万字纹、同心圆纹以及雷、电、风、雨、水、花、草、虫、鱼、鸟、兽等图像,而且多已艺术化和图案化,如蝶恋花、凤穿牡丹、双龙戏珠、狮子滚球、鲤鱼跳龙门、蹲蛙等。凤凰在壮族人的心目中,是吉祥、美好、幸福的象征,因而凤形图案在壮锦中占有重要地位。青蛙是壮族崇拜的祥瑞灵物,在红水河流域壮族民间,自古以来一直流行在春节期间举行祭蛙活动(蚂蚱节),祈求风调雨顺、生产丰收、人丁兴旺、社会安定。在壮锦上织以青蛙图案,寓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丁兴旺。因此,壮锦上的各种花纹图案,源于壮族人民对自然物的观

察和喜爱,通过采撷印象深刻的自然物象、民间信仰和民族文化事象,运用艺术手法进行凝练与升华,形成既抽象又不乏具象且造型美观、色彩绚丽、对比强烈、寓意丰富、特色鲜明的花纹图案,增强了壮锦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其丰富多彩的花纹图案,承载着壮族源远流长的丰富文化,体现了壮族人民严谨的思维、乐观的品格、淳朴的审美情趣以及对社会和谐、生活美好的追求,反映了壮族人民的艺术创造才智。因壮锦是在白或黑织布之上,使用染以色彩的纱、丝编织各种精美的花纹图案,因而变得“佳丽厚重”,而且结实耐用,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艺术和审美价值。

## (二)艺术特色

壮锦是在壮族编织业发展的基础上,基于人们生活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深植于壮族文化沃土,凝聚着壮族人民的智慧,饱含着壮族人民深厚情感,故延绵千余年而不衰。与我国的云锦、蜀锦、宋锦相比,壮锦无论是编织工艺,还是花纹图案种类、造型及色调,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1.独特的竹笼机。壮锦的编织工艺、经纬线的密度、锦幅宽度、花纹图案布局、构图与造型、色彩搭配等,都与织锦机结构有密切关系。壮锦的质地、图案造型、色彩搭配之所以与其他三大名锦不同,主要是源于壮锦使用竹笼机织造有关。如前所述,竹笼机是壮族人民在长期的织锦实践中,为织锦编织图案的需要创造的一种装有支撑系统、传动装置、分综装置和提花装置的手工织机。织机架设置的“花笼”,可以通过编排和提织花纹图案,即以棉纱为经,以各种彩色丝绒为纬,采用通经断纬的方法巧妙交织成花。可以说,用花笼起花是壮锦织机的突出特点。

2.色彩绚丽,清新自然。壮锦流行使用几种不同颜色的丝线织成,传统染料均取自当地生长的植物根、叶、花。丝线经过浸染,形成以红、绿、黑、黄为主的色彩。织者依据编织的花纹图案的原生形态,配置相对应的色彩。例如,水波、蓝天、花叶等,通常配以蓝色;对花卉、虫鱼、鸟兽等,则以多种色彩配置;在

主体图案周围的几何形图案,分别使用多种色彩相衬托,形成色彩绚丽、主次分明、对比强烈的效果,其风格既热烈奔放,又朴实自然。

3.源于自然、贴近生活的花纹图案。在经线上通过纬线编织各种花纹图案,是织锦的重要特征。不同民族或不同性质的织锦,由于生活环境、审美情趣或织锦功用的不同,织锦上的主体图案亦不相同,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壮锦源自民间,是壮族人民根据社会生活的需要,在纺织业发展的基础上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是我国四大名锦中唯一少有官方背景的民用手工织锦。与云锦、蜀锦、宋锦呈现的繁缛厚重、雍容华贵的风格相比,壮锦显示出精巧玲珑、色彩绚丽、清新别致、乡土气息浓郁的风格。这是由于壮锦所生活的亚热带环境和世代以稻作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塑造了壮族包容谦让、安土重迁的品格和重视实际、崇尚安定和谐的价值观。因此,织锦的主体图案多以壮族喜爱、寓意吉祥的自然物象和崇拜的灵物,如水波、起伏的山峦、花卉、凤凰、牛、马、羊、雄鸡、蛙、瑞狮、寿龟等,而且采用提炼、概括、抽象艺术的手法,将之图案化或符号化。这些源于自然、贴近生活的图案,具有浓厚的稻作文化色彩,反映壮族崇尚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珍爱民族文化的人文情怀和追求风调雨顺、生产丰收、人丁兴旺、社会安定的美好愿景。

## 三、壮锦上的中原文化元素

壮锦是壮族编织的一种兼具实用性与工艺性的代表性手工艺品,是壮族文化的瑰宝,也是壮汉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和历史见证。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自秦以来,地处南部边塞的广西一直属于统一国家的一部分,为中央王朝所管辖。大批中原人相继南迁“与越杂处”,共同生产生活,中原文化随之不断传入广西。特别是在汉朝,中原文化的传入及其对广西民族文化的影响日益加深。南迁的中原人带来的纺织技术,极大促进了广西纺织业的发展,为壮锦产生与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壮族纺织业和织锦图案,不仅受到中原汉族纺织技

术及蜀锦的影响,还借鉴和吸收了诸多中原文化元素,使之成为壮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整合体。

综观中原纺织技术对壮锦织造的影响和壮锦编织过程中所学习吸收的中原文化元素,主要体现在织锦机结构和壮锦图案两个方面。

中原纺织技术对壮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中原纺织机和纺织技术传入广西及其对壮族织锦技术的影响。西汉时期,壮族先民纺织的苧麻布,因具有轻薄而磨的优良品质而驰誉中原。但在西汉之前,壮族先民织布使用的应是踞织机,这是一种结构简单的织布机,使用双手操作,所织布幅较窄,效率也较低。此时的中原地区,已普遍流行使用结构合理的斜织机。织布时,人可以坐在织机横板上,手抛线梭,脚踩踏板而织,不仅效率高,布幅也较宽。另一方面,中原地区不仅纺织棉、苧麻类布,而且织造丝织品。在广西贵港、合浦汉代墓葬里,出土了各种棉织品和丝织品。在贵港罗泊湾一号汉墓里,发现有纺织机的木构件和丝织品。在出土的《从器志》木牍(随葬品清单)上,记录有成匹的丝、绢、缯等织品。由此可以断定,西汉时期不仅有大量的中原优质织品输入广西,其性能先进的纺织机和纺织技术也已传入广西,逐步为当地壮族先民所认同、学习和吸收,促进了广西纺织业的发展,为壮锦的产生奠定了技术基础。

蜀锦对壮锦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壮锦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受到了蜀锦的影响。宋代,中央王朝需要“绸绢纳布丝锦以供军需”,在四川设置“蜀锦院”,生产蜀锦。大量蜀锦通过水路运抵广西,再由广西输出海外,此时壮族人民才有机会接触和认同蜀锦。受其启发和影响,壮族人民便在原有的纺织工艺基础上,观察并掌握了蜀锦编织工艺,结合本民族的需要和审美情趣,编织壮锦<sup>[10]</sup>。宋代广西已成为西南地区土特产品外销的重要通道,宋王朝在广西设立横山寨、永平、钦州三大博易场。其中,横山寨博易场(今田东县城)是滇、黔及桂西土特产汇集、交易的重镇,也是宋王朝从云南购买或调集军马、铁器等军需物资的重要市场;钦州博易场是内地商品出口外销的重要

市场;永平博易场(今宁明县)主要是广西与越南特产的交易场。四川成都蜀锦院生产的蜀锦通过广西出口海外,壮族借鉴和吸收蜀锦的编织工艺并应用于壮锦的编织是完全可能的。

壮锦花纹图案受到中原青铜器纹饰的影响。在平纹布上编织各种花纹图案,使之具有“厚重佳丽”的品质,是织锦的重要特征。在织锦上编织各种色彩的花纹图案,不仅具有美化织锦的作用,还赋予了特定的寓意,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审美情趣。在我国四大名锦中,无论是云锦、蜀锦、宋锦还是壮锦,莫不如此。四大名锦的主体图案也具有诸多相同点,如动物中的凤凰、龙、瑞狮、麒麟、鲤鱼、蝴蝶、鸳鸯、龟、蝙蝠,植物类的牡丹、荷花、石榴、菊花、梅花等,其图案多源自人们崇拜或神话传说中的祥瑞之物。但图案的造型、配色和编织技艺,则各具特色。同时由于所处的自然环境和民间信仰的不同,其主体图案亦不相同。壮族生活在亚热带,气候炎热,居住地群山绵延、江河密布。壮族人民世代以种植水稻为生,流行自然崇拜、动物崇拜和崇尚铜鼓之俗,这些习俗蕴含着人们避凶趋吉、迎祥纳福、生产丰收的愿望。壮锦的主体图案中的牡丹、石榴、梅花等,主要生长于北方,应是吸收来自中原的图案或蜀锦上的花纹;主体图案周围或花边的水波纹、云雷纹、回纹、锯齿纹、蕉叶纹等,应是吸收了中原青铜器上常见的纹饰。这既丰富了壮锦的花纹图案和文化内涵,又使壮锦平添了美感和艺术魅力。这些纹饰多来自中原,是先秦时期中原地区青铜器上常见的纹饰,并且经过了中原工匠长期提炼形成的纹饰范式。此类纹饰工整美观,寓意深刻,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因而在中原地区广为流行,并且对周边少数民族装饰艺术产生深远影响。先秦至秦汉时期,中原青铜器及其铸造技术传入广西,加快了广西青铜铸造业和青铜文化的产生。而壮族及其先民在与中原汉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不仅认同中原文化,而且还善于学习和吸收中原文化的精华,融入本民族文化中。壮族先民铸造的铜鼓,无论是鼓面中心



的太阳纹及其四周的弦纹、乳钉纹、圆圈纹和云雷纹,还是鼓身所饰的水波纹、回纹、锯齿纹、蕉叶纹等,都是中原青铜器上常见的纹饰,是壮族先民借鉴和吸收中原青铜器文化的结果。而壮锦上常见的“卍”纹,是中原佛教传入广西、并为壮族所接受的结果。宋代以来,壮族将铜鼓上所饰的花纹图案织于壮锦之上,这是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和对铜鼓文化的继承,丰富了壮锦纹饰,增强了壮锦的艺术魅力,提升了壮锦的文化艺术价值。

综上所述,壮锦作为壮族标志性的工艺品和壮族文化的瑰宝,是在壮族纺织业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有着相对独立的起源、发展历史和民族特色。在其发展过程中,随着中原移民的南迁及其文化的传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加深,壮锦无论是编织工艺还是花纹图案和色彩配置,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汉族文化和蜀锦的影响,这是壮族善于学习和吸取中原汉族文化的结果,丰富了我国的织锦艺术,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绽放的一朵艺术奇葩。

#### [参考文献]

- [1][西汉]刘向.战国策:卷一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633.
- [2][西汉]刘安.淮南子[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133.
- [3]黄云忠,叶浓新.广西武鸣马头安等秧山战国墓群发掘简报[J].文物,1988(12).
- [4]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5][东汉]班固.汉书:二十八(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2:1670.
- [6][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34.
- [7][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校注[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4.
- [8]吴伟峰.广西壮族的织锦技术[J].广西民族研究,1990(3).

- [9]壮锦手工织造工艺、壮锦纹样、外观疵点归类表[EB/OL].(2021-07-17)[2024-02-02].<https://max.book118.com/html/2021/0716/8002074014003122.shtml>
- [10]黄现璠,黄增庆,张一民,等.壮族通史[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622.

责任编辑:许立坤

# 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体化教育体系的四维向度

邢亮,李准

(鲁东大学,山东烟台264025)

**摘要:**坚持系统观念是坚持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体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内在要求,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和战略工程,需要坚持系统观念、遵循教育规律,积极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体化教育体系,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体化教育体系需要从大学理论教育、中学情感教育、小学启蒙教育一体化,政府推动教育、学校系统教育、社会立体教育一体化,意识基础教育、实践深化教育、理论指导教育一体化,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共同富裕、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一体化等四个领域开展。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体化;教育体系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2.011

[中图分类号]D633;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2-082-07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sup>[1]</sup>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进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教育是社会进步、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重要基石,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工程。新时代教育和引导全国

各族人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坚持系统观念,构建符合教育规律、多维一体化的教育体系,形成全维度教育合力,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智慧和力量。

## 一、大学理论教育、中学情感教育、小学启蒙教育一体化

习近平指出:“要抓住青少年价值观形成和确定的关键时期,从小就抓、从幼儿园就抓,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sup>[2]</sup>大中小学教育是我国国民

收稿日期:2024-01-17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课题(2023MZSGQSD005)。

作者简介:邢亮,男,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山东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主任、烟台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研究方向为党建与思想教育、民族理论与政策;李准,男,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山东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烟台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骨干成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理论与政策。

教育体系的主体部分,是人们从小到大接受系统教育的主要渠道,也是人们接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主阵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要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青少年成长成才规律,坚持从小抓起,融入国民教育体系,纳入大中小学教育一体化建设,做到接续教育,不断深化,形成一体推进、持续开展、循序渐进的长效机制。大中小学不同阶段的学习教育具有阶段性特点,即“研究生阶段重在开展探究性学习,本专科阶段重在开展理论性学习,高中阶段重在开展常识性学习,初中阶段重在开展体验性学习,小学阶段重在开展启蒙性学习”<sup>[3]</sup>。要根据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积极推进大中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做到教材编写体系、师资建设体系、课程教学体系和环境育人体系的一体化。

#### (一)构建大中小学一体化教育教材编写体系

教材是学校教育教学的重要依据和重要载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坚持构建大中小学一体化教育体系,首先要把相关内容纳入教材编写体系。思政课是大中小学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铸魂课程。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进学校、进课堂、进头脑,在全国小学高年级、初中开设民族团结教育专题课,在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中强化民族团结教育内容,在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含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开设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课程”的部署要求<sup>[4]</sup>,由国家层面组织专家把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编写内容,做到统一编审、统一使用。小学高年级和初中阶段可编写使用彰显“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专门教材,其“道德与法治”课教材也应围绕这一主题加编专题章节。普通高中的“思想政治”课教材,要根据教材内容体系,围绕“中华民族大团结”主题有机融入相关内容。根据普通大中专院校学生的年龄特点、学段要求和培养目标,编写使用体现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最新成果特别是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专门教材并作为选择性必修课程。在此基础上,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要根据不同课程

内容体系编入“中华民族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章节或融入相关内容,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材体系。

#### (二)构建大中小学一体化教育师资建设体系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键在教师。”<sup>[5]</sup>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体化教育体系,铸牢大中小学各民族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级思政课教师发挥着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配齐配强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保证“中华民族大团结”教育有充足的师资保障。普通高校要按照教育部的要求配备思政课教师,针对思政课教师队伍老龄化、学科专业偏差的现状,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保证数量与质量提高并举,常态化巩固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成果。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可借鉴普通高校的师资建设经验,规定基本的师生比配备要求,配足相关学科专业师资,保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需要。二是建立完善多维一体的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培训体系,提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能力和水平。目前我国建立了国家、省级和学校三级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培训体系,要把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引导各民族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三级培训日程、内容体系,有针对性地进行专题培训、系统培训和实践研修。三是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一体化教学激励机制,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内生动力并付诸行动。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经验交流主题、教学比赛内容和学术研讨议程,形成教育教学常态化交流机制和开放性研究氛围。要把这方面的科研项目纳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省级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和各类专项课题,以高质量的科研成果促进教育教学实践高质量发展。四是加强大中小学党政干部、管理人员特别是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干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教育培训,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思政课”格局。

#### (三)构建大中小学一体化教育课程教学体系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sup>[6]</sup>如何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由教材内容体系转化为教学内容体系,做到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是必须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一是以教材为依据集体备课、系统讲授。建立国家和省级教育职能部门积极推动、普通高校主动牵头的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共同体,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集体备课、教学技能观摩、教学问题攻关、教研项目申报等一体化、制度化和常态化教学交流活动,增强大中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思想性、理论性、针对性和亲和力。二是加强最新理论教育。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也是思政课教学的显著特点。中国共产党成立百余年来,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探索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者要加强学习、相互交流、形成共识,不断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新理论成果、实践探索经验的教育。“形势与政策”课是普通高校思政课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政治性与政策性要求高、时效性强与覆盖面广等显著特点,要有针对性、常态化地对学校师生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专题教育。

#### (四)构建大中小学一体化教育生态环境体系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是教育的最高境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不是哪几个部门、哪部分人的事,而是人人有责、各负其责。构建大中小学一体化教育体系,就要积极营造一事一物皆教育、时时处处是课堂的大教育环境和优良教育生态。在大中小学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思政课教学是主渠道,还包括校园文化活动、社会实践教育等多方面渠道和阵地。大中小学要开展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校内文化教育活动、校外实践拓展活动和社会志愿服务活动等,做到目标明确、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形成合力,持续巩固和不断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效果。根据职能部门职责任务分工,大中小学统战部门要发挥牵头作用,联合宣传部、学生处和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部等部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举办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引导各族师生亲身感受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共

同团结奋斗意识,增强民族大义与家国情怀。加强大中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实践教学交流,充分发挥各自的资源、平台和师资优势,做到资源共建共享、教育一体开展、经验相互借鉴。结合教育需要,围绕培养目标,组织开展社会志愿服务,引导青年学生在实践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中小学要结合校园绿化美化需要,适当建设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雕塑群、宣传栏、休憩园和景观点等可视化图景载体,大力营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浓厚教育氛围。

## 二、政府推动教育、学校系统教育、社会立体教育一体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sup>[7]245</sup>。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和全民愿望,必须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职能优势、学校教育的系统优势和社会教育的立体优势,构建政府推动、学校主体和社会协同纵向逐级推进、横向相互衔接的一体化教育体系。

### (一)政府部门发挥职能优势,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及时研究解决本地区本单位涉及民族工作的重大问题。”<sup>[8]</sup>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体化教育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发挥党和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能优势,坚持系统性思维、全局性谋划和整体性推进。首先,要加强党对民族教育工作的领导。健全开展教育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搞好顶层设计、规划计划和政策实施,研究解决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体化教育体系的重大问题。其次,全面落实党和政府职能职责和政策措施。地方党的统战部门和政府职能部门要加强对构建一体化教育体系的统筹协调和分类指导并担负起教育的主体责任,把相关工作纳入重要工作议事日程。贯彻落实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民族教育、思政课建设的相关决定和意见,围绕教育主题和培养目标,坚持整体设计、循序渐进、逐步深化的原则,对大中小学和社会各单位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行整体规划,明确教育标准,提出教育要求。再次,建立由党和政府职能部门牵头、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推进工作机制。地方教育职能部门要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作为一体化建设的重要课题。地方党委政府要明确专门机构、专职人员和工作责任制,加强对跨地区、跨行业、跨单位一体化教育的指导和管理,推动协作有效开展。

(二)各级学校发挥系统优势,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

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是我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政治任务。我国九年义务教育是国家、社会与家庭必须予以保证的国民教育,具有强制性、免费性和普及性等特点;高等教育则具有高层次、专业性和系统化等特点。各级各类学校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统教育方面具有从小到大接续教育、由浅入深渐进教育、从感性走向理性的深化教育、由知识碎片到理论体系的系统教育、从学校影响社会的辐射教育等独特和显著的优势。意识的形成过程是持续教育、不断深化与逐步成熟的过程,需要从小教育培养、大中小学一体、终身教育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从小启蒙打基础;需要接续教育逐渐内化于心,大中小学一体推进;需要由情理入理日趋成熟,启蒙教育、情感教育和理论教育不断深化;需要学校教育影响社会,接受学校系统教育的莘莘学子走向全国各地,影响辐射全社会。相关职能部门要充分利用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这些优势,发挥学校教育在推进全社会教育一体化中的重要作用。

(三)社会各单位和组织发挥实践优势,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

社会是教育的大学校、大课堂和大舞台,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有着鲜明的特色、丰富的形式、多彩的内容和生动的实践,呈现多方位、立

体化与全效能的特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全国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更加频繁、更加广泛深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平台不断丰富。

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是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共事与致富的重要平台,在构建一体化教育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具有经济组织、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等功能,在这些单位组织里,各民族平等共事、和谐共处、交往交流交融。要把依法治理念落实到单位组织的各项事务中去,把抓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与促进单位组织事业发展有机统一起来,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日常教育管理服务工作中去,打造具有行业特色、单位特点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品牌。民品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族群众汇聚共事、交往交流交融的“洼地”,是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体化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环节。民品企业以其企业性质定位、产品结构特点、市场销售取向等因素,成为吸纳少数民族劳动力人数较多、各民族职工共同劳动致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任务突出的民族用品生产定点企业。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民品企业的民族工作、民族教育和业务发展的指导与规范。大中小学特别是普通高校要发挥自身学科专业优势,加强与民品企业的合作,帮助民品企业民族工作干部提升理论政策水平,指导民品企业开展有特色、有成效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与实践,在与民品企业交流合作中总结凝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创新经验、挖掘理论研究素材。民品企业自身要加强党的领导,坚持以党建引领企业发展和做好民族工作,大力开展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文化活动和硬件建设,积极创造各民族职工生活交往、工作交流和文化交融的机会;加强各民族劳动力来源基地建设和职工劳动技术、文化知识的培训提升,帮助各民族职工共同劳动致富;坚持依法治企、提升民族工作治理水平,在处理各民族职工的诉求、纠纷与困难等问题上,既显现对各民族的尊重又体现依法办事的规矩,既体现共同体、大家庭的温暖又凸显人人

平等、公平公正的原则。农村和城市社区是社会的细胞,社区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单元。随着全国社会劳动力统一大市场日益形成,推进了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更加成熟的条件基础。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大对农村和城市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大团结教育的指导,创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村和社区,引导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

### 三、意识基础教育、实践深化教育、理论指导教育一体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各族群众一心向未来,是集教育教学、实践体悟和理论指导诸方面一体开展的系统工程。其中,意识教育是基础,引导人们充分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科学内涵、价值意蕴和实践理路;具体实践是关键,强化人们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理解与真正践行;科学理论是指引,保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的正确方向和质量效果。

#### (一)教育在意识启蒙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

从意识形成的过程、教育规律的把握和实践巩固的要求来看,要渐进性、全方位、立体化地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是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提供强大的学术、学理与学科支撑。发挥高等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和中心的作用,坚持民族理论与具体实践、悠久历史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实践性问题的理论研究,从历史演进与理论逻辑的结合原理上科学揭示、全面阐释中华民族从萌芽形成到巩固发展和展望美好未来的道理、学理和哲理,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科学权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二是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生动形象地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具体实践。对于全国各族人民而言,讲好故事、以事寓理是最生动、最有效的教育方法。要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主题,大力宣传中华民族团结融合发展历史、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党的民族工作伟大成就和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的美好愿景。要坚持创新传播方式、丰富传播内容、拓宽传播渠道,“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讲清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各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可靠保障,讲清楚中华民族是具有强大认同度和凝聚力的命运共同体,讲清楚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所具有的明显优越性”<sup>[8]</sup>。三是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畅通常态化、系统化和渐进化教育的主渠道,做到大中小学各个阶段梯次推进,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协同开展,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形成合力。

#### (二)实践在意识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和根本性的作用

教育的目的在于实践,实践的标准在于成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贯通于制度逻辑、文化基础、实施策略等各个方面。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必须坚持的基本政治制度。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其中最关键的在于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在帮助各族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石。在处理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上要坚持辩证法,坚持中华文化根深干壮与各民族文化枝繁叶茂的辩证统一。要把现代文明教育作为推进各民族共同迈向现代化、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内容和重大举措,引导各族人民在思想、文化、生活等方面全面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有科学的实施策略。习近平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他聚焦”<sup>[7]246</sup>,要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坚决防范民族领域重大风险隐患,加强和完善党对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sup>[7]246</sup>。这

些为我们构建一体化教育体系、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全面贯彻落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要求,创造性地开展宣传教育与实践探索,引导全国各族人民高度认同、躬身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理论在意识铸牢过程中发挥着指导性和支撑性的作用

“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sup>[14]</sup>“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sup>[17]</sup>思想意识教育的政策性、实践性很强,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严峻挑战,需要全面正确地把握好理论体系与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并指导具体实践。只有加强理论指导,才能把握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体化教育体系的主动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才能卓有成效。要通过学校系统教育、社会主题教育、党员干部专题教育等多种方式,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科学指导思想 and 坚实理论基础。发挥普通高校学科专业、教育师资和研究团队整体优势,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体系和教育实践研究,形成科学理论体系,探索有效实践方法。坚持校地合作共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重点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问题、创新理论以及地方党委、政府委托的民族工作专题研究和咨询等工作。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及构建一体化教育体系的成功经验及时进行总结凝练改进,提升理论高度,指导具体实践。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成果及时进行转化,根据成果转化的实际效果及时调整理论研究方向与重点,在理论成果产出——理论成果转化——转化效果反馈——促进深化研究——研究促进实践的过程中推进全社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共同富裕、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一体化

中华文化是民族的根脉,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

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与价值追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维护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保障。正因如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坚持着眼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共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坚持推进各族人民共同迈向现代化,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推动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坚持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坚实文化基础

作为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要坚持弘扬主旋律,坚持把握意识形态教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统一性,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凝聚社会共识、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等方面的重要保障作用,全面推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为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提供牢固文化根基和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加强面向全国各族人民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教育,持续进行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史的宣传教育,加强中华民族精神教育,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快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普及与全面使用,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根深叶茂、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广泛认同。以中华民族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持续创作、宣传与打造中华文化优秀作品、文艺精品,在全社会营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浓厚氛围。加强网络文化阵地建设,坚持理论舆论联动、内外宣传融通、线上线下一体,主动抢占网络舆论宣传、文化传播的制高点,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旋律。

(二)坚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到共同迈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得益彰

“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sup>[9]</sup>共同富裕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团结奋斗的不懈追求,是中国共产党人践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初心使命的具体体现,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所在、价值旨归。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中,发展是解决民族问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总开关、总钥匙和源动力。要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制度优势,全面推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富裕、共同迈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物质基础和强大精神动力。坚持“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sup>[10]</sup>的理念,在共同迈向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前行路上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一个地区都不能落下。坚持深化实施东西部协作和西部大开发战略,进一步推动东部发达地区带动和帮扶西部地区、民族地区协同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坚持提升民族地区自我发展的内驱动力,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和重点放在切实改善民生、促进民族团结上,全面贯彻党和国家推动民族地区发展的新理念、新政策、新举措,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促进各族人民心情舒畅、安居乐业,促进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坚持加快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打造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自我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相协调,铸牢共同体意识和实现共同富裕有机结合的示范样板和引领工程。坚持构建全国统一劳动力大市场,推进民族地区间、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间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增进民族团结,全面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国式现代化同频共进、相得益彰。

(三)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做到推进民族工作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协同共进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伟大而深刻的革命,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组成部分,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重要实践路径和法治保障。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才能够行稳致远。坚持在法治轨道内处理民

族事务,一方面要教育引导各族人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另一方面要坚持依法办事,坚持依法保障各族人民合法权益,使法律面前民族平等、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和法治精神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坚持把现代信息技术充分运用到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推动民族工作、社会治理实现数字化、网格化和精细化,提升民族事务治理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124.
- [3]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9(24).
- [4]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5(25).
- [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30.
- [6]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219.
- [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8]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3-10-29(1).
-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09.
- [10]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38.

责任编辑:许立坤



# 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呈现载体、逻辑关系与价值意蕴

师英杰,王金斗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摘要:**整体把握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应从地理环境、文明标识、价值追求来看包容性这一特征是如何历史地形成以及展现的。进一步解析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内蕴,要关注包容性在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中的特殊地位、发挥的重要支撑作用,厘清中华文明包容性与其他突出特性的逻辑辩证关系。以中华文明包容性来内在引领共存、共生、共赢的文明发展新路向,超越了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实践旧路,体现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客观之需,推动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时代进程。

**关键词:**包容性;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2.012

[中图分类号]G122;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2-0089-08

准确理解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之一的包容性,有利于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深层次把握中华文明的历史渊源、属性特征及其当代价值。包容性在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中的地位,揭示了其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体现出过去连接现在的历史必然。西方文明中心论强调单一存在、霸权扩张、零和对抗的发展路线。以包容性为底色可进一步洞察中西方文明实践进路的差异性。遵循文明共存、共生、共赢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引领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航向,是对世界文明秩序的全新构建。

## 一、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呈现载体

对中华文明包容性的认识与阐明,应以彰显其鲜明外观的独特地理环境为出发点,分析包容性特征的大环境综合体。具有独一无二标识的中华文明的语言、文字,是中华文明包容性最直接、客观的微观表征。作为“和而不同”的价值追求,则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内在情感表达和文化特质所在。

### (一)独特的地理空间格局

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多以大河流域带状或扇状分布聚居。河流滋养,是人类维持生命体存在和延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德意

收稿日期:2024-03-02

基金项目: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点项目(21LLMLB016)。

作者简介:师英杰,女,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文化哲学;王金斗,男,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志形态》中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sup>[1]</sup>单明确地理环境对于塑造肤色、形象、种族外在差异的重要作用并非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着重强调的,个体外在形象的区别显示出生物学意义层面的进化,这是文明身处大环境一般性的作用效能,而深远性、持久性地对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气质的影响则更进一步彰显出环境作用于人类发展的本质力量所在。

诚如世界上人类文明发祥地多发源于大河流域的一般规律,黄河和长江流域孕育了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并不缺少水源这一关键生活资料。首先,不像整体悬于海洋之中的相对孤立、深居内陆腹地的绝对封闭,中华民族长久孕育和成长的地理环境,一面朝向大海、一面背靠高山,半开合式的地理环境显示出所处空间地域的开放辽阔,体现出综合性、开放性的鲜明特征。从地理意义层面来看,面向大海、背靠高山的这种四周有天然屏障的境况,使得中华文明内部结构体系明确而完整。其次,从跨度上而言,我国国土面积广阔,地理环境空间格局独特、气候条件多样,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使得中华文明内部极具粘性。相对独立则代表着稳定的存在,主要发展方向呈现出结构上内向汇聚的态势。尽管历史王朝不断更迭,但所处生存发展空间相对稳定,文明接续发展。

## (二)包容演变的语言文字

文字消失会导致文明被遗忘,今天我们通过考古验证文明存在的历史事实,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就是语言文字。文字作为文明的重要载体,是活在纸上的文明,其与一定历史阶段中的政治实体紧密相关。语言作为文字形式化到现实化的实际结果,是彰显文明特征的一种表现形式。

历史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文字可以作为探索

一种文明兴起和衰亡的坐标参照。譬如楔形文字曾作为历史上两河流域的通用语言文字,随着政治实体的不断轮换,最终被取而代之。公元前330年,波斯帝国被外来的亚历山大帝国征服,两河政治文明终结,楔形文字尘封于历史之中,希腊文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地域文明的新主角。

中华文明作为原生性文明,其符号性的语言文字同样具有原生性。以形写意,以意见形,从甲骨文到金文、小篆、大篆、隶书、楷书,再由繁体到简体,文字的产生、发展、演变,既呈现出中华文明内部微观结构的连贯性和顺畅性,遵循一定的演化规律,也显示出在变革中开放吸纳的递进特质。“车同轨、书同文”<sup>[2]</sup><sup>106</sup>,中华民族创造性地把分散式、非标准化、不具统一性的文字整合成一个系统性的文字体系。如果不强调内部的兼容并包,打破隶属与认同障碍,中华文明的续写将可能出现记录上的断层和因之带来的逻辑混乱。文字体系的成熟建构代表着文明发展到一定的新高度,中国文字的起始塑建、演化丰富、记载传播、交流借鉴,每一个环节和阶段都是自我进化和吐故纳新的结果。语言文字是各民族交流思想的工具。长期以来,汉字在自我进化中逐步以方块字呈现,注重象形和写意,为中华民族所认同与使用。虽然由于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不同地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语言,但在整体性的变迁和密切交往过程中,人口的规模流动、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使得相互借用语言文字的现象较为普遍,因而在语言体系形成和使用上存在着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其中,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在相互吸收与借鉴中逐步为全国各民族或许多民族所接受的历史进程,就体现出了包容性文化对于凝聚中华各民族团结进步所起到的关键纽带作用。

## (三)“和而不同”的价值追求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sup>[2]</sup><sup>112</sup>独特的地理空间格局、一体演变的语言文字呈现出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的历史形成和中华文明的一脉传承。深入探讨中华民族内在蕴含的思想文化

基因可以发现,“和而不同”概括了包容性的核心价值。

“和而不同”最早出自《论语·子路》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其意指君子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能够保持相对独立而追求和谐友善的氛围,小人则不然。千百年来,这种“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念不断演化、丰富、拓展。在人与自然、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处理中,虽有不同的解释,但是目标指向一致,即在保留差异性、个体性的同时努力追求共同性。

文明不仅是一个名词性概念,更是人类参与的动态化的历史实践过程,随时间积淀而愈显厚重。根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可以总结为“距今万年奠基,八千年起源,六千年加速,五千多年进入(文明社会),四千三百年中原崛起,四千年王朝建立,三千年王权巩固,两千两百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sup>[9]</sup>。中华文明赓续不断的文明演进脉络,相伴而生的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奠基,这是政治文明成熟的显著标志。“和而不同”作为一种文化支撑型的包容性哲学,以其特有的政治包容性价值和公共包容性规范明晰了中华文明一体化的演进逻辑。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sup>[4][29]</sup>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政治文化传统,显示出我们政治文明的和合姿态。文明的融入是一种渐进式的结构和内容之间的耦合和深度互鉴,存在着个性的短暂消弭继而整体焕发为新的表现形式,但并不意味着抹杀原有个性要素的特质。“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sup>[9]</sup>事物在存在、联系和发展的环节中,对立与统一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和而不同”代表着一种进取性的包容态势,这种特性允许个体差异而又互相学习、增强合力,正所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中庸》)。贵和持中、兼容并包印证了中华文明特有的包容性文化范式,是推动文明“和”力到文明“合”力的重要价值保证。

## 二、中华文明包容性与其他突出特性的逻辑关系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五大特性。这五大特性并不是割裂的简单摆放,而是对中华文明一体式的综合评判。分析解读包容性的立体式意涵和深层次效用,需在中华文明整体框架中进行把握,论证与其他四大特性的逻辑辩证关系。其中,包容性为连续性创造动力前提,体现创新性的内在本质,为统一性提供路径选择,并最终推动和平性的理念出场。

### (一)包容性是连续性的动力保障

中国的历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个文明形态,但是在全世界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且从未中断过的文化<sup>[9]</sup>。中华文明一脉演进的历史逻辑并不是偶然生发的,它与其他人类文明形态早期发源规律和成长经历虽相似,但能够发展、成熟与稳定,并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与其包容性是分不开的。

一个国家和民族走向文明的历史实践过程并不是追求单一向度或仅受外在裹挟包围两个狭隘的层面。包容性一方面指在自我文明演进过程中,能够允许不同的先进文明因子萌芽和被选择,这是在自我否定意义层面上实现内部的优化。另一方面,在全球视野下,中华文明向上至善的生长态势,离不开对其他文明应有的思维判断和行为态度,这一层面决定了我们对自我处境的清醒认知和对其他文明的理性借鉴。

在中华文明的演进逻辑中,强调内部的包容与共存一直是一项优良传统。《周易》中讲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尚书》中提到“有容,德乃大”。在这种论证评价的话语表达中,把包容和“德”联系在一块,显示出包容性在中华文明自我锻造中的独特地位。中华民族身处独特、多样、稳定的地理环境,经过地域差异化的选择,形成了以一家一户农耕式和逐草而居的游牧式两种主要的生存样态。但看似迥异的生产生活方式,并没有因此而产生非彼即我式的内部对立,而是在尊重、承认

和包容中和谐相处。习近平指出:“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sup>[7]</sup>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表明,只有不断注入母体以新的要素,发展才会实现质的突破和飞跃。中华文明对自我强调和谐统一的环境前提,使得中华文明可以一以贯之而不受内部冲击。在新要素的外在刺激下,中华文明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从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

### (二)包容性体现创新性的内在本质

创新意味着对原有认知的突破。文明作为整体性、综合性的经济、政治、文化集合结晶的表征体,其创新也遵循着一定的客观规律。文明的嬗变不会在短时间内由一种文明形态跳跃至另外一种文明形态,这在理论和逻辑上均说不通,事实上也根本不会实现。每一种文明的核心都凝聚着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大众的心理共情,采用非正常手段或强制性的暴力并不能利长远、固根本。因此,一种文明所体现出来的创新性,总的来说是对于自身面对内部危机和外部压力的自我调整和完善,而危机和压力正是文明向上至善不断催生的自我驱动。

以自我和非我的逻辑思维分析,文明的创新总是发生于自我文明与他者文明之间。可以说,现代化的进程推动人类的认知不断发展,随着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愈加成熟,对于文明的研究也愈加深入。文明的多样性有国别之分、民族之异,彼此内涵不同,进程上阶段分明,但本质依然是本我和非我的根本区别。明辨和解答问题的视角要厘清前提性的原则意识、范围指导和具体规范,把握如何创新首先要确定创新的基本论调,即文明的创新是对内外全要素整合的系统工程,而非全盘否定自身传统或依赖拿来主义标榜先进。面对历时态的传统与现代,中华文明建构了一脉相承的内生性链条,在主体性意识的牢固守望中不断实现自我扬弃。对于共时态的多元文明集中凸显,既承认多元存在,在尊重个

性差异的基础上实现文明交流互鉴,同时又彰显出中华文明不断超越的进取品质。

### (三)包容性为统一性提供路径选择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大一统始终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随着国家治理的渐趋成熟,“大一统”成为中华文明实践进路的必然结果、核心旨归和历史趋势。中国古代文明的统一性特点的形成,并非依靠其排斥或者消除异己的因素,恰恰相反,依靠的是兼容并蓄的包容,然后经过熔冶将不同的因素化为一个不断发展的新整体<sup>[8]</sup>。

作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之一的统一性,它历史地表明古代中国王朝更替、政权更迭的规律虽是客观的史实存在,但并没有丝毫影响和动摇中华文明整个有机体的统一与稳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汲取了各民族内部交往交流交融的营养成分。在多民族的接触与接纳、尊重与共生的现实践履中,作为分子内聚的意识自觉不断上升,且内聚力量不断增强,为大一统的形成积淀了厚重的中华民族共同的情感与意志。在现实中,则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核心利益而作出的共同行动。习近平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sup>[9]</sup>溯源历史的横向统一和纵向连续,包容性的实践价值彰显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在方法路径选择层面的合法性、正确性和可行性。

《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曾指出,与印度文明及其他古典文明的不统一和间断相比,“中国文明的特点是统一和连续”<sup>[10]</sup>。中华文明统一性的突出特性表明,它是基于生存在华夏大地上的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和价值取向,相比国家治理和个体生存样态的模式选择,更多地展示出一种强大的文化信仰和政治使命感。这种观念的形成缘起和高度认同,首先是个体对于其生存空间和生存方式的探求。一家一户传统的简单群体单元,本身就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统一体,内部强调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各有分工、和睦相处的伦理秩序,是家庭稳定和谐的包

容性文化支撑。另外,在受到外部环境威胁时,内部的分歧会从属于整体性危机的重压,而集合为共同抵御、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所以,以家庭单位来看,中华文明统一性特质的核心表征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相处形式和共处方式的体现。进一步在数量和空间上进行延展,家国同构的既垂直又立体的传统管理模式,奠定了政治大一统的基础。这种传导式的高效率模式,使得国家统一、社会和谐、民族团结成为事实关系层面的推演与呈现。

#### (四)包容性推动和平性的理念出场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处理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相异文明形态的智慧总结,是中华文明包容性文化凝结熏陶和现实推动的必然呈现。包容性作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之一,远非停留在思维之中,更多的是在历史实践中彰显其内在的效用。中华民族对和平的阐释与推崇古已有之,“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sup>[47]</sup>。“和”作为先民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更多地表达朴素的人与社会之间的相处关系。另有言之:“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sup>[245]</sup>这进一步诠释了“和”不仅是努力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和品质,也是追求更高层次和谐统一的途径与机制。探赜这种价值理念状态的源头不难发现,正是具有包容性特点的个人道德品质、政治文化传统、国家治理方略,才有力地催生了中华民族对和平的理想推崇和现实追求。

解读中华文明和平性的内在思想基因,可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视之。从国内来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最终呈现,结构上是和谐多样的统一体。历史地看,这是各民族长期包容互鉴、融合发展的实践使然。开放包容的大环境意味着不过分强调孤立、单一化存在,而是寻求和借鉴彼此的长处,在相互对话和学习中增长集体的力量。包容性内在要求和平地看待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有效规避了因地域差异、血缘关系、宗教信仰不同引发矛盾和冲突的可能,突破

了认知差异和行动有别的种种桎梏。在包容性的道德感召和现实推动下,我国各民族求同存异、和平共处,有力巩固了和谐统一、多元融合的国内环境。

从国际来讲,中华文明和平性的理念也深刻体现在与其他文明相互尊重、包容互鉴的历史之中。习近平曾指出:“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sup>[48]</sup>诸文明之间如何看待差异、如何开展对话,向来是每个国家和民族不可逃避的议题。任何一个民族只有在尊重全球文明共生共存的前提下,才可能进一步实现文明交流互鉴,拓展自身发展的空间。包容性深刻嵌入中华民族的思维中枢,但并非停留于观念的堆砌和集合。其内在精神体现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推动了中华民族和谐统一、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同时,包容性强调国家和地区之间相互尊重、平等相处,为开展文明交流对话、共同发展繁荣营造了积极和谐的世界文明景观。

### 三、中华文明包容性的价值意蕴

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呈现及其独特的价值特性深刻解析了包容性的历史源流、结构组成与重要地位。将其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视域来分析,中华文明包容性于实践层面揭示了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特质区别与演进法则。在人类文明新形态视野下,中华文明包容性的价值意蕴体现出文明是共存的、平等的多样统一,呈现出文明共生之道,并明确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向于构建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 (一)文明共存的一体逻辑

包容意味着尊重、接纳、宽容。这是从对象性的前提出发给予他者的反馈和态度,即是从两种或两种以上事物发生、交织和演变作出的思维和行为判断。包容性反映出中华文明的本质是作为同一类属的统一体,且内部不同要素之间存在张力。不同要素之间保持各自的差异和个性,但又能彼此协同工作。

置身于统一体的文明综合域,体现了不以他者

意志为转移的现实共同存在,且此种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上都具有一定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包容性的文明共存是事实存在而非标准化价值存在,不区分重量等级、单位大小、先后顺序是其显著特征。与之相对,西方文明中心论在语境上传递出从属感与依附性,在实践中折射出事实上的不平等与地位的高低尊卑。同时更是以自身为中心标准,视其它文明主体为半开化或野蛮,掩盖共同存在的历史事实,让价值判断凌驾于事实存在,混淆与转移主要矛盾,以使得文明开化理所当然。而现实情况是“即使他人实际上不现成摆在那里,不被感知,共在也在生存论上规定着此在。此在之独在也是在世界中共在”<sup>[12]</sup>。由此可见,人类社会不同的文明体存在于一个共存的系统之中,且彼此联系与交织、互动与进化。文明优越论与文明体的共存相互排斥,其意所指并非平等、多样、统一的人类文明共同体,而以个体单一化思维看待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这就否定了其他诸文明体存在的合理性,歪曲和破坏了世界文明体之间的平等关系和对话机制。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建立在主主平等、和合普惠等哲学范式之上的人类文明新形态<sup>[13]</sup>。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强调文明是共存的平等、和谐、多样进步的统一体,呈现出积极发展的多样文明观。正如习近平指出:“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sup>[14]</sup>“和而不同”置于文明的视域下,突出文明的多元与共存,即尊重文明的多样性,捍卫诸文明的平等性。“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的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sup>[15]</sup>个体之间的差异不能粗略地成为能否兼容共存的准入式标准和跨越式门槛,排斥性阻隔放弃了诸文明容纳的前提,更扼杀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机遇。正如许倬云所言:“中国文化真正值得引以为荣处,乃在于有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sup>[16]</sup>此论断既明示出中华民族对他者的尊重态度和谦虚回应,又彰显出我们对于异质文明的鉴别式交流和学习的行动导向。在“知”与“行”两个层面,择其善者,从善如流,故能成

其大。中华文明赓续绵延的恢宏气度和兼收并蓄的精神特质,进一步确证了包容性的历史存在价值。

## (二)文明共生的发展逻辑

文明不是静止不变的,功能性和实在的衡量标准体现出对文明的约束。文明共生代表着一种过程性的演化和进步,存在和形成于个体与社会的多样互动中,持续性的吐纳和选筛代表着文明“扬”和“弃”的两个层面。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进程是一项富有弹性和隐蔽的工程。虽然作为总结性的反思可以将文明划分为某几个顺序和阶段,但基于客观事实层面的划归并不能真正隔断文明之间共生、交织与互促的多边关系。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塑造与接纳了文明作为统一体的现实境况。从发展的观点和角度来讲,统一体内部的要素裂变、内外际遇的碰撞与融合展示出不同文明的共生之道。“共生”一词源于生态学领域,是指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两个或多个密切接触的不同物种之间形成的互惠关系,延伸到社会领域指不同文明互相依存、相互依赖的紧密关系<sup>[17]</sup>。诚然,文明化表征着一种未竟的理想形态和事业发展状态,全人类文明是一个有机的、动态的整体系统。这种状态,从根本上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文化依据。

比较来看,应当肯定西方在现代文明列车的启动、前进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产业革命形成的物质基础上,西方文明在话语体系上逐渐显示出优越感,甚至把文明仅定义为西方文明,理性构建、制度优越、人权运动、普遍价值等纷纷出场,并以各种形式对外倾销,使一些国家和民族逐步掉入了自我异化的文明窠臼。此种现象根源立论于西方线性历史进步观。德国学者斯宾格勒认为:“西方中心论的错误在于制造了一个文化和历史上的‘托勒密’体系。”<sup>[18]</sup>西方文明中心论的主张,背后隐匿着西方的先验逻辑。他们以自身为轴心解释文明,从文明伊始就预设了主统治客、客从属于主的不平等关系。

以中华文明包容性的高度和力度解释和践行共

生的文明发展路向,所追求的决不是主仆命令式、带有欺骗性、单一化的文明进路。推动不平衡、差异化、复杂性的矛盾解决,需避免陷入西方文明“普遍性”的陷阱,建构以包容性为底色的文明共生之道。其一,立足自身文明的主体性,从个体特殊性出发,强调各文明主体共存的统一性,这是共生的逻辑前提。其二,文明的共生内在确证了各种文明对话的必然,凸显了文明多元共存的时代特征,从包容性的理论高度正视各种文明体愈发紧密关联客观事实的存在,是现代文明理应达到的认识之维。其三,文明共生的现实向度指向于同生而不同质的多样文明观。包容性明晰了文明共生并非刻板地全盘复制以往文明的“样式”,而是要把力度着眼于文明互鉴、融会贯通,促进诸文明主体由被动生长到自主生长再到内涵成长,真正构建共同存在、共同发展的文明共同体。

### (三)文明共赢的指向逻辑

在当下社会转型和文明发展形态亟需整合的大变局中,包容性的内在精神指引构建共赢的人类文明全新的格局,彰显出超越一般意义层面的理论维度和价值高度。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循序渐进、环环相扣的过程和结果统一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立足自身主体性,致力于文明互鉴,寻求共赢共享而非博弈对抗,显示出更加包容开放的新型文明场域。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价值基础,“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相通于世界诸文明体共生共进的现实演进过程,但并不等同于具体国家阶段性跃迁的特殊性道路选择。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的<sup>[9]</sup>。而肩负“文明开化使命”,以单一文明主体解释和论足先进野蛮与否的“黄金标准”,揭露了西方文明中心论的霸权话语逻辑。相较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持西方文明中心论往往展现出对其他后发国家“文明开化”的包揽性。他们不遗余力地影响后发国家通向文明的观念认同、

道路选择、践行标准与未来走向,涉及面之广、渗透面之深,无不透露出对文明单调化的一元诠释和控制欲。这种利益最大化的疯狂物质诉求,加剧了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国家之间以及文明主体相互的对立与紧张,进而暴露出传统现代性作用于形式现代化的骗局,是打着“文明开化”的幌子行“文明暴政”之实的行径。一旦后发国家文明话语权被剥夺,现代化带来的物质成就也被控制和转移。

中华文明的历史使命,与西方“文明开化使命”截然不同,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内在要求文明是互相关联的统一体、向善进步的成长体,由此也指明了文明是合作共赢的和谐体。资本逻辑的霸权、垄断、膨胀,会逐步扩大诸文明体之间的鸿沟,进一步使得世界文明谱系缺失活力且带有偏见。要有效抵御西方文明利己性的全球输出,除批判西方所谓文明冲突论外,更要营造文明共赢、世界大同的新型文明场域。在突破话语体系的钳制层面,首先要以文明共赢的价值高度和事实批驳“文明优越”“文明中心”思潮,增加文明之间的对话频次,减少文明之间的隔绝和摩擦,尊重不同文明观,使得文明主体间更加具有通约性。其次,冷静甄别“文明开化”的事实假象,立足自身主体性,选择独立发展而非寄生附庸,互助共赢而不是排他对抗。文明共赢的现实指向最终会推动每一个平等文明主体的进步与繁荣,这是中华文明包容性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旨归所在。

### 结语

文明观的缔造与形成深刻蕴含在一个国家经济基础的物质动力之中,同时也在一个民族长期的主流价值取向中萌芽与成熟。文明主体之间的差异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与实践可能。习近平深刻指出:“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我们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对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sup>[20]</sup>统摄地看,从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外在呈现为源点认识中华文明的历史演进、内部结构和特有精神气质,揭示中华文明包容性和连续性、创新

性、统一性、和平性之间的逻辑关系,推动了对中华文明包容性的深度考究和地位拔擢。中华文明包容性指向的文明共存、共生、共赢的发展新路,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高度契合,必将在对西方文明普遍性的批判和超越中,开辟人类文明发展新路径,助推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真正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

####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9.
- [2][战国]子思.中庸[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9.
- [3]王巍.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主要成果及启示[J].求是,2022(14).
- [4][春秋]孔子.论语[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9.
- [5][春秋]左秋明.国语[M].长沙:岳麓书社,2006:126.
- [6]李建中.中国文化概论(第2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5.
- [7]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403.
- [8]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497-500.
- [9]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7.
- [10][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M].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278.
- [11]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485.
- [12][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147.
- [13]韩庆祥.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逻辑[J].中国社会科学,2023(7).
- [1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44.

- [15]列宁.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07.
- [16]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6.
- [17]高福进,孙冲亚.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论”的主要意涵及其构建路径[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6).
- [18][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1卷[M].吴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22.
- [19][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294.
- [20]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256.

责任编辑:杨绪强



# 习近平关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实践伟力和践行路径

高一飞,高榕

(广西大学,广西南宁 530004)

**摘要:**习近平关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为促进中国—东盟友好合作提供了中国智慧,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习近平关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提出历程与中国—东盟合作关系的提质升级密切联系,其原创性贡献在于创造性地提出与东盟构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创造性地提出与东盟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创造性地提出与东盟共同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其实践伟力主要体现为中国与东盟政治和战略互信日益增强,经贸合作跨越式发展,人文交流丰富频繁。践行习近平关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路径在于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

**关键词:**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原创性贡献;实践伟力;践行路径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2.013

[中图分类号]D820;D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2-0097-0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就发展什么样的中国—东盟关系、怎样发展中国—东盟关系、建设什么样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怎样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丝绸之路重塑辉煌、亚太地区和平安稳定的重大课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形成了习近平关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该重要论述为中国—东盟合作关系持续稳中向好、实现全面深化提供了科学指引,为新时代构建更为紧密的中

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根本遵循。深刻领会并准确把握习近平关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实践伟力和践行路径,对于促进中国与东盟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 一、习近平关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提出历程

“中国和东盟国家山水相连、血脉相亲。”<sup>[1][2]</sup>相较如今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光明图景,1967年8月东盟成立之初的中国—东盟关系纷繁复杂。1970年起,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中国—东盟关系逐步走

收稿日期:2024-03-05

基金项目:中国法学会2023年度部级法学研究课题重点课题(CLS<2023>B01)。

作者简介:高一飞,男,广西大学法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司法制度、习近平法治思想;高榕,男,广西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司法制度。

向正轨。1974年5月,马来西亚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75年6月,菲律宾与中国建交。同年7月,泰国与中国建交。1991年是中国—东盟关系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东盟首次作为一个整体与中国正式交流,拉开了双方全面、快速、稳健的合作发展序幕。1991年7月,时任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出席第二十四届东盟外长会议开幕式,并同东盟六国外长交换意见,标志着中国同东盟对话的开始<sup>[2]</sup>。1997年12月,江泽民参加中国—东盟首脑非正式会晤,与东盟国家共同发表《中国与东盟国家首脑会晤联合声明》,确定中国—东盟面向二十一世纪睦邻互信伙伴关系,标志着中国—东盟关系进入新阶段<sup>[3]</sup>。2003年10月,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东盟签署《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中国同东盟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sup>[4]</sup>。2006年10月,在南宁举行的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十五周年纪念峰会上,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中国—东盟关系作了“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的评价<sup>[5]</sup>。2011年11月,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二十周年纪念峰会上,温家宝使用“命运共同体”界定双方关系,认为中国与东盟“成为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sup>[6]</sup>,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合作关系向前发展。

1991年至2011年,党和国家领导人科学研判中国周边形势,准确抓住提升中国—东盟关系的现实机遇,力促双方携手踏上良性互动、互利共赢的和平发展道路,持之以恒接续奋斗,实现了中国—东盟关系从对话到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发展。此时的中国—东盟合作关系基础牢固、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具备了接续推进、全面提升的现实基础,为双方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创造了更加充分的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东盟合作关系也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sup>[7]</sup>。2013年3月,习近平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作出了判断和展望,指出了各

国“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趋势<sup>[8]</sup>,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由此发轫。2013年9月,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sup>[12]</sup>。同年10月,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提出“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sup>[12]</sup>。此后,习近平就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

2014年6月,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习近平在讲话中特别提到,“中国正在推动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重大倡议”<sup>[15]</sup>,以实际行动履行和平发展承诺,致力于扩大各方共同利益的汇合点。2015年3月,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式上再提“中国和东盟国家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sup>[18]</sup>,并强调“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sup>[18]</sup>。同年9月,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提出世界各国“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sup>[19]</sup>。同年9月,习近平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呼吁世界各国“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sup>[19]</sup>,并详细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五位一体”总体路径。同年11月,习近平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演讲时,向在场的领导人和师生承诺中国“坚持践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致力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sup>[18]</sup>。

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对构建人类必要性的必要性、紧迫性以及努力方向等内容进行了系统论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走向成熟。2020年11月,习近平在第十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上致辞,指出中国—东盟关系“成为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例证”<sup>[10]314</sup>,着重强调“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sup>[10]315</sup>,并阐述中国的期许和目标。2021年11月召开的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三十周年纪念峰会上,习近平正式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指出“中国愿同东盟把握大势、排除干扰、同享机遇、共创繁荣,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落到实处,朝着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迈出新的步伐”<sup>[11]441</sup>。“迈出新的步伐”表达了中国与东盟积极夯实双方友谊,接续耕耘彼此关系,共同描绘发展的美丽画卷;体现了中方对中国—东盟关系的高度重视与信任和将双方关系不断推向更高层次的期盼;激励双方就政治、安全、经贸、环境、交通、文化、教育等各领域继续开展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合作,朝着打造无短板、零漏洞、全面升级、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努力。

至此,伴随着中国—东盟合作关系的稳步提升和习近平关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不断丰富和完善,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 二、习近平关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关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为将习近平外交思想贯彻落实于我国周边外交实践提供指引,闪烁着充满时代精神的外交智慧,具有原创性贡献。

### (一)创造性地提出与东盟构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面对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日益加重的国际环境,如何处理与东盟的关系关乎我国周边安全环境,更是决定区域乃至世界走势的关键选择。“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sup>[11]273</sup>当部分国家仍停留在过去殖民扩张、零和博弈的旧思维中时,习近平提出了“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外交新思维<sup>[11]273</sup>,高瞻远瞩地倡议中国与东盟构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亚洲国家构建新型周边关系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sup>[12]</sup>,是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区域发展现状、双方合作实践相结合的生动实践。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中国和东盟实现共同发展、持续繁荣、长治久安指明了方向和途径,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周边外交树立了鲜明旗帜,为中国和东盟国家超越冷战思维、探索对话合作新模式、共谋和平发展新未来擘画了美好蓝图,其在确保发展中国—东盟和平友好合作关系中发挥着稳定器和推进器的双重作用。

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符合东盟国家利益。近年来,东盟国家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下展现出较强的发展活力和韧性,在亚太地区占据重要战略地位。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坚持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sup>[11]441</sup>,以合作共赢为核心,主张平等与尊重,支持共商共建共享,符合东盟国家的外交战略和理念。对东盟国家而言,与中国携手合作、共同发展,能够发展经济、提升国民生活水平、保障内政不受外来势力干涉,能够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避免地区力量结构失衡。

### (二)创造性地提出与东盟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新时代呼唤合作新理念,新理念需要新的实践平台推动落实。习近平指出:“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sup>[11]492</sup>东盟国家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的作用突出。2013年10月,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提出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时,便以东盟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首倡合作对象<sup>[12]292-293</sup>。此后,习近平在多个场合指出,深化“一带一路”合作宜“以亚洲国家为重点方向,率先实现亚洲互联互通”<sup>[11]497</sup>,“‘一带一路’倡议的首要合作伙伴是周边国家”<sup>[18]321</sup>,中国视东盟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地区”<sup>[10]314</sup>,多次明确东盟国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优先地位。与东盟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聚焦绘就“一加一大于二”的周边合作新画卷,以实现区域现代化为基本目标,以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最高目标,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为合作精神,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合作原则,以提升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水平为着力点,顺应时代潮流,适应发展规律,符合双方人民利益,准确把握了中国—东盟合作新需求和我国对外开放新趋势,传承并弘扬了“丝路精神”,突出强调了“中国同东盟和平合作、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意愿和决心”。

基础设施联通建设是中国和东盟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着力点。习近平在倡议和东盟国家共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时指出,“中国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愿支持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包括东盟国家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sup>[1]293</sup>。在之后的“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习近平将“一带一路”与互联互通界定为相融相近、相辅相成的关系,并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优先部署联通中国和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东盟国家的铁路、公路项目<sup>[9]497-498</sup>。习近平在第十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上,倡议中国和东盟一道“加强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sup>[10]315</sup>,为双方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明确了方向,注入了动力。

(三)创造性地提出与东盟共同践行“亲、诚、惠、容”理念

“亲、诚、惠、容”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于我国周边外交的生动诠释,是对我国长期以来所奉行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的继承、升华,体现了新时代我国周边外交的鲜明风格,为中国深化同东盟国家友好合作指明了方向。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方面,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共同绘就睦邻友好的美好蓝图”<sup>[1]293</sup>,“真诚相待、友好相处”<sup>[1]292</sup>,“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sup>[1]293</sup>,并鼓励中国和东盟“坚持开放包容”<sup>[1]294</sup>,积极引导中国和东盟躬行践履“亲、诚、惠、容”理念。在总结三十年来中国与东盟合作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经验方面,习近平充分肯定了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在强化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意识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指出三十年来中国东盟合作的成就,“更离不开我们积极顺应时

代发展潮流,作出正确历史选择”,并把“守望相助,践行亲诚惠容理念”作为重要的历史经验<sup>[1]440</sup>。

“亲、诚、惠、容”理念,“亲”与“诚”在前,“惠”与“容”在后,体现出中国同东盟国家交互往来时应共同遵循和秉持的外交理念中的感性和理性因素。“亲”“诚”内含将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比拟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之意,“惠”“容”则树立了周边外交的理想状态和价值追求。“亲”,要求中国和东盟在国家层面加强平等沟通,在人民层面加深友好交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sup>[1]297</sup>,充分利用“山水相连、血脉相亲”<sup>[1]292</sup>的“亲”缘关系,持续提升彼此之间的感召力、亲和力、影响力,努力塑造和睦相处、关系融洽的区域环境。“诚”,要求中国和东盟以真心换真情,以诚心换诚意,言而有信、诚信为本,真诚对待彼此,秉持以诚处世、以信立身的道德观,开诚布公地维护双方友谊、追求和谐共生。“惠”,要求中国与东盟携手提升双方利益融合水平,实现协同联动、发展共赢。“容”,要求中国和东盟在未来以更加开阔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区域合作,彼此学习借鉴对方积累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力争实现多元共生、包容共进,构建开放而非封闭、包容而非排他的朋友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三、习近平关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实践伟力

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提出以来,面对国际格局的深刻演变,中国—东盟合作关系已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双方“引领东亚经济一体化,促进共同发展繁荣,让 20 多亿民众过上了更好的生活”,“走出了一条睦邻友好、合作共赢的光明大道”<sup>[1]439</sup>,作出了符合时代潮流的正确选择,取得了突出的实践成效。

(一)政治和战略互信日益增强

政治和战略互信是根基,根基不牢,双方合作难以长久。十多年来,双方高层保持密切交流,政治和战略互信持续深化。习近平同东盟国家领导人保持密切沟通,身体力行开展元首外交,对东盟国家进行国事访问,多次表达中国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强化政

治和战略互信的真诚意愿,强调“中国愿同东盟国家真诚相待、友好相处,不断巩固政治和战略互信”<sup>[129]</sup>、“中方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愿同周边邻国长期友好相处”<sup>[130]</sup>,为中国—东盟关系发展领航掌舵。

目前,中国已同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等七个东盟国家就共建双边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走出了一条战略互信、邻里友好相处的道路,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我国外交部门也通过双边访问、多边场合会见等方式,同东盟国家外长和东盟秘书长保持紧密联系。2022年8月4日,时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此次会议是新冠疫情以来首次以线下方式举行的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sup>[131]</sup>。中国与东盟互选彼此作为线下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的第一站,凸显了双方与日俱增的政治和战略互信。当前中国和东盟对于对方未来走向的信心愈益坚定,准确把握中国—东盟战略合作的大方向,相互支持对方重大关切问题,齐心协力加速发展。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中国—东盟关系,是双方增进战略互信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国和东盟在战略全局层面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伙伴关系,为成就更高层次的合作做好了信任铺垫。

### (二)经贸合作跨越式发展

经贸指标的动态变化是反映中国—东盟经贸合作跨越式发展的较为直观的“窗口”。1991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为79.6亿美元,2020年达6846亿美元,扩大了85倍<sup>[14]</sup>。此后,双方贸易规模持续扩大,2021年中国—东盟贸易额达到8782亿美元<sup>[15]</sup>;2022年达9753亿美元<sup>[16]</sup>。据东盟秘书处数据库统计,2009年至2022年,中国连续14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sup>[17]</sup>。在全球经济普遍下行的大环境下,中国与东盟展现出产业链、供应链交融的强大后劲,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市场潜力巨大,贸易活力充沛,为全球经济的复苏注入了一针强心剂。2020年,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为东盟第四大外资来源国,双方首次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sup>[14]</sup>。2021年,东盟十国的经济总量约为3.4万亿美元,仅次于美中日德,与我国同为世界前五大经济体<sup>[18]</sup>。2022

年,东盟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sup>[19]</sup>。

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正式生效,双方之间的贸易互通前景广阔光明。2022年一季度我国对东盟进出口达1.35万亿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14.4%,东盟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双方进出口规模占RCEP贸易伙伴规模的47.2%<sup>[20]</sup>。自2002年起,双方每年均举办中国—东盟交通部长会议,助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力争实现交通一体化,以促进区域经济的联动发展。中老铁路、中泰铁路、雅万高铁等重点工程的兴建,旨在实现“人畅其行、物畅其流”<sup>[9498]</sup>,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了强劲动力。

### (三)人文交流丰富频繁

近十余年来,中国—东盟驰而不息地开展了多渠道、多形式的友好人文交流与合作。2013年12月,中国—东盟语言文化中心在北京成立,积极展示、推广、支持中国与东盟在语言、文化和艺术等方面的相互交流和學習。国内各省市也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主动与东盟推进人员往来。以中国广西为例,截至2023年9月1日,广西已与东盟成员国中的8个国家缔结友好城市59对,与东盟成员国缔结友好城市数量居全国首位<sup>[21]</sup>。

教育合作不仅能够培养助力双方往来的人才,“为中国东盟关系发展提供更多智力支撑”<sup>[129]</sup>,更是服务于双方万世友好的大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教育合作亮点纷呈,迈上了新台阶。中国和东盟国家互派留学生超过20万人,共同设计实施了旨在为东盟国家青年精英赴华留学深造提供资助的“中国—东盟菁英奖学金”<sup>[15]</sup>。中国一些高校开设了东盟十国官方语言专业,开展了教师、学生联合培养项目;东盟国家建设了多所孔子学院和孔子学堂,并与中国签署了多份学历互认协议。

目前,中国和东盟国家着力推动人文交流复苏,双方一致同意将2024年确定为“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年”。“保持中国—东盟友谊之树常青,必须夯实双方关系的社会土壤。”<sup>[129]</sup>中国与东盟深厚密切、丰富频繁的人文联系培育并激发了双方人民命运共同体的行动自觉,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

共同体浇筑了坚实的人文基座。

#### 四、习近平关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践行路径

展望中国—东盟合作关系,习近平强调“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落到实处,朝着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迈出新的步伐”<sup>[1144]</sup>,提出了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的“五大家园”的具体路径。共建“五大家园”是建设“五个世界”总体布局在中国—东盟合作关系中的具体化,是推动中国—东盟合作关系发展的行动指南。

##### (一) 共建和平家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和平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sup>[8]186</sup>。中国自古便推崇和平。在历史上,“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sup>[1112]</sup>。当前,中国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共谋、共护、共享和平,“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sup>[19]525-526</sup>,走出了一条超越西方“国强必霸”历史逻辑的和平发展之路。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向全党、全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sup>[22]50</sup> 和平不是坐而论道,需要身体力行、脚踏实地。习近平提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就中国—东盟和平事业发出了强音,指出“我们要做地区和平的建设者和守护者,坚持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携手应对威胁破坏和平的各种负面因素”<sup>[1144]</sup>。

近代以来,中国和东盟国家人民饱受战乱与动荡,深知没有和平,任何发展目标都是纸上谈兵,更深知当下和平的珍贵,更加珍视当前发展的机遇。和平是中国—东盟国家的共同利益,符合人民的共同期盼,也是中国和东盟携手奋进的共同愿景。未来,中国和东盟需要就维护区域和平以及促进共同发展彼此激励、相互支持,守望相助、和衷共济,奋力书写共建和平家园的历史新篇章。

##### (二) 共建安宁家园:实现普遍安全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提出后,普遍安全的概念被屡次提及,我国多次在外交场合呼吁各国精诚合作,一起维系普遍安全。当前,全球作为一个统一体,

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皆不可能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时置身事外、独善其身,普遍安全的观念深入人心。

面对新冠疫情,中国立足与东盟已有合作方式,加强抗疫协助。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启动‘中国东盟健康之盾’合作倡议”<sup>[11442]</sup>,以实际行动践行普遍安全精神内涵,维护中国—东盟区域整体安全。该倡议包含一系列措施,包括“再向东盟国家提供 1.5 亿剂新冠疫苗无偿援助”,“再向东盟抗疫基金追加 500 万美元”等<sup>[11442]</sup>。中国和东盟是命运共同体,是生命共同体,是安全共同体。援助东盟伙伴就是帮助自己,就是践行亚洲安全观,就是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此外,跨国犯罪、自然灾害等各类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依旧棘手。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sup>[11442]</sup>,与东盟就安全治理开展全面合作。南海是双方安全治理合作的重要一环,南海安全是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利益,要“把南海建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sup>[11442]</sup>,共同维护南海安全,实现普遍安全。

##### (三) 共建繁荣家园:推进区域经济发展与合作

发展是第一要务,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中国—东盟合作关系拥有充分的经济发展潜力。中国与东盟作为富有活力的两大经济体,在加快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同时,实现《东盟共同体愿景 2025》,是满足中国和东盟发展需要,也是提振世界经济复苏信心的现实途径。

随着 RCEP 全面生效实施,习近平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拓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领域合作,共建经贸创新发展示范园区”<sup>[11443]</sup>,以强化区域经济合作。计利当计天下利,“中国拥有巨大国内市场,将始终向东盟国家开放”<sup>[11443]</sup>,助力区域经济复苏,从而实现共赢共享。市场经济下,竞争在所难免。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兼顾当前和长远,着力解决深层次问题”<sup>[19]542</sup>,积极避免区域伙伴内部恶性竞争。“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的互联互通建设是提升双边贸易和经济一体

化水平的基础性、前提性和开创性工作<sup>[8]197</sup>，“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sup>[1]293</sup>，为中国人民和东盟各国人民共建繁荣家园搭好幸福之桥。

当今世界发展快速，中国和东盟国家还应“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发挥互补优势”<sup>[10]316</sup>，及时开展数字技术应用创新，充分发挥科技引领发展的作用，力争使区域创新水平迈入世界前列，实现“数字丝绸之路”。

#### (四) 共建美丽家园：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绿色发展理念，要求人类在重视发展的同时考量发展本身对环境资源的消耗，辩证认识和处理发展与保护的关系，从而“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sup>[22]41</sup>。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已关注和认真思考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sup>[23]</sup>。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自然财富与经济财富没有孰轻孰重之分。习近平对于生态环境的高度重视得到了东盟国家的高度认可。比如，老挝政府就高度评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sup>[24]</sup>。凡事皆过犹不及、物极必反，发展同样如此。过度发展无疑是自掘坟墓，绿色发展理念要求各部门各单位在工作中拒绝短视，不以牺牲千秋万代的生态环境换取一时发展。

在实践中贯彻好绿色发展理念，离不开各方面的支持，特别是资金支持。“要加强绿色金融和绿色投资合作，为地区低碳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sup>[11]443</sup>，确保中国—东盟区域绿色发展的资金融通。双方亟需就绿色发展规划加强政策沟通和经验分享，以实现合作效益最大化。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sup>[25]375</sup>，中国与东盟唯有不断加强合作，才能有效应对区域以及全球性环境问题，为中国与东盟可持续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奠定自然条件。绿色是大自然的底色，“我们应该追求绿色发展繁荣”<sup>[25]374</sup>，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守护好地球的碧水蓝天。

#### (五) 共建友好家园：深化人文交流与合作

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合作、区域与区域之间的交流合作，归根结底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合作。构建

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人文交流与合作是扣紧共同体根基的“铆钉”，其涉及领域广泛，同人民日常生活联系紧密。深化人文交流与合作，既“使双方民众更加相知、相亲、相融”<sup>[11]443</sup>，夯实讲信修睦的民意基础，又使中国与东盟人缘相亲，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凝聚合力。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之一，东盟国家同样拥有璀璨的历史文化。习近平指出，“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sup>[9]543</sup>，双方应当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使之成为维护区域和睦的纽带。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要“用好地区多元文化特色和优势”<sup>[11]443</sup>，使双方人民更全面地了解与自己同处一个命运共同体的亲密伙伴，实现包容共进、和而不同。正如习近平所言：“交往多了，感情深了，心与心才能贴得更近。”<sup>[11]294</sup> 拓展人文交流与合作，提升双方命运共同体意识，“把修睦合作的薪火世代传承下去”<sup>[8]322</sup>，也是推动中国—东盟合作关系发展的有效路径。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2] 广西社会科学院编写组. 中国与东盟关系大事记（一）[J]. 东南亚纵横，2006（11）.
- [3] 江泽民. 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在中国—东盟首脑非正式会晤时的讲话[N]. 人民日报，1997-12-17（1）.
- [4] 广西社会科学院编写组. 中国与东盟关系大事记（二）[J]. 东南亚纵横，2006（12）.
- [5] 温家宝. 携手奋进，共创中国—东盟关系的美好未来——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06（34）.
- [6] 温家宝在第十四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0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1-11-19（2）.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37.
- [8] 习近平.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1卷[M]. 北京：中央

文献出版社,2022.

[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0]习近平.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2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1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12]梁运文,崔潇.新时代十年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研究:脉络与前瞻[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

[13]2022年8月2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EB/OL].(2022-08-02)[2024-02-24]. [https://www.fmprc.gov.cn/fyrbt\\_673021/202208/t20220802\\_10732122.shtml](https://www.fmprc.gov.cn/fyrbt_673021/202208/t20220802_10732122.shtml).

[14]中国—东盟合作事实与数据:1991—2021[EB/OL].(2022-12-31)[2024-02-24]. [https://www.mfa.gov.cn/web/wjbxw\\_673019/202201/t20220105\\_10479078.shtml](https://www.mfa.gov.cn/web/wjbxw_673019/202201/t20220105_10479078.shtml).

[15]我国连续13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EB/OL].(2022-03-18)[2024-02-18]. <http://chinawto.mofcom.gov.cn/article/e/r/202203/20220303286681.shtml>.

[16]李婕.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提质升级[N].人民日报(海外版),2023-08-26(3).

[17]ASEANstats . ASEANStatsDataPortal . [ EB/OL ] . (2023-12-31)[2024-01-24]. <https://data.aseanstats.org/trade-annually>.

[18]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EB/OL].(2022-12-31)[2024-01-14].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2/April/select-countries?grp=2001&sg=All%20countries>.

[19]海关总署:东盟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EB/OL].(2023-01-16)[2024-02-18]. <http://chinawto.mofcom.gov.cn/article/e/r/202301/20230103379451.shtml>.

[20]海关总署:海关总署2022年度第一季度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EB/OL].(2022-04-13)[2024-01-24].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xwfb34/302330/>

4289770/index.html.

[21]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立友好城市统计表[EB/OL].(2023-09-13)[2024-01-15]. [http://wsb.gxzf.gov.cn/bmfw\\_20220713/yhcsml\\_48212/t17137992.shtml](http://wsb.gxzf.gov.cn/bmfw_20220713/yhcsml_48212/t17137992.shtml).

[22]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23]本报评论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新时代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根本遵循[N].人民日报,2022-09-29(7).

[24]叶书宏,凌朔,柳丝.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世界期盼[EB/OL].(2017-12-30)[2024-01-12]. [https://www.gov.cn/xinwen/2017-12/30/content\\_5251733.htm](https://www.gov.cn/xinwen/2017-12/30/content_5251733.htm).

[2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责任编辑:杨绪强



# 数字乡村建设相关问题及对策建议

刘晓丽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甘肃兰州 730071)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在数字产业、智慧绿色乡村、数字治理和信息惠民服务等领域逐渐推进,逐步增加数字乡村建设试点,数字乡村建设主体多元化发展,数字技术快速应用于农业农村。党和国家高位推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府根据中央精神制定相应发展规划,基层党委政府明确重点任务,出台专项规划,细化政策措施,形成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但总体来看,目前数字乡村建设发展不平衡,存在信息基础设施薄弱、农业数据信息统筹利用不足、科技服务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可从数字技术与农业产业、电商产业、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社会治理深度融合等方面,推进数字乡村建设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数字乡村;乡村振兴;数字技术;融合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2.014

[中图分类号]F320.3;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2-0105-08

纵观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刻影响产业变革和经济格局,大数据已成为基础性战略资源。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将战略重点转向数字农业,积极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推动新一轮产业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信息化发展,以信息化助推现代化,大力推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将数字乡村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sup>①</sup>。数字乡村发展与数字城市发展相比较,数字乡村建设存在基础薄弱,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与数字化应用滞后,数据资源整合共享不充分等

情况。数字乡村建设在西部农村,特别是在民族地区、边远农村地区的发展差距更大。乡村振兴怎样实现更好发展,数字乡村如何建设,是新时代乡村建设亟需解决的问题。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至2023年连续六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对数字乡村建设作出战略部署,随后陆续出台了《数字乡村战略发展纲要》《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主要任务分工方案》《关于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十四五”

收稿日期:2024-01-06

基金项目: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2022XDJ022);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2023年度科研咨询项目“甘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研究”(2023ZCYB02)成果。

作者简介:刘晓丽,女,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党的建设和领导科学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政治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与区域发展。

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规划》等文件,在政策层面保障和支持数字乡村建设。目前,学界围绕数字乡村建设的内容框架<sup>[2]</sup>、发展就绪度评价<sup>[3]</sup>、信息鸿沟<sup>[4]</sup>、数字治理实践<sup>[5]</sup>、数字乡村建设的瓶颈与突破<sup>[6]</sup>等问题进行了探究。但关于数字乡村的内涵、主要领域以及建设路径等问题尚未达成相对一致的共识。本文就此展开探索,以资借鉴。

## 一、数字乡村建设的体系结构、主要领域及特点

### (一)数字乡村建设的体系结构

数字乡村是基于 5G 网络、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以网络基础设施、信息服务基础设施、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作为硬件基础,以公共数据平台、应用支撑平台为重要载体,以数字技术赋能农民生产、生活作为核心驱动力,使关键性的数据生产要素在农业农村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的建设目标。结合国家的相关政策和规划,数字乡村建设的重点主要有:一是农村数字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包括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产和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生活生产的数字化、智能化等;二是农村数字载体建设,包括公共支撑平台、公共信息平台、公共商务平台等;三是农村数字核心驱动力培育,主要指数字化创新应用,催生新产业、新业态,使农业生产经营走向标准化、规模化和组织化;四是农村数字关键生产要素培育,包括数据化知识和信息,建立农业农村大数据采集体系、分析体系、应用体系的完整机制。



图 1 数字乡村建设的体系结构图

结合数字乡村的内涵,数字乡村建设的体系结构可分为六部分,呈金字塔样式(如图 1 所示)。位于塔端的是组织领导机构,负责制定数字乡村发展战略、实施方案、扶持政策以及组织协调解决建设过程中的重点与难点问题,从体制机制层面统筹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各项工作,是数字乡村的关键。政策法规位于塔的上部,通过相关的引推政策、人才政策、资金政策、产业政策为数字乡村明确指导方针、目标任务。通过修订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信息共享以及信息安全等政策法规确保数字乡村建设顺利实施,从制度、政策层面保障数字乡村实施。位于塔上半部的是技术标准与规范,使数字乡村在总体规划设计、评价指标与方法制定、安全保障等工作层面遵循统一规范。位于塔的中央核心部位的是主要应用场景,主要包含数字产业、智慧绿色乡村、数字治理、信息惠民服务和数字文化。公共支撑平台内含公共数据平台和应用支撑平台,是实现数字乡村应用的系统基础,位于塔下半部,着力解决数据汇集、治理和应用。信息基础设施位于塔的底部,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数字底座,内容主要包括网络基础设施、信息服务基础设施以及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等。以上六部分内容在金字塔中的位置显示了其在数字乡村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各有不同,但六者缺一不可,互为补充,共同推进数字乡村建设。

### (二)数字乡村建设的主要领域

数字技术领域平台化、组件化等工具的广泛使用,推进了数字技术在乡村建设中的应用<sup>[7]</sup>,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数字产业。数字产业有助于数字乡村产业体系的完善,形成了以下三种实践方式。一是数字赋能农业生产,形成智慧农业。如安徽省长丰县利用数字技术打造草莓数字化资源、智能化生产、精准化管理、远程化服务以及网络化监管的“五化”体系。二是农村电子商务实现线下生产与线上销售有机结合。2022 年我国农产品网络零售增势较好,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 5 313.8 亿元,同比增长 9.2%,增速较 2021 年提升 6.4 个百分点<sup>[8]</sup>。三是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应用于乡村农林牧渔、旅游、文化、教育、康

养等领域,形成了包括乡村旅游、智慧认养农业等乡村新业态。2022年全国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195692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6.24%,比2021年提高0.19个百分点<sup>[9]</sup>。农林牧渔业、食用农林牧渔产品加工与制造、农林牧渔业及相关产品流通服务增加值规模居前三,占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47.3%、20.7%、14.1%<sup>[9]</sup>。综上所述,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赋能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与服务全过程,能够有效激发新供给、新动能,形成乡村经济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现智能化农业生产、高效化农业经营管理和便捷化农业信息服务<sup>[10]</sup>。

2.智慧绿色乡村。智慧绿色乡村主要体现为绿色生产、绿色生活和智慧环保。在绿色生产层面,同步协调农业生产和环境保护,通过应用农业投入品可追溯平台实现对农药、化肥、饲料等生产要素流向可追溯、风险可预警、责任可追究。在绿色生活层面,通过信息技术手段综合监测人居环境、农村饮用水水质等,为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提供依据。如江西省武宁县按照“一平台一中心一张图一个端”运行模式,实现全县农村人居环境工作统一指挥调度、物联预警分析研判、长效管护综合管理。在农村智慧环保层面,根据数字化监测平台实现对山水林田湖草沙、农业生态环境(农田土壤、生产用水和排放气体中的主要污染参数)、农村生态系统脆弱区和敏感区的全方位监测,助力农村生态系统科学化保护修复和污染防治,提升乡村生态环境整治的信息化水平。

3.乡村数字治理。现代信息技术在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等诸领域的普遍应用改造了乡村治理手段和方法,主要体现为智慧党建、数字政务、智慧村务、基层综合治理信息化和乡村智慧应急管理五大方面。湖北省宜城市搭建“百姓通”数字平台,以“宜汇办、宜汇说、宜汇管、宜汇建”四大板块推进乡村治理在线办理,助推“互联网+基层治理”延伸覆盖至乡村。截至2022年5月,宜城市搭建“百姓通”数字化治理平台,全市234个村(社区)所有居民用户激活、使用培训全覆盖,平台发布共享信息20.3万条,累计处理事情11000余件,村民反映的90%事情24小时内可处置完毕<sup>[11]</sup>。数字治理模式以网络化平台

为基础,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在满足村民个性化需求的同时,为处理乡村矛盾纠纷、村务公开、环境治理等提供技术支撑,助推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

4.信息惠民服务。数字为农民生活形态赋能,基于“互联网+”战略形成“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健康”“互联网+便民服务”等模式,使乡村居民全面享受公共服务和生活便利。比如,重庆市探索实践“互联网+智慧养老”新模式,通过应用健康数据人工智能分析实现老人健康电子档案、体检报告管理,通过“线下+线上”的养老服务和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整合服务派单、工单跟踪、服务项目和服务评价,全面提升了养老服务水平。信息惠民服务模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基于村民的多元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强调村民个体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培养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数字素养,通过数据资源、技术赋能为乡村治理现代化创造有利条件和制度保障。

### (三)数字乡村建设的特点

1.数字乡村建设主体趋于多元化。近年来,数字乡村建设已逐渐形成企业主动投入、社会共同参与的共建格局。2021年全国用于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的社会资本投入为954.6亿元,县均社会资本投入3588.8万元、乡村人均投入135.2元,分别比2020年增长17.2%和24.0%<sup>[12]</sup>。此外,中国电信、阿里、华为、腾讯等头部网信企业抢占市场先机,积极布局数字乡村相关业务。据南京大学空间规划研究中心、阿里研究院最新研究结果显示,2022年“淘宝村”数量达到7780个,新增757个;“淘宝镇”数量达到2429个,新增258个<sup>[13]</sup>。

2.实现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的快速融合。数字技术赋能农业农村,智能感知、智能分析、智能控制推动农业产业数字化,形成了农产品安全追溯平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直报平台以及重点农产品单品全产业链数据采集、分析、发布、服务平台,进一步提高了数据资源共享、业务协同和数据开放水平。比如,腾讯基金会于2015年8月向全国发布“腾讯为村”后,以数字化平台助力乡村振兴。截至2020年11月,为村平台上的村民数超251万、党员数超18

万,超过1.1万位村支书、1万位村主任在开展日常党务村务工作,共有来自30个省区、超过1.5万个中国乡村,在为村打造了互联网名片<sup>[14]</sup>。

3.数字乡村发展不平衡。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之间的资源禀赋差异明显,数字乡村发展差距较大。一方面体现在东中西差异上,西部地区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总体水平比东部地区低6.9个百分点,排名前三位和后三位的省份差距达40.3个百分点。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总体水平在全国100名内的东部、中部、西部的比例分别为:51.0%、35.0%、14%,其在全国500名内的东部、中部、西部的比例分别为:41.2%、40.8%、18%<sup>①</sup>。另一方面,同一地区数字乡村建设不同步。数字乡村建设不仅涉及政策支持,而且涉及教育、医疗、技术推广以及政务治理等,合理的资金投入和各方面协调发展是前提。总的来看,经济发达地区比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数字乡村试点建设推进快,省、市、县三级财政收入不充裕地区建设滞后,基本处于初级规划阶段<sup>[15]</sup>。

## 二、数字乡村试点区域建设情况及经验启示

目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在国家层面实现高位推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府根据中央精神制定相应发展规划,基层党委、政府明确重点任务,出台专项规划,细化的政策措施,形成一定的实践经验。本文以省——市——县为单位,选择三个不同区域、不同层级的地方,以求更为立体、详细展现数字乡村试点区域在重点领域建设情况。

### (一)数字乡村建设试点区域

1.广东:数字农业模式。广东依托发达的基础设施,以5G技术的创新应用为载体,建立农业生产试验基地,结合网络直播带货、电商平台、短视频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首先,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并积极制定战略规划。自2015年起广东相继出台《广东省“互联网+”行动计划(2015—2020年)》《广东省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广东省加快5G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年)》等文件,将“互联网+农业”“5G智慧农

业”以及信息进村工程等纳入广东省政府工作内容。其次,广东抢抓5G战略机遇,与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企业共同打造“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企业主体”模式的5G智慧农业试验基地。再次,引进正大集团、温氏集团等大型企业进驻5G农业示范区的同时普遍推广应用物联网、区块链等高新技术,实现农业种养的智能化、精准化。最后,大胆尝试“网络节+云展会”模式,推动“一县一网络节和一云展会”,培养直播带货“生力军”,使县域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在2020年超750.6亿元,排名全国第一<sup>②</sup>。

2.甘肃陇南市:乡村惠民服务模式。甘肃省陇南市以“陇南乡村大数据”平台为载体,着力运用数字化手段赋能乡村惠民服务。截至2022年底,已将9县区199个乡镇3287个村和17个市级单位全部纳入服务体系,提供27个栏目的服务内容和17个便民服务应用,注册用户131万人,日均访问达20万次,成为服务陇南乡村发展的“掌中宝”<sup>[16]</sup>。该系统主要围绕自上而下提供政策信息服务维度打造政策传播、政策引导和便民服务三大平台,通过自下而上收集掌握社情民意维度打造舆情分析、构建民意两大平台,围绕提升村民自治能力打造村民自治、群众监督、留住乡愁、服务三农四大平台。“陇南乡村大数据平台”所有功能和体验都是围绕群众需要和基层工作需要为目标的,充分体现了“走基层、汇民声,多级联动、互联互通,整合资源、发展经济,村民自治、共建和谐”的理念。

3.浙江省德清县:数字治理模式。浙江省德清县以“数字乡村一张图”为基础,充分发挥遥感监测技术作用,帮助解决人居环境、粮食功能区、水域监测、私建墓地等实际问题,形成“天上看、网上查、地上管”的闭环监管链条。一是统一遥感监测,实现智治。德清县统一采集遥感监测治理需求,通过数据分析发现问题并统筹资源,实现高效化利用。二是以地理信息技术实现治理可视化,在“数字乡村一张图”上叠加遥感监测地图、电子地图、三维实景地图等18个图层,使发生问题的位置与原因一目了然,为村干

<sup>①</sup>数据来源:2021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价报告。

<sup>②</sup>数据来源:2021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报告。

部及时、准确、高效解决治理难题提供有力支撑。三是实施工单管理,以“线上平台认领任务——现场确认处理——上传结果”模式减少“部门——镇(街道)——村干部”的通知流程和相关部门的督查考核,降低了工作成本。

## (二)经验启示

1.坚持“顶层设计+基层创新”的发展思路。一方面,扩大基层试点,由省市级试点下沉到县级试点,示范区域扩展至乡镇和村庄社区,通过试点规模的扩大激发村委会、企业和农户等基层的创新力量。另一方面,结合不同地区禀赋条件、基础设施、资源优势选择示范园区、示范基地、示范工程等项目开展分阶段、分内容试点工作,建立专家咨询制度,组织智库进行试点理论研究和实践调研,丰富数字乡村场景应用,在推进理论总结和经验辨识的基础上形成可行性报告并及时向上级部门反馈,促进新一轮顶层设计和试点示范工作部署。

2.不断创新数字技术应用,分区分类分步推进乡村产业数字化发展。我国农村地区类型多样,不同的资源禀赋、区位差异、生态环境以及产业基础等决定推进数字乡村要避免“一刀切”。首先,坚持分区域发展,东部发达地区农村要进一步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推动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智能化和机械化,助力数字农业走出国门;中部地区农村要科学规划、优化布局,完善数字乡村治理体系;西部和东北地区农村进一步推动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数字乡村运转体系。其次,坚持分类指导,依照《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规定,我国当前需结合聚集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和搬迁撤并类四种类型村庄的具体实际,合理规划建设内容<sup>[7]</sup>。最后,坚持分步发展。各级政府先制定发展方案,确定本地区数字乡村建设试点,并逐步推广实行。

3.数字乡村建设需要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社会参与+农民主体”多元协同共建的立体化发展模式。政府主要负责市场规划、发展战略决策以及国内外农业市场动态更新,发挥财政撬动作用,以“政府+运营商”提升农村信息化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以“政府+互联网”建立农村农业信息数据库,以“政府

+金融机构”实现乡村普惠金融发展,解决资金问题,以“政府+电商平台”打通国内外农产品市场,拓展销售路径。龙头企业以各自的技术优势和产业优势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要素支撑。社会参与是指激发社会多元主体积极参与,为数字乡村建设献策献智。农户和新型农业主体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要转变观念,提升自身数字素养,积极参与并推动数字乡村建设。

## 三、数字乡村建设存在主要问题与原因分析

### (一)主要问题

1.农村信息基础设施薄弱。完善的基础设施是数字乡村建设的根基。根据《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数据,截至2023年6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和城镇网民规模分别为3.01亿人、7.77亿人,分别占网民整体的27.9%、72.1%;从地区来看,我国非网民仍以农村地区为主,农村地区非网民占比为59.0%,高于全国农村人口比例23.8个百分点<sup>[8]</sup>。目前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还难以支撑农业大数据的应用发展,涉农数据在采集、传输、储存、应用与数字农业发展距离较远,农业信息的共享相对滞后。此外,农村物联网建设滞后,智能设备等由于费用昂贵并未实现规模生产,电子商务发展需具备的优质物流运输系统发展滞后。

2.农业数据信息统筹利用不足。农业数据信息的搜集、分析、共享、使用不足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障碍。尽管各部门充分利用卫星遥感、人工调查等方式不断完善乡村大数据系统,但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导致各部门基于自己的使用目的采集构建数据信息,数据采集未基于统一的标准和目录,导致数据样本、指标含义不同,给后期数据分析带来困境。与此同时,数据安全的政策法规缺失,各部门间未建立信息共享通道,获取信息需向多方提交申请,消耗的时间成本严重影响决策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在农业生产领域,相关农业企业的产业链数据也未能充分利用。

3.科技服务体系不健全。农业科技创新和科技服务体系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任务。我国农业科技投资不断增长,设立了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建设重

点实验室和数字农业创新中心等,数字农业建模、农业传感器等研发工作进展快速,但关键共性技术、前沿技术、技术集成应用与示范、农业人工智能研发应用等关键技术装备创新缺乏。调研表明,试点地区普遍缺乏农业专用传感器,动植物模型,农业机器人、智能农机装备适应性较差。与城市等领域相比,农业农村领域数字化研究应用明显滞后,适合“三农”的信息服务在供给能力、供给有效性层面与需求不够匹配,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数字乡村发展。

## (二)原因分析

1.传统治理方式根深蒂固,数字理念淡薄。数字是一种资源与技术,更是一种理念与思维方式。学者佩里·希克斯认为导致公共行政没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理念和理论的不足<sup>[19]</sup>。传统乡村政府一元垂直型的管理模式、依赖经验思维的治理方式使数字理念在发展中存在较大的理念断层。另外,数字理念是思想层面的变革,更是数字技能在实践中的广泛应用。数字与乡村的融合促使“整体化”“网格化”“精准化”等数字理念弥漫于乡村空间,但“数智治理”缺乏创新性<sup>[20]</sup>,数字理念未转化为高质量的行动<sup>[21]</sup>。实践中,不注重挖掘数据资源的价值,忽视需求预测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机械式的数据上传、数字分析和线下业务转为线上业务等情况未能从根本上实现数据价值,而是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形式数字”。

2.农民信息素养有待提升。《2021年中国数据中心人才发展报告》显示,数据中心人才分布高度集中,东强西弱格局显现。从人才数量来看,数据中心人才主要分布在华北、华东、华南区域,三个区域的人才数量占比分别为37.9%、32.4%、17.2%;西部省份人才储备明显弱于东部省份<sup>[22]</sup>。与城市地区相比,农村由于生活条件、发展环境、待遇等制约因素难以吸引、留住具备大数据素养的专业技术人才。另一方面,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主体,农民担负着数字资源使用者与贡献者双重角色,而当前农村基础设施滞后、农民数字知识和数字能力不足、智能化设备价格昂贵等因素限制乡村居民深入认识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也制约了农民参与数字产业、数字生活、数字治

理与数字生态。

3.相当部分农村地区产业基础薄弱。产业兴则百业兴,发展产业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必由之路。目前,相当部分农村地区产业基础薄弱,产业发展面临困难:一是资源要素瓶颈突出,资金投入机制、人才服务保障机制尚不健全,农村资源变资产的渠道未打通,导致资金、技术、人才等向乡村流动障碍重重;二是乡村网络、通讯、物流等相关产业基础设置薄弱,农产品产销对接、直销网点等保障设施未实现全覆盖,先进技术向乡村的渗透力较弱;三是发展方式粗放,发展质量效益不高,农产品加工设备滞后,加工转换率比发达国家低于18个百分点,普遍缺乏小众类、精准化和中高端的农产品。此外,产业链条较短,一二三产未实现有机融合,存在一产向后延伸不足,二产连两头不紧密,三产发育不足等情况。

## 四、进一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路径

数字乡村建设应有效协同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关系,结合乡村特色、乡村实际发展需求,以“六个深度融合”为着力点持续推进。

### (一)数字技术与农业产业深度融合

随着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的深入推进,数字广泛应用于农业农村并与农业产业深度融合。在生产环节,改造升级传统农业全产业链,合理调整农业生产布局,大力发展智慧农业,实现农业精确化生产、精准化管控,最大程度降低农业耗能成本,保障农业生产高效。在经营管理环节,促进传统农资企业电商化转型,催生“直播带货”“私人订制”等乡村新业态,提升农户在农业产业链中的话语权,同时扩大农产品交易规模。在服务环节,将技术成果快速投入使用,尤其是农机数字化服务和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使数字金融服务精准匹配资金需求,降低融资门槛,为乡村三产融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sup>[23]</sup>。

### (二)数字技术与电商产业深度融合

数字乡村建设需要大力普及和深化电商产业发展,加强数字技术与电商产业深度融合。一是依托产业优势和资源优势,广泛推广涉农电子商务应用,以“电商进村”为重点工程,支持大型企业开发农村市场,促进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推动电

子商务中心在县、乡、村三级建设。二是建立开放诚信的电子商务发展环境,推动各地依据实际情况出台电商发展政策,设立电商发展资金,培养电商发展人才。三是引领商贸流通创新发展。推动传统零售业依托网点升级营销模式,实现二者融合发展。四是进一步激发电子商务创新动力、潜力和活力,建立产业集聚、特色鲜明的电商园区,培育跨境电商、外贸出口综合服务平台和海外仓等外贸新业态,激发电子商务企业主体活力。

### (三)数字技术与农业科技创新深度融合

科技创新对“三农”的支撑引领助推农业发展动能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促进农业生产数字化、智能化、产业化。一是以农业科技需求为导向,加快研发关键共性技术和农业人工智能,全面提高农作物生产机械化水平和农机社会化服务水平;针对主要农作物探索实施机械化技术路线,全面实现农业生产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二是加强产学研和农科教的有机结合,通过建立企业、政府、科研院所间的战略联盟有效整合资源,提高创新效率和创造型产业链。三是建立完善农业科技创新长效动力机制、激励机制,建立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交易服务平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四是强化农业科技推广服务,建立公益性农技推广组织、多元化农技服务组织和社会化创业组织紧密结合的推广服务系统,解决科技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缺陷<sup>[24]</sup>。

### (四)数字技术与人才培养深度融合

数字技术与人才培养深度融合旨在培养和引进大数据人才,激活数字乡村建设主体。一是各级党委政府加强乡村大数据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出台人才引进政策,制定人才选拔考核评价机制。二是加强政产学研协同育人,培养农业领军人才,充分发挥职业院校、科研院所、专业培训机构的作用,开展数字下乡活动。三是围绕数字乡村建设目标分阶段、分种类、重点培养人才。四是结合市场规律,抢占涉农人才制高点,培养引导现有涉农人才投入、创新和评价机制,实现人才资源可持续发展,形成具备理论与实践、技术与操作、低端与高端的专业涉农人才梯队。

### (五)数字技术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深度融合

数字技术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深度融合是打通数字乡村建设“最后一公里”的有效途径。一是搭建集多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农业大数据平台,有效整合农业农村事务部门、农民个体和涉农企业数据,实现统一大数据管理<sup>[25]</sup>;实现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有效服务于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二是搭建信息共享平台。搭建农户、经营主体、村庄共享平台以实现农村土地、财务、农产品销售、人才信息等资源信息共享,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全面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三是完善信息终端和服务供给,开发与“三农”工作相匹配的信息终端和互联网应用软件,有序推进并整合农业农村、商务、邮政、供销等部门的服务站点,实现“多站合一,一站多用”。四是运用“云课堂”“互联网+”线上平台为农业生产主体提供相关科技信息并开展线上讲座、技术咨询指导与技术服务,全面提升村民数字化应用能力。

### (六)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

实现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途径,是实现数字乡村建设的必由之路。首先,持续提升乡村网络设施水平,加快推进农村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比如通过引入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智慧水利、智慧交通、智慧气象、智慧电力、智慧物流等。其次,搭建具备标准化、模块化功能和统一数据标准的乡村数字治理平台,为各级党委、政府和民众提供持续的信息源,实现社会资源和行政资源重构与整合,为部门间即时互动、协调沟通、有效合作提供空间,在解决“信息孤岛”的同时实现政府精细化管理。最后,搭建信息监测平台。通过搭建农产品质量和安全、社会稳定、民生落实等监测平台,实现对农产品物源、社会舆情、人口流动、村庄环境和村民健康数据的追踪和监测,实时掌握乡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实现高效管理。

### [参考文献]

[1]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实施

- 乡村振兴战略 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J].求是,2018(6).
- [2]曾亿武,宋逸香,林夏珍,等.中国数字乡村建设若干问题刍议[J].中国农村经济,2021(4).
- [3]张鸿,杜凯文,靳兵艳.乡村振兴战略下数字乡村发展就绪度评价研究[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0(1).
- [4]陈潭,王鹏.信息鸿沟与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症候[J].电子政务,2020(12).
- [5]刘俊祥,曾森.中国乡村数字治理的智理属性、顶层设计与探索实践[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
- [6]冯朝睿,徐宏宇.当前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困境与突破路径[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
- [7]赵成伟,许竹青.高质量发展视阈下数字乡村建设的机理、问题与策略[J].求是学刊,2021(5).
- [8]谢希瑶,梁瑞琪.2022年我国农产品网络零售增势较好[N].经济参考报,2023-02-01(8).
- [9]2022年全国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16.24%[N].中国信息报,2024-01-02(1).
- [10]钟文晶,罗必良,谢琳.数字农业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J].改革,2021(5).
- [11]数字乡村开启湖北宜城乡村振兴新动能[EB/OL].(2022-05-31)[2023-08-21].<http://www.yichengnews.com/news/ycyw/202206/t4431329.shtml>.
- [12]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22年)发布[EB/OL].(2023-03-01)[2023-09-05].[http://www.gov.cn/xinwen/2023-03/01/content\\_5743969.htm](http://www.gov.cn/xinwen/2023-03/01/content_5743969.htm).
- [13]陈志深.广东淘宝镇、村数量再创新高!揭阳淘宝镇数量继续稳居全省首位 [EB/OL].(2022-11-04)[2023-05-08].<http://rmh.pdnews.cn/Pc/ArtInfoApi/article?id=32149501>.
- [14]为村[EB/OL].(出版日期不详)[2023-10-05].<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BA%E6%9D%91/20405780>.
- [15]李道亮.我国数字乡村建设的重点、难点及方向[J].国家治理,2021(20).
- [16]陇南:大数据赋能高质量发展[EB/OL].(2023-03-15)[2023-11-01].<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0435734247336672>.
- [17]沈费伟,陈晓玲.保持乡村性:实现数字乡村治理特色的理论阐述[J].电子政务,2021(3).
- [18]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3-08-28)[2023-11-15].<https://www.cnnic.cn/n4/2023/0828/c88-10829.html>.
- [19]James L. Perry.Is Public Administration Vanishing [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16(2).
- [20]黄建伟,刘军.欧美数字治理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中国行政管理,2019(6).
- [21]贾秀飞.复合语境下技术赋能数字乡村建设的运行逻辑与实践检视[J].电子政务,2022(8).
- [22]数据中心世界网发布《2021中国数据中心人才发展报告》[EB/OL].(2021-12-31)[2023-06-08].[https://www.sohu.com/a/513376918\\_495790](https://www.sohu.com/a/513376918_495790).
- [23]何宏庆.数字金融助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优势、困境与进路[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
- [24]王雅鹏,吕明,范俊楠,等.我国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构建:特征、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5(2).
- [25]戴旭宏,倪玖斌.大数据驱动乡村振兴共享共治机制研究[J].大数据,2020(2).

责任编辑:刘菊香